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教会篇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各州的 浸信会发展历史》

原著：Benjamin Franklin Riley

原著出版时间：1898 年

前言。。	第 3 页
第一章。。	第 4 页
第二章。。	第 25页
第三章。。	第 42页
第四章。。	第 59页
第五章。。	第 73页
第六章。。	第 92页
第七章。。	第102页
第八章。。	第113页
第九章。。	第122页
第十章。。	第137页
第十一章。。	第151页
第十二章。。	第162页
第十三章。。	第170页
第十四章。。	第176页
第十五章。。	第187页

A History of the Baptists in the Southern States East of the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各州的浸信会发展历史

Benjamin Franklin Riley

1898

“可能有不同的真理陈述、不同的崇拜形式、改变的外在生活；但构成真正宗教的精神情感、责任感、慈善、忏悔的信任、神圣的愿望、对错误的仇恨、对不可见事物的信仰，属于所有世代。”

——SL 卡德威尔，DD

前言

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力求尽可能地坚持该系列书籍的意图，并尽可能多地包含标题所指示地区内浸信会教派的历史。在整本书中，信息的相对重要性决定了处理它的细节的详细程度。由于不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理解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所有内容，作者被迫忽略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从本书的计划中可以看出，历史是围绕在南部较早各州的浸信会教派编年史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时代或时期收集的。历史是在这些主题下展开的，这些主题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所有州。通过这样的处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方各州一般教派历史的基本事实就很容易呈现出来。

本书主要受益于以下作品：《美南浸信会纪要公约，从 1845 年至今》；卡

思卡特的《浸信会百科全书》；阿米蒂奇的《浸信会史》；Semple 的《弗吉尼亚浸信会历史》；斯宾塞的《肯塔基浸信会历史》；帕克斯顿的《路易斯安那浸信会历史》；坎贝尔的《佐治亚浸信会历史》和博伊金的《佐治亚浸信会历史，附传记纲要》；韦德的《浸信会简史》；纽曼的《美国教会史（浸信会）》；卡罗尔的《美国宗教力量》在《美国教会史丛书》中；库克的《浸信会故事》；赫维的《浸信会传道的故事》；Tupper 的《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以及他的《十年海外宣教，1880 年至 1890 年》；泰勒的《弗吉尼亚浸信会牧师》；福斯特的《密西西比浸信会传教士》；Borum 的《田纳西州浸信会传教士》；JLM Curry 的《弗吉尼亚浸信会的斗争和胜利》；Broadus 的《James P. Boyce 回忆录》和 Sampey 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对于所表现出的特殊善意，作者要感谢佐治亚州的 Lansing Burrows 博士和密西西比州的 HF Sproles 博士，路易斯安那州的 JL Furman 先生，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已故的 WG Whilden, Esq.。

BFR

乔治亚大学，1898 年 1 月

《南部各州浸信会的历史》

第一章

早期痕迹

1682年，一群富裕而令人尊敬的移民离开了英格兰西南部的家园，在英国著名海军上将的兄弟汉弗莱·布莱克的带领下，启程前往美洲。他们在查尔斯顿现址附近的卡罗来纳州海岸登陆，沿着库珀河向上行驶了一小段距离，并在河西岸建造了他们的临时住所。这些移民的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导致像格雷厄姆这样有能力的权威作者，在他的《美国移民史》中称他们为对于卡罗来纳人口的“最有价值的添加”。

从同一来源我们了解到，汉弗莱·布莱克先生与那些跟随他的人们的信念相同，他将自己的财产用于促进移民到美国的计划，以便他们可以逃避迫害的威胁。在查尔斯顿附近登陆的移民者中有约瑟夫·布莱克，他是汉弗莱·布莱克的侄子；虽然他不是浸信会教徒，但在尊重宗教自由的观点上，对这个教派深表同情。他的妻子布莱克夫人和她的母亲阿克斯特尔夫人一样，是一位最热心的浸信会教徒。约瑟夫·布莱克注定要在该省未来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已经是伯克利勋爵的朋友和受托人；伯克利勋爵是该省的领主之一，后来被选中与浸信会教徒保罗·格林博尔和其他五人一起修改最初由著名的约翰·洛克制定的《基本宪法》。布莱克先生从担任该省省长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到结束，表明他是一位毫不妥协的宗教自由倡导者。

大约在刚才提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威廉·斯克里文 (William Screven) 和一群受迫害的人从缅因州的基特里 (Kittery) 逃离，并加入了库珀河 (Cooper River) 的居民地。有迹象表明，这些彼此和谐的移民者团体因此聚集在一起是相互理解的结果。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联合移民者的所在地被命名为萨默顿。在《英国浸信会历史》中，作者Ivimey 提到英格兰萨默塞特郡萨默顿的会众在 1656 年与其他会众合作，发表信仰告白。这份供词由 25 人签署，其中包括来自萨默顿的威廉·斯克里文 (William Screven)。25 年后，

我们发现威廉·斯克里文 (William Screven) 在缅因州皮斯卡塔夸河的基特里 (Kittery) 从事在自己家中举行宗教集会的活动。

斯克里文先生离开新英格兰前往南方，并于 1682 年底左右到达查尔斯顿。根据 1682 年 9 月 25 日在基特里通过的宪法和教会盟约的签署，查尔斯顿第一教堂可追溯其起源。库珀河上的这些浸信会教徒，部分来自英格兰，部分来自缅因州，是最早在南方定居的人。每个星期天早上，萨默顿定居点的家庭都会乘船顺流而下，随着退潮，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查尔斯顿做礼拜，下午则悠闲地划船逆流而上回家。早上开始敬拜的时间取决于反复无常的退潮，而且很可能在正午和十点钟举行。在查尔斯顿建造礼拜堂之前，礼拜是在“国王街一位威廉·查普曼 (William Chapman) 的家里”举行的。毫无疑问，浸信会是第一个在查尔斯顿建造的教堂。

很自然地，威廉·斯克里文 (William Screven) 成为了最初由联合移民者在萨默顿及其附近建立的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 1706 年，退休后到温耀湾 (Winyaw Bay)，购买了土地并在现在的乔治敦 (Georgetown) 所在的地方建了一个家；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仍继续在他周围的贫困定居点担任传道人。斯克里文先生从教会牧师职位退休后，一位名叫怀特的英国传道人被呼召接替他。怀特先生在查尔斯顿的牧师生涯很短暂，因为他很快就去世了。教会成员们再次转向他们可敬的前任牧师寻求引领。大约在同一时间，斯克里文先生接到波士顿第一教堂的呼召；他回复说：“我们从英国来的牧师已经去世了，我也将不久于世。” 尽管年事已高，斯克里文先生仍继续为教会服务了七年，并于 1713 年 10 月 10 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在汉弗莱布莱克领导下的移民者离开英格兰后不久，另一群人在英格兰北部贵族卡德罗斯勋爵的领导下也来到卡罗来纳，其中大部分是浸信会教徒，并

定居在罗亚尔港岛。但由于遇到邻近印第安人的敌意，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西班牙定居点的敌意，他们在 1686 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将住所迁至埃迪斯托河口。其中许多成为查尔斯顿第一教会的成员，从而大大增加了该教会的力量和效率。

1700 年，查尔斯顿和邻近地区的人口约为 5500 人，其中大部分在市区内。那时，与该省有关的所有神圣崇拜设施和所有学校都被限制在查尔斯顿的范围内。边远地区的人口为传教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场地，南卡罗来纳州传道事业的先驱、浸信会教派的传道人们，热心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英国海外福音传播协会直到 1707 年才进入这个领域，但无论他们的代表走到哪里，他们都发现浸信会先于他们。

斯克里文先生去世时，卡罗来纳州的人口约为一万五千人，其中整整一半人口是奴隶。处女地出产最可喜的收成，森林出产大量上等木材供远方市场使用，森林中盛产野味，溪流和海洋中盛产优质鱼类。只有当地传道人的勤奋才能与商业区的勤奋和节俭相提并论。

威廉·皮尔特 (William Peartt) 是继承斯克里文 (Screven) 的牧师，他是教会扩建的最勤奋和进取的倡导者。他在查尔斯顿教堂担任了十年的牧师，在此期间，他在埃迪斯托岛、阿什利河和距查尔斯顿 16 英里的斯托诺建造礼拜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有机会，查尔斯顿的牧师就会亲自到这些宣教站传教，或者授权一些有恩赐的教会成员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威廉·蒂利 (William Tilley) 首先是查尔斯顿教堂的执业医师，之后作为受命的牧师，在埃迪斯托岛提供了宝贵的医疗服务。直到这段时期之后的几年，这些站点都没有成为有组织的教会。

弗吉尼亚——虽然弗吉尼亚早在 1607 年就有人定居，但浸信会教堂直到 1714 年才组织起来，那是一个多世纪后的事。浸信会教徒散布在弗吉尼亚的某些地区似乎很清楚。怀特岛县的一小部分浸信会响应第一个鼓励通知，向伦敦浸信会传教士协会发出呼吁。两名传教士，罗伯特·诺丁和托马斯·怀特，从伦敦被派遣去弗吉尼亚，但后者在到达美国海岸之前就去世了。然而，诺丁先生安全地到达了该省，并立即热心投入到福传工作中。由于期待英国牧师的到来，浸信会团体似乎已经在詹姆斯河南岸的伯利成立。1714 年组织成立，现在被称为 Mill Swamp 的教会的宪法立即生效。后来，诺丁从英国得到了另外两名传教士琼斯先生和明茨先生的支持。来自伯利，在怀特岛郡，这些热心的传教士越过萨里郡，在布兰登建立了另一个教会。这被认为与今天被称为奥特丹教堂的教堂相同。

大约 1743 年，来自马里兰州的浸信会传教士进入弗吉尼亚北部，那里现在人口稠密。

这项传福音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应该是马里兰州萨特浸信会教堂的埃德蒙海斯和托马斯耶茨。

在伯克利、伦敦和罗金厄姆县不断扩大的定居点中，这些马里兰州的传教士发现了布道工作的硕果累累的领域。这些传道人在弗吉尼亚州的这一部分事工由牧师接任。Loveall、Heton 和 Garrard，最后一位于 1754 年从宾夕法尼亚州搬来。他们以强烈的热情在不同的定居点挨家挨户地传播救赎的信息。只要有会，他们就会指定举行公共敬拜的场合，参加这些敬拜的人几乎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少人会骑行 40 英里去听福音。大群人会聚集在宽阔的树荫下、灌木乔木下，甚至在宽敞的畜棚下，听讲道。

在此期间，舒贝尔·斯特恩斯 (Shubael Stearns) 先生从 New Lights 或 Separates 来到浸信会，并在 1740 年左右在怀特菲尔德的布道下皈依。他从事布道多年，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查考新约圣经关于洗礼的问题。结果导致他放弃了以前的婴儿洗礼的观点，并与浸信会教堂结盟。1751 年 5 月 20 日，他在康涅狄格州托兰接受怀特·帕尔默 (Wait Palmer) 的浸礼，并立即被任命为牧师。在新英格兰短暂停留后，斯特恩斯先生移居弗吉尼亚，在伯克利和汉普郡工作。随后他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县，我们稍后将有机会讲到他的消息。

丹尼尔·马歇尔 (Daniel Marshall) 是一名长老会教徒，他在该教派担任执事近二十年。在怀特菲尔德布道的影响下，他燃起了新的热情，并热切地渴望有机会在萨斯奎哈纳河源头附近为莫霍克印第安人传播福音并施行圣餐之礼。但印第安人野蛮部落之间的敌对行动促使他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康诺戈吉格，然后又搬到了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被引导对浸信会的信仰和秩序进行公正的调查，并因而与浸信会教堂联合起来，沉浸其中，并立即获得传教许可。和斯特恩斯一样，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搬到南方并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哈格沃里；马歇尔是斯特恩斯的姐夫。

弗吉尼亚最早的浸信会教堂，就像大多数最早在南方组织起来的教堂一样，深受阿民念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许多南方最早的传教士直接来自英格兰，并且是大不列颠浸信会原则的倡导者。虽然这些早期传教士坚决坚持洗礼和主餐的教仪，但并不要求信仰和皈依作为先决条件。

南方浸信会主要感谢费城浸信会协会纠正这种教义上的松懈。这个协会委派本杰明·米勒和彼得·P·范霍恩向南走访浸信会教会，“并在他们中间安排事情。”有些人对这些属上帝的人持怀疑态度，但一般来说，他们受到教会最热烈的欢迎，并以明显的注意力聆听他们。他们在南方各州长期旅行的结

果是，南方各浸信会教会普遍放弃了松懈的信仰实践并采纳了常规浸信会的观点。

马里兰州——当我们转向马里兰州寻找浸信会在该省的最初踪迹时，我们发现了一种与该省或弗吉尼亚州存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情况。在马里兰州，最早的浸信会信徒享有比波托马克河西岸的弟兄们更大的自由。早期的公民和宗教精神在 1649 年马里兰州议会的一项立法中得到体现：

任何自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得在其信仰方面或自由行使宗教方面受到骚扰，或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迫信仰或实践任何其他宗教。就宗教教义骚扰任何其他的人应向受害方支付三倍的赔偿金。以宗教区别的侮辱性绰号责备任何人，受害人将被没收十先令。任何人辱骂圣母或使徒，将被罚款五英镑，但褻渎上帝将被处以死刑。

在颁布这项法律时，马里兰州处于罗马天主教统治之下。发现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表现出如此自由的情绪，对我们而言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我们牢记当时浸信会坚决反对罗马教徒对马里兰州不同地区的侵占时，这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1709 年，一位名叫亨利·萨特（Henry Sater）的普通浸信会代表从英格兰到达马里兰，并立即对浸信会原则的传播产生了兴趣。他的工作成果是在 Chest 建立了一个教会。坚果岭教会，于 1742 年在马里兰州成立，是那里的第一家浸信会教堂。这座被命名为 Sater's 的教堂位于巴尔的摩以北约 10 英里处，至今仍保持着礼拜。教会几乎从一开始就蓬勃发展，成员人数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其成立后的十二年内，它能够派出一个移民群体在哈福德县的温特伦组织一个教会。这座名为哈福德的教堂由约翰·戴维斯牧师主持；他于 1809 年去世，并因其书作而受到极大的尊重。

萨特教会的成员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表现出相当大的传教热情，在弗吉尼亚

北部建立了浸信会教会。然而，由于信仰上的缺陷几乎耗尽了它的生命，它后来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繁荣。在这两个教会组织后不久，马里兰州的浸信会传教注意力开始转向巴尔的摩市。该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于 1785 年 1 月 15 日成立。其最初的成员只有 11 人，除了牧师刘易斯理查兹牧师之外，都是来自哈福德教堂的成员。哈福德教会也是另外两个教会的母体，即坦尼敦教会和火药教会。巴尔的摩第二浸信会教堂由约翰·希利牧师于 1797 年成立。两年前，希利先生与其他五人一起从英国来到巴尔的摩。这位非常有价值的、属神的人享有罕见的殊荣，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担任同一间教会的牧师。他还有幸在马里兰州乃至南部组织了第一所浸信会主日学校。几乎从一开始，马里兰州的浸信会注意力就集中在巴尔的摩市。

更多的情况。

北卡罗来纳州——我们无从得知浸信会教徒在北卡罗来纳州首次定居的确切日期。摩尔在他的《北卡罗来纳州历史》中将 1653 年定为浸信会进入该省的日期。权威人士摩根·爱德华兹 (Morgan Edwards) 没有说明他们首次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时期，他说该省在 1695 年就有浸信会教徒。圣公会历史学家霍克斯博士 (Doctor Hawks) 提到了该省许多浸信会教徒的名字，并认为北卡罗来纳州的东部县与 18 世纪之前的时期有关。浸信会教徒们第一次进入该省的时间问题引起了很多猜测。这个建议并非没有理由：即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堂先于弗吉尼亚州存在。北卡罗来纳州居民享有的宗教自由超过许多其他地区。虽然这种自由如此广泛和完整地在这个省份盛行，但是，在弗吉尼亚，持不同意见者受到统治机构以及残酷和严格的法规的严厉镇压。卡罗来纳州直到 1729 年才分裂，但我们早在 1683 年就在查尔斯顿（位于后来的南卡罗来纳州）发现了浸信会，几乎是半个世纪之前。我们仍然无法在 1727 年之前在北卡罗来纳州找到活跃的浸信会团体；当时据说是第一座教堂由保罗帕尔默牧师在佩基曼斯县的乔万河地区建造。

从教会在乔万建立到 1755 年，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北卡罗来纳浸信会的繁荣是惊人的。他们不仅数量增长迅速，而且极具进取性。在同一时期，弗吉尼亚潮水区的浸信会是一群苦苦挣扎、不进步的人。

保罗·帕尔默 (Paul Palmer) 是著名的“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之父”，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士教会，是罗德岛纽波特的约翰·科默 (John Comer) 的通讯员，因为该地区的浸信会信徒不受干扰地享受自由。

就像已经注意到的居民地的那些人一样，与南卡罗来纳州不同，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是一般浸信会，倾向于阿民念主义。斯克里文和他在查尔斯顿的追随者是特别浸信会教徒或加尔文教徒，他们严格遵守预定和特别拣选的教义。1728 年，潮流转向反对迄今为止盛行的一般浸信会，而特殊浸信会在美国承担宗派方向，其结果主要归功于怀特菲尔德和加尔文主义者；费城和查尔斯顿成为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两个重要中心。我们已经注意到费城浸信会协会采取的行动，委派米勒和范霍恩向南旅行，以纠正从一般浸信会所持有的阿民念主义原则中产生的弊病。费城协会于 1755 年秋天采取了这一行动。查尔斯顿浸信会协会在 1755 年春天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当时该协会派约翰·加诺 (John Gano) 和罗伯特·威廉姆斯 (Robert Williams) 执行同样的任务。这些布道专员的共同努力非常成功。1755 年标志着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教堂的改革。

帕默于 1727 年成立了教会之后，约瑟夫·帕克 (Joseph Parker) 于 1729 年组建了梅赫林教会 (Meherrin Church)，并于 1740 年在桑迪润 (Sandy Run) 组织了另一个教会，该教会由梅赫林教会的一个移民地组成，还有另一个教会在 William Sojourner 的主持下于 1742 年在哈利法克斯县成立。十年后，我们发现教会的数目增加到十六个。

当 Gano、Williams、Miller 和 Vanhorn 到达北卡罗来纳州时，他们发现浸信会教堂的状况非常糟糕。在洗礼和圣餐之外，又增加了许多具有同等权威的爱宴仪式、洗礼后接手礼、洗脚、给病人抹油、相交的右手、慈善之吻和未经洗礼即公开献祭儿童。渐渐地，教会放弃了这些教义附属物，最终被说服采用了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

这场改革运动最坚决的反对者是约瑟夫帕克，他在梅赫林教会，强烈抗议采纳特殊浸信会（即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但是，宗教改革以如此压倒性的力量进行，即使像帕克这样强悍的对手也屈服了，加尔文主义永久性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堂中建立。由于他们与南方教派所享有的声望的关系，本省的浸信会会受到特殊的对待。

在舒贝尔·斯特恩斯和丹尼尔·马歇尔的领导下，北卡罗来纳州成为独立浸信会的伟大自由运动的中心和影响力。这种自由精神弥漫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教派队伍中，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伦道夫和奥兰治县。

佐治亚州——当浸信会原则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取得了初步进展时，在佐治亚州，勤奋的双手正在播下种子。

1733 年 1 月，一艘载有 126 人的 34 个家庭的英国船停靠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乘坐这艘“安妮号”船的乘客在詹姆斯·奥格尔索普的领导下；他的目的地是佐治亚。从查尔斯顿出发，这艘船将这群移民者带到了现在的萨凡纳；在那里他们在这些原始荒野中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家园。佐治亚的移民中有一些浸信会教徒，但他们一到这里就四处散居，并没有形成教会。最早到达这个新省份的浸信会教徒包括威廉·卡尔弗特、威廉·斯莱克、托

马斯·沃克、纳撒尼尔·波尔希尔、约翰·邓纳姆和莎拉·克兰西，其中最后两位与奥格尔索普同行。随着来自英国和美洲北部移民的加入，佐治亚的浸信会教徒的数量逐渐增加。

佐治亚最初的定居点是基于仁慈的思想。奥格尔索普提议在这些西部荒野中为贫穷但受人尊敬的英国人建立庇护所，他的计划得到了他的同胞协会的支持。为了供养那些荒凉荒野中身无分文的孩子，约翰卫斯理和詹姆斯奥格尔索普私下提议在萨凡纳附近建立一座孤儿院。由于某种原因，该项目从未由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实行，但 1740 年怀特菲尔德在萨凡纳建立了这样一个庇护所。1751 年，一位年仅 21 岁的年轻英国人被任命为怀特菲尔德孤儿院的负责人；在贝奇伍德身上，结合了良好古典教育的元素和有效演讲的天赋。尼古拉斯·贝奇伍德 (Nicholas Bedgewood) 担任孤儿院主管后不久，就被引导接受了浸信会的观点，但直到 1757 年，他才公开表示认同浸信会信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当时佐治亚省没有浸信会教堂。但在 1757 年的那一年，我们发现他前往查尔斯顿并请求奥利弗·哈特 (Oliver Hart) 为他施行洗礼；后者当时是那个城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两年后，贝奇伍德先生被任命为牧师，我们发现他一有机会就在孤儿院地区布道。1763 年，他开始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在那一年，他为一些人施洗，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一名有价值牧师的本杰明·施蒂克 (Benjamin Stirk)。贝奇伍德先生很可能得到了查尔斯顿第一教堂的授权，他是该教堂的成员，可以对在他的讲道下自称信仰基督的人执行这些浸礼教仪法令。这是南方早期浸信会的一种习俗，随着移民者的不断增加，他们来到未传福音的地区，并建立所谓的“分支教会”。随后教会扩张并独立存在。

受洗后，史蒂克先生开始布道，并证明是一位最热心和最成功的传道人。他搬到内陆二十英里的 Tuckaseeking，向他不时聚集到自己家里的人们布道。在成为萨凡纳河卡罗来纳一侧的尤豪教会的成员后，他很快就在

Tuckaseeking 建立了一个宣教站，成为尤豪教会的一个“分支”。史蒂克先生在这个地区度过了他的余生，以不减的热情传教，直到他于 1770 年去世。

第二年，Tuckaseeking 的一小群浸信会教徒得知查尔斯顿第一教堂的执业医师博茨福德先生正在拜访尤豪教堂，便向他发出了拜访他们的邀请。1771 年 6 月 27 日，博茨福德先生在当时担任 Euhaw 教会牧师的弗朗西斯佩洛特牧师的陪同下，拜访了这群小羊群并向他们布道。他是一名在查尔斯顿第一教会的支持下工作的传道人；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布道工作似乎仅限于萨凡纳的东边。在 Tuckaseeking 孤立无援的基督徒们敦促他与他们同在的情况下，他同意为他们服务一年，并获准将他的一部分时间用于向河两岸的定居点布道。

当该省南部的事业因此得到滋养时，奥古斯塔附近的东部边界也产生了兴趣。丹尼尔·马歇尔牧师 35 年前在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受洗，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卡罗来纳州度过，受到使徒热情的驱使，他追随文明的潮流向西进发，并定居在基奥基克里克，位于奥古斯塔西北约 20 英里处。在佐治亚州定居之前，他曾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马溪逗留了一段时间，从那里他多次访问萨凡纳西侧的定居点，尽可能地讲道，有时在外屋，有时在森林中的大树下。

有一次，当马歇尔牧师在树林里施行宗教布道、并跪下做开场祈祷时，突然被一只沉重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打断了他。那个人是当地法官，他对马歇尔牧师说道：“你是我的囚犯！”马歇尔牧师从虔诚的姿态中站起，面容慈祥、头发雪白，与那名严厉的法官并排而立。虔诚的传道人、马歇尔牧师，被那个法官通知他是违法者，因为他“在圣保罗教区传教！”简而言之，马歇尔先生违反了 1758 年的佐治亚法令，该法令规定殖民地的礼拜活动应“按照英格兰国教教会的仪式和礼仪进行”。第二天，在温和和耐心地接受审判后，

马歇尔牧师被命令离开佐治亚省，不得再以传道人的身份访问它。但是，他以热情和坚定的勇气大胆地回答说：“应当服从上帝还是应当服从人，你们自己判断吧”；囚徒传教士无视佐治亚的现行法规，继续坚持不懈地宣讲福音。在逮捕现场，在场的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愤慨；马歇尔夫人以对法律的严正谴责，流利地引用了一段又一段的圣经来表达这种情绪。严厉的警员塞缪尔·卡特尔格 (Samuel Cartlege) 对她所说的、受上帝启示的话语印象深刻；他被刺痛了心，并最终被引导归向基督。五年后，马歇尔先生为该名警官施洗，之后他信仰热忱，成为基奥基教堂的执事。再后来，塞缪尔·卡特尔格 (Samuel Cartlege) 先生被任命为传教士，半个世纪以来热心传扬福音。

Kiokee 教堂是佐治亚州第一个定期组织的浸信会教堂。它的宪法于 1772 年通过。马歇尔先生成为该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并继续从事与教会相关的工作，直至他去世。与马歇尔先生同时代的是桑德斯·沃克、所罗门·汤普森和亚历山大·斯科特，他们是真正的伙伴。

起初，佐治亚州的早期浸信会成员对普通（一般）浸信会教徒（阿民念主义）和特殊（特别）浸信会教徒（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异感到有些恼火，但这些差异最终通过摒弃普通浸信会成员的阿民念主义特征而得到解决。

肯塔基州。——当我们考虑肯塔基州浸信会的最早踪迹时，我们发现他们是该地区的第一批实际定居者。这些浸信会先驱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丹尼尔·布恩 (Daniel Boone) 是一名浸信会传教士。

当勇敢的布恩家族冒险穿过将西部隔离开来的阿勒格尼山脉，并大胆来到远处美丽肥沃的地区时，他们发现“这是一片美丽而微笑的土地，有树林、空地和流水，开阔的森林长得很高，很漂亮，还有无数的小动物在吃草，沿着它们无数代走过的小径漫不经心地来回徘徊。”就布恩家族的成员而言，他

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浸信会教徒，尽管这些伟大的人们从来不是任何教会的正式成员。

除了 Squire Boone，在定居点开始之前进入肯塔基州的第一位浸信会传教士是廷斯利（Thomas Tinsley）。据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在整个西方地区传福音的人。不知道廷斯利来自哪个地区，但据推测他是从弗吉尼亚搬来的。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和乔治·斯托克斯·史密斯（George Stokes Smith）在肯塔基浸信会的早期编年史中引人注目；他们于 1776 年离开弗吉尼亚并定居在新领土上。希克曼先生在到达一段时间后才成为传教士。他受托马斯·廷斯利（Thomas Tinsley）的引导进入圣工，并被证明是肯塔基州早期浸信会传教士中最活跃、最有效率的传道人之一。在那些继续翻山越岭在肯塔基州安家的移民者中，不乏浸信会教徒。和他们的先驱伙伴一样，他们部分是被大胆的进取精神所驱使，部分是被这个新发现地区的肥沃和壮丽所吸引。

与南方白人最初定居的大部分地区不同，肯塔基州并没有被印第安人占据，只是作为居住在其北部和南部地区的部落的共同狩猎场。在某些季节，来自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的印第安人将来到这个有吸引力的地区游猎。很自然地，这些野蛮部落遇到了白人定居者对他们（印第安人）最喜欢的狩猎场的入侵的坚决和血腥的反对。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冲突。各种可能的掠夺行为盛行。庄稼被毁，牲畜被杀或被赶走，房屋被掠夺和焚烧，居民被残忍地屠杀。潜伏的野蛮人会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对白人进行杀掠。这也许足以解释尽管肯塔基早在 1774 年就有人定居，但直到 1781 年才构成教会。该地区的混乱状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定居者不可能在没有野蛮人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集会。

1781 年 6 月 18 日，十八名浸信会成员在荒野中的一棵绿色糖树下聚会，

组成了肯塔基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第一个教会。这座教堂被命名为塞文山谷教堂，由弗吉尼亚州的约瑟夫·巴尼特（Joseph Barnett）牧师组建。约翰·杰拉德牧师立即被选为牧师。几周后，即 1781 年 7 月 4 日，雪松溪教会组织成立，再过不久，吉尔伯特溪教会又成立了。教会组织的精神迅速传播开来。不久，每个人口较多的社区都有浸信会教堂的存在。这有助于加速从南部较旧地区向这个受青睐地区的移民。

起初，这些先驱圣徒的礼拜场所非常原始。在温和的季节里，它们是上帝自己的神殿、树林；而在一年中寒冷或多雨的时期，拓荒者简陋的住所是这些朴素但虔诚的崇拜者的聚会场所。想象一个由大小和长度不均的圆木建造的木屋结构，部分用野生动物的皮遮蔽，部分用宽条状的树皮遮蔽；——这样，我们会对肯塔基州第一批定居者的家园有一个概念。他们没有工具，没有工业器具，除了偶尔使用的长柄轻头的斧头。得不到好木材；木地板更谈不上，所以这些笨拙的房子都是在平地建起来的，地板就是泥土。里面的家具同样粗糙。在这些简陋的小木屋里，肯塔基州的顽强定居者生活着，并聚会敬拜了很多年。他们被恶劣环境和野蛮敌人包围，他们的生命归功于不眠的警惕和坚定的心。在这些小屋中，原始敬拜者会聚集在一起，而一个或多个会在门口放哨，他们一边听传道人的信息，一边注意周围的森林。

除了那些已经提到名字的人之外，在肯塔基州浸信会历史的这些早期编年史中，威廉马歇尔是第一批成为该地区永久居民的浸信会传教士，另外有本杰明林恩，约翰惠特克和詹姆斯斯卡格斯。到 1780 年底，肯塔基州只有六名浸信会传教士。事实上，他们是该地区唯一的传教士，因为浸信会多年来在这个新居住的地区没有竞争对手。早期肯塔基州教会的精神，由于一般浸信会（General Baptists）引入的阿民念主义的影响，而受到严重损害。这种精神所产生的松懈的信仰实践导致了，虽然该地区有两万多居民，但还没有人因信仰而被接纳入浸信会教堂。这并不是因为早期的事工不够勤奋，因为

他们四处走动，边走边传道。而是，这是一段严重混乱的时期，随后出现了改革，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罕见的。

田纳西州——毫无疑问，最先迁入田纳西州的浸信会教徒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难民，他们是从阿拉曼斯战役——革命斗争的先驱——中逃亡的。无论如何，我们发现浸信会教徒在 1770 年之前就在东田纳西州。据说这些先驱浸信会教徒建立了两座教堂，但他们在 1774 年左右被印第安人赶走了。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同样如此，浸信会教徒是第一批领土内的基督徒，并且是第一批在那个荒野地区宣扬福音的人。关于浸信会早期进入田纳西州的现有记录，无法获得 1781 年之前的确切信息。当时境内有多达六间教会，其联谊会协会越过北卡罗来纳州的边界。

北卡罗来纳州的桑迪溪协会。1786 年，我们发现这些早期教会与其他几个教会一起参与了霍尔斯顿协会的组织工作。从阿斯普伦德 1790 年的登记册中可以看出，当时霍尔斯顿协会的教会有八百八十九名会员。十年后，同一个教会协会拥有三十七间教会，会员总数达到两千五百人。浸信会实力的增长与地区人口的增长相称。

James R. Gilmore (Edmund Kirke) 在关于田纳西州的这些早期时代，以及对那个时期先驱浸信会传教士的评论中，在他的《作为英联邦建设者的约翰塞维尔》中说：“他们的道德理论被浓缩成一个短语：——耶和华如此说。他命令的事情是对的；他禁止的事情是错的；圣经是他绝对不会错的话语。这样一种信仰，多么简单，却又多么崇高！”

受共同动机的驱使，整个教会成员从弗吉尼亚或卡罗来纳移民到田纳西州这个新的、诱人的地区并不少见。在该州的某个特定地区居住下来、并为他们的家人提供简陋的庇护所之后，移民者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在某个方便的地方

建立一个礼拜场所。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南方的先驱地区，当温暖的春天到来时，狭窄的冬季礼拜场所被放弃，转而在树林中自由地进行敬拜活动。

在一周内，传教士会耕种土地，并在星期日站在教会讲坛上。Tidance Lane 是最早进入田纳西州领土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了 Shubael Stearns、James Keel、Thomas Murrell、Messrs. Mott and Talbott、Isaac Barton、William Murphey、John Chastine 和 William Reno 的传承，他们都来自弗吉尼亚或北卡罗来纳。

当浸信会旗帜在田纳西州东部立足时，肯塔基州的安布罗斯·达德利 (Ambrose Dudley) 和约翰·泰勒 (John Taylor) 等热忱的传教士正在新领土的中西部地区开展活动。主要是通过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在田纳西州建立了第一批教会：红河教会和硫磺叉教会。

密西西比州。——1780 年，七个浸信会家庭从南卡罗来纳州移民到密西西比州地区，并定居在科尔溪河口，即纳奇兹上方约 20 英里处。这些勇敢的移民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大佩迪河地区；自革命开始以来，由于他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他们一直是托利党袭击者报复的特殊对象。这些忠诚的自由之子的家园不仅经常遭到掠夺，而且他们自己也会被托利党人从大比迪沼泽地的藏身处追捕。一方面是被纳奇兹地区土壤肥沃的报道所吸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将免于遭受南卡罗来纳州托利党这样狡猾的敌人的永久性骚扰，他们把脸转向了西方。在这支勇敢的天路者队伍中，老理查德·柯蒂斯 (Richard Curtis, Sr.) 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他们通过陆路前往霍尔斯顿河 (Holston River)；他们建造了小船，沿着田纳西河、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航行至纳奇兹 (Natchez) 上方的目的地。在途中遇到敌对的红人印第安部落后，几人被杀，幸存者终于到达了他们未来的家园。建立临时住所后，移民者的下一

个任务是为教会的礼拜场所安排。幸运的是，小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 Jr.）在离开南卡罗来纳州之前已获得讲道许可，自然而然地，他被众人邀请主持礼拜仪式。从这些非正式集会中诞生了塞勒姆教堂。

在此期间，纳奇兹地区名义上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于1777年被英国印第安事务总监从乔克托人手中买下；但在宗教上它处于西班牙天主教徒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定居点散布在广阔的地区。其中许多人被带领参加浸信会教会的敬拜，因为浸信会没有拘泥于形式，也因为它是热诚的。受到如此有利的会众敬拜活动的鼓舞，柯蒂斯先生逐渐将他的布道之旅扩展到更远的内陆地区。他的工作得到极大的祝福，几个月后有许多人皈依。由于没有正式任命按立的牧师，因此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谁应该为新皈依者施洗，因为没有任命的牧师可用。他们将此事提交给这些成员来自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母教会；他们得到以下答复：教会成员，通过选举、任命、按立牧者，为年轻的皈依者施洗，这很妥当。

这件事引起了轰动，这几乎证明对这个新生的移民地来说是严重的。在受柯蒂斯先生施洗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斯蒂芬·德阿尔沃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这冒犯了天主教社区，无疑会采取惩罚措施；但由于该地区处于大不列颠（英国）的统治之下，罗马教徒当然完全无权实施惩罚。如果这件事被搁置，就不会有麻烦了。但不久之后，一小群佐治亚人迁来这里，其中有一位名叫哈里盖尔的浸信会传教士，他热情多于谨慎，开始全面谴责罗马天主教教的腐败。与此同时，该领土暂时落入了西班牙人的手中。哈里盖尔（Harigail）的行为与德阿尔沃（d' Alvoy）（那名接受浸信会柯蒂斯牧师施洗的天主教徒）的积极工作密切相关。西班牙当局决定以柯蒂斯（Curtis）和德阿尔沃（d' Alvoy）为典型，将他们抓捕、定为主犯；并因此制定了一项计划，将他们作为罪犯送往墨西哥的矿山劳动。但是在得知这个残暴的计划后，他们潜逃、躲藏起来。西班牙官员的这种高压手段使该地区感到震惊。为了一心报

复，西班牙官员还试图抓捕哈里盖尔；要不是一个赌徒友好地揭露阴谋，西班牙人本来可以成功的；而这个赌徒又因此被逮捕并关进监狱几个月。另一位浸信会传教士巴顿汉纳（Barton Hannah）也被监禁，但他勇敢的妻子要求释放他，并威胁说，如果她被拒绝，就会引发人民的普遍起义，因此西班牙官长认为释放他是明智的。西班牙当局的报复行动使民众感到恐惧，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发现有谁敢冒着危险将马匹和装备运送给隐蔽的逃犯以供他们旅行。勇敢的女人克洛伊·霍尔特夫人最终承担了这项危险的任务，并为他们提供了给养、金钱和马匹，从而使他们得以顺利逃脱。

路易斯安那州——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任何地区，福音派宗教的传入都没有比路易斯受到更大的障碍。

根据 1724 年比恩维尔作为该省（路易斯安那）的法国总督通过的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除了罗马天主教之外，没有其他形式的崇拜是被容忍的。

浸信会教徒早在 1798 年就从密西西比州进入路易斯安那州。第一个冒险越过领土边界线的传教士是 Rev. BE Chaney，他从密西西比州的 Cole's Creek 社区搬到了路易斯安那的圣费利西亚纳教区。在该地区开始传教工作后，他立即被罗马天主教当局逮捕，但在承诺停止在该省内进一步传教的承诺后获得自由。他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就去世了。

下一个重要事件似乎是在距巴吞鲁日 9 英里的地方建立一座浸信会教堂，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的移民们就在那里定居。埃兹拉·考特尼牧师本人是南卡罗来纳州人，他于 1802 年移居到密西西比州南部边界，在那里他建立了一座教堂，后来也在巴吞鲁日社区为该团体服务。在这里又一次遇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干涉。考特尼先生被正式警告、要求停止在该省传教，并被告知如果他坚持不懈，最终将导致入狱。但他获得了镇长的支持，获准继续他的工作，

其结果是在巴吞鲁日附近建立了一座教堂。

对该州（路易斯安那）东部的下一个福音传播事件是，1813 年，尼波山和 Peniel 教堂是来自邻近密西西比地区的年轻传教士的劳动成果。这些教会于 1813 年获准加入密西西比浸信会协会；次年，路易斯安那州的赫普兹巴教堂成立并获准加入同一浸信会协会。大约 1816 年，组织了密西西比国内外浸信会传教士协会，该协会派遣詹姆斯·A·拉诺德森（James A. Ranoldson）牧师作为传教士进入路易斯安那州不断壮大的社区。拉诺德森先生将他的工作向南延伸至新奥尔良，1818 年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教堂。然而，这座教堂很快就被摧毁了，二十二年后才再次努力在新月城建立一座教堂。

1818 年，路易斯安那浸信会协会成立，共有五个教会组成。早在 1814 年，新奥尔良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就引起了美国浸信会三年一度大会国内宣教委员会的注意。詹姆斯·拉诺德森牧师（Rev. James Ranoldson）是该委员会到西南这个集市（新奥尔良）的第一位传教士。在这个四分之三人口是罗马天主教徒的城市，他继续工作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组织的努力都失败了。

1842 年，肯塔基州的 Russell Holman 牧师被三年一度的美国浸信会大会传教士委员会派往新奥尔良传教。在那以后的一年里，由十名教会成员组成的新奥尔良第一浸信会教会成立了。1854 年，另一座教堂 Coliseum Place 成立，WC Duncan 牧师担任牧师。

阿拉巴马州。——早在 1803 年阿拉巴马州南部就有白人定居点，但我们发现该地区浸信会的存在时间不早于 1808 年。该教派的第一批代表来自北部的田纳西州，跨越东部边界佐治亚州。约翰·尼科尔森、约翰·坎特伯雷和扎多克·帕克是最早在阿拉巴马州北部边境宣扬福音的先驱传教士。1808 年

10月2日，通过尼科尔森先生的努力，在亨茨维尔现址附近的弗林特河上组织了一座教堂，这是该地区的第一座教堂。这段时期过后不久，来自佐治亚州的威廉·科克伦（William Cochrane）开始在阿拉巴马州南部的坦萨斯（Tensas）定居点传道。后来，詹姆斯·考特尼、约瑟夫·麦基、雅各布·帕克和亚历山大·特拉维斯等高效率的福音劳动者加强了他的力量。这些人以使徒般的热忱而著称；这里没有道路、处处是无桥的大溪流，移民定居点之间被广泛分开，中间有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勇敢的传教士敢于跟随印第安人的足迹，有时步行四十英里，以赴约布道。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特拉维斯（Alexander Travis），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朴素与温和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他来说，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先驱传教士更重要的是，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为建立那里的基督教的基本基础而起到重要先驱作用。他们建立了最早的教堂。这些朴素而热心的上帝子民的手中的图书就是英文圣经，他们在白天的辛劳结束后，在松树结的火光下，在夜间研读它。

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早期的传福音工作是在该州印第安人的麻烦结束后的几年里开始的。目前无法确定佛罗里达州的传教工作是何时开始的。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佐治亚州南部的浸信会教会协会的早期记录表明，一旦他们能够这样做，这些机构的传教士就被派往佛罗里达州上部和中部传福音。这些在查塔胡奇河两岸开展工作的传教士认为佛罗里达是传福音的诱人之地，并使其与各自州的南部地区融为一体。直到后期，佛罗里达州的教会都是阿拉巴马州南部和佐治亚州南部浸信会教会协会的成员。

佛罗里达州的福音工作直到1841年左右才开始独立形成。佛罗里达浸信会协会是该州的第一个浸信会教会协会，大约在那个时候由莱昂县、杰斐逊县和麦迪逊县的教会以及佐治亚州托马斯县的一些教会组成。该协会于1845年或1846年扩展到Alachua，1854年又扩展到Santa Fe。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传教士很早就在彭萨科拉建立教会。但是在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据点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南方所有的沿海城市很早就落入了罗马天主教徒（西班牙人或法国人）的统治之下；直到南北战争之前，人们对那些国际大都会的兴趣很少。

1854 年，佛罗里达浸信会大会在麦迪逊县 RJ Mays 牧师的家中举行。然而，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该组织才有了显著发展。

西弗吉尼亚州。——浸信会教徒早在 1774 年就进入了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领土，辛普森溪教堂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七年后，新泽西州的约翰·安德森牧师组织了绿蔷薇教会，并于 1807 年在绿蔷薇浸信会教会协会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哥伦比亚特区的第一个浸信会教堂于 1802 年 3 月 7 日在华盛顿市成立，当时只有六名成员。他们依赖当时的国会牧师威廉·帕金森 (Rev. William Parkinson) 布道。成立五年后，OB Brown 牧师被召到教会担任牧职。

第二章

争取自由

寻求追溯浸信会的最初痕迹所调查的时间远远超出了现在要审查的时期。在考虑浸信会先辈为了在南方建立宗教自由而卷入的冲突时，我们将不得不向上追溯以找到这些麻烦的根源。

我们现在进入的时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多事、最激动人心、最多产和最有活力的时代。这一时期奠定了各州联盟在整个革命性未来的建立和维持所依据的基础原则。当旧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为了逃避政教联合造成的压迫而逃往美国时，这种邪恶政教联合的鼓吹者也来了，他们可能会将同样邪恶的原则移植到美国的海岸上。

在原来占领南方各州的地主的指挥下，种植这几个殖民地的人口主要是英格兰教会（英国国教教会，或圣公会）的成员。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这些美国殖民地的最初创始人对其反对者（即不从英国国教教会的清教徒）嗤之以鼻，并且在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执行要求时最为严格。对于那些非建制派的其他教派的人来说，宗教自由的前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任何保证。罗马天主教徒是这一点的唯一例外（即，罗马天主教徒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优待，而没有受到严厉迫害）。

正如我们所见，最早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人中有浸信会教徒。他们通常是旧世界教会暴政的逃犯。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敬拜上帝，或者甚至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完全忽略敬拜；他们开始传播这些原则。与这些观点一致，他们主张完全免除对他们无法赞成的制度或信条的强制性支持的要求（即，不从英国国教教会）。他们会在时机成熟时毫不犹豫地表达这种反对意见，尽管这种反对意见常常伴随着极大的危险。因此，当政府方面的税收遭到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浸信会以外的其他人）的抵制时（其税收用于支付英国国教教会的运营费用），对他们的迫害往往是暴力的。

威廉和玛丽在 1689 年通过的（英国光荣革命）宽容法案在美国和英国的浸信会中激起了巨大的希望。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该法案在美国长达二十年未能生效。虽然，正如 Woolsey 博士所说，它“只取消了对新教宗教崇拜

的最严厉限制；其规定是武断的、不平等的和不系统的”，但“它仍然是宗教自由的切入点”。这样一项法案的通过是英国议会对英国和美国持不同意见者（即清教徒）的让步。在美国，如果它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自由，那么至少，它会给浸信会带来更大的勇气。南方和北方的移民地都是仿照母国、英国的模样建造的。法律的精神，即使不是法律本身，也源自英格兰。在英国，对政府宗教的遵守是通过惩治、痛苦和刑罚来强制执行的。在 1606 年的宪章中，英格兰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在弗吉尼亚成立。它规定“上帝的真实话语和事工以及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扎根和使用，是依据现在在我们的领土上宣扬和建立的教义、权利和宗教。”

这得到了后来该地区立法的法律化大力支持，它谴责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是异端和危险的。在弗吉尼亚州英国国教教会主教制的排他性制度下，颁布了这种压迫性的法律，对所有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最残酷的迫害。1611 年的其中一项法律要求在移民地定居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英国国教教会（圣公会）牧师面前出庭并陈述其宗教观点。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他应该被公开鞭打一次。如果他仍然拒绝，他将被鞭打两次。第三次拒绝导致他每天都被鞭打，直到他坦白为止。除了在圣公会的聚会场所外，持不同意见者从事宗教礼拜是非法的。对每个人的货物、他的财产和他的庄稼征收税款，以支持圣公会主教部门、或为他们购买 glebes 或教区农场。如果持不同意见者缺席“当权派”教堂的“礼拜”，他将被罚款；缺席一个星期日罚款烟草五十磅，缺席一个月罚款两百磅。父母若拒绝给其婴儿洗礼（浸信会认为，只有成年的人才能够明白和认信福音救恩），受到的惩罚是两千磅烟草的罚款。弗吉尼亚州的原始成文法典记载了大量关于在其教区建造礼拜堂的法律的通过、教会神职人员的支持、强制婴儿洗礼、强制参加公共礼拜、强制使用《共同祈祷书》、必须遵守英国国教教会的秩序和宪法、等等；并禁止传道，禁止非英国国教教会牧职人员主持婚礼，禁止持不同意见者的敬拜聚会。也不存在削弱这些不公正法规的活力的倾向，因为如果没有受到基督教软化影响的制约，或者

没有被不利的公众情绪吓得无所作为，这些压迫性法律就会被残酷地执行。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些严酷法律的可怕性质，这里引用其中的一条：

“鉴于，许多分裂教会的人出于对正统宗教的反感，或者出于他们自己异端发明的新奇幻想，拒绝让他们的婴儿孩子受洗，因此颁布，所有蔑视神圣的洗礼圣礼的人，——如果他们不将孩子带到该县的合法牧师那里接受洗礼，那么，他们将被罚款两千磅烟草；其中一半给告密者，一半给公众。”

这条法律最初是为贵格会准备的，但被大力执行以反对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浸信会。这场针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冲突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各个可能的方向展开。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持不同意见者因其宗教观点而被开除。男人和女人都因未能参加圣公会的敬拜服事而被带到政府法庭并被罚款。这种残酷的立法以及被压迫者的英雄主义的一个显着例子出现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塞克斯法院的记录中。Lucretia Pritchett 修女是真正的勇敢者：她在每个法庭都出庭，而每次都被罚款。

到目前为止，为自由而进行的最激烈的斗争是由弗吉尼亚浸信会进行的。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该省的冲突持续不断；浸信会拒绝停止冲突，直到教会与政府联盟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消灭。而另一方面，弗吉尼亚的那些建制派英国国教教会的当权人士，就像是高傲而自负的骑士，是傲慢的家伙；他们面对这些举止优雅、温和血统的浸信会教徒，把他们看作是弗吉尼亚的无礼民众，并对他们只表现出残酷的不容忍。他（建制派教会当权人士）穿着靴子，身着马刺，举止高贵，对弗吉尼亚那些朴实无华但诚实可敬的浸信会教徒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无辜的人们受到的待遇主要是由于当权派对他们的蔑视和敌视所导致的。他们（浸信会教徒）是“残酷的嘲笑和鞭打，是的，还有束缚和监禁”的对象，因为他们被视为世界的垃圾。确实，有时，因为这些浸信会教徒被当权派如此蔑视，以至于他们完全逃脱了迫害（即，他们的敌人如此蔑视他们，以至于不屑于迫害他们）。那些弗吉

尼亚的当权派和英国国教教会成员们冷笑着说，只有弱者和恶人才会加入令人无法容忍的浸信会。据那些弗吉尼亚当权派看来，他们（浸信会教徒，即那些当权派眼中的恶者和弱者）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如此不堪，以至于他们很快就会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体面的争吵而化为乌有（换言之，浸信会的那些当权派、建制派的敌人们认为，浸信会教徒都是乌合之众，必定会内部分裂，并迟早解体）。

然而，（尽管浸信会教徒在一些地方由于被建制派蔑视、而没有受到严厉对待和惩罚），在许多其他地方，刑法已竭尽全力镇压浸信会，因为浸信会拒绝侵犯他们的天赐权利（即，浸信会教徒认为，他们按着自己良心、遵照圣经指示的样式与命令、来聚集敬拜上帝，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权利）。

在弗吉尼亚，英国国教教会建制派的深深的蔑视加上强烈的恶意，导致浸信会事工遭受最残酷的对待。同一个人只要忠于当权者就受到当权者的高度尊重，一旦他接受了被鄙视的浸信会教徒的原则，就会突然变成嘲笑和蔑视的对象。塞缪尔·哈里斯（Samuel Harriss）在皈依浸信会之前，是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值得信赖的公民。他在社会上担任的几个重要职位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最有声望的公民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在不同时期担任弗吉尼亚英国国教教会教会守望者、治安官、治安法官、伯吉斯县官员，民兵上校，梅奥堡的队长，以及军队的后勤官员。但在 34 岁时，他被引导归向基督，受洗，并被按立为浸信会传教士。这足以引起圣公会神职人员们的蔑视和愤怒，并向哈里斯先生发出他们的激烈咒骂。

有一次，他因扰乱治安罪名而被捕并被送上法庭。当时，他遇到了一位威廉姆斯上尉，后者“强烈指责他是流浪汉、异教徒和到处煽动叛乱的人。”哈里斯先生为自己辩护。法院驳回他的请求，并要求哈里斯先生在一年内不许再次在卡尔佩珀（Culpeper）布道。这位受迫害的传教士说，由于他的家远

在两百英里之外，所以这段时间他可能不会打扰他们。越过蓝岭，他在谢南多厄山谷布道；但神意的安排很快又把他带到了卡尔佩珀，在那里，他违背了他之前被逼迫许下的承诺，再次布道；他说：“几天前，我在法庭上部分地向魔鬼承诺，一年之内，我不会再到本县传道了。但魔鬼是个背信弃义的恶棍，与他立的约是不可遵守的：因此我要传道。”他在卡尔佩珀县的讲道不再受到打扰；但有一次，在奥兰治县，他在讲道时被前来破坏的人抓住、拉倒，被无情地拖来拖去，他的头发和腿受伤，但最后他被他的朋友们救了出来。还有一次，他在讲道时被前来破坏的人故意撞倒了。他们敬拜的聚会常常被弗吉尼亚英国国教教会的主教团严重干扰，有时甚至直接被勒令解散。

当这些浸信会教徒在树林里或私人住宅中进行热忱礼拜时，英国国教教会（圣公会）的人有时会向浸信会传教士的头部投掷石块和其他东西。有一次，一位圣公会牧师带头前来反对浸信会会议。浸信会传教士在执行最神圣的仪式时经常受到他们侮辱。施行洗礼时，迫害他们会骑马下水，并以亵渎这些最庄严的仪式为乐。有一次，罗伯特·韦尔（Robert Ware）正在布道，他遇到了两个拿着酒瓶子站在他面前喝酒的人，他们不时地把瓶子递给传教士，并咒骂着他。由于无法以这种方式扰乱他，他们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纸牌，就在他离开后刚一关门时，就开始在他刚才讲道的讲台上玩牌。

执法人员超越了他们的权力范围来监禁浸信会传教士，因为没有法律禁止这种滥权行为。因此，浸信会传教士常常因所谓扰乱社区安宁的罪名而被捕。

据信，1768年6月4日，弗吉尼亚州斯波茨瓦尼亚县发生了第一次因布道而被监禁的事件。当时约翰·沃勒、刘易斯·克雷格、詹姆斯·蔡尔兹等人“被治安官逮捕、并被拖到三名地方法官面前；法官们站在礼拜堂的院子里，以一千英镑的罚款条件要求他们两天后出庭。在法庭上，他们被指控为扰乱和平秩序的人”。

他们在受审时遭到控方的某位律师的强烈指控，后者对法庭说：“诸位大人，这些人是和平的极大破坏者；他们无法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而不对其讲述圣经”。但在法庭上，他们用圣经的大段经文为自己辩护；其中一个，沃克，尤其巧妙地为自己和他的同伴进行了有力辩护。事实上，他们的自我辩护是如此巧妙，以至于迫害者陷入了困惑，最后采取了权宜之计，提议要求他们“承诺不再在县城传教一年零一天。”但他们最终拒绝接受这个建议，因此被送进监狱。当他们沿着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街道前行时，被护送他们入狱的警卫包围着，这些和平温柔而不带攻击性的传教士开始唱着赞美诗：“通往死亡的道路宽阔。”

一个月后获释后，克雷格先生前往威廉斯堡，在那里他向副州长 Hon. 约翰·布莱尔提出要求，释放他的同志。随即，布莱尔先生向斯波茨瓦尼亚的官员致信如下：——

+++++

先生：我最近收到一封信，由许多不在场的可敬的绅士联名，抱怨浸信会。在这封控诉信中，除了指控他们跑进私人住宅制造纷争之外，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们不当行为的细节。克雷格先生和本杰明沃勒先生（浸信会传道人）现在和我在一起并否认这些指控；他们告诉我，他们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宣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咨询了总检察长，他认为普通法院只有颁发执照的权利，因此，我将他们转介给法院；但在他们向总检察长提出申请后，他们给我带来了这封信，建议我写信给你：他们的请愿是正当的，宽容的行为（经验表明，迫害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会反而增加他们的成员数量）应当使他們有权根据自己的良心以适当的方式申请获得许可的房屋以敬拜上帝；我说服自己愿意相信，诸位先生们会安静地忽略他们的敬拜聚会，直到法庭定夺。

我听说他们主持圣餐之礼的方式与我们的方式很接近，与我们教会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洗礼，以及他们更新古老的教会纪律；他们借此改造了一些罪人并使他们成为真心悔改者。不仅如此，如果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游手好闲，忽视了本应该的劳动和养家糊口的责任，这样的人就会招致他们的谴责；这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这是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这样的行为。但至少我希望所有人在法庭定夺之前都能保持安静。

致我非常尊重的，

先生们，等等，

你谦卑的仆人，

约翰·布莱尔。威廉斯堡，1768年7月16日。

+++++

收到这封信后的四十三天后，才为被监禁的传教士采取任何措施；在该监禁期限届满时，他们被一言不发地释放了。在被关押在斯波茨瓦尼亚监狱期间，这些传道人通过监狱的栅栏向聚集在外面的的人群布道。当时，有一群试图反对他们的暴民，看到他们在这种新情况下的讲道特别有影响力，于是聚集起来，用叫喊声试图淹没传道人的声音。从监狱获释后，这些热心的上帝仆人比以前更勤奋、更忠实地传道。对被救赎者的同情，现在加上他们布道的力量，使得副州长布莱尔先生在信中提出的宽容理由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即迫害只会给受迫害者带来更丰厚的结果。

1770年12月，两位热心的年轻传教士威廉·韦伯和约瑟夫·安东尼应切斯特菲尔德县的一些居民的邀请访问该地区，并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布道的性质引起了地方法官的反对，他们指责韦伯和安东尼“让人们疯狂”。两人立即被捕并投入监狱。官方提交了某些要求条件后，他们出于良心原因拒

绝接受其条件，并在监狱中待了四个月。但他们并没有闲着。好奇和同情的人群日复一日地在监狱窗边徘徊，韦伯和安东尼向他们布道。对此二人的监禁导致的结果完全破坏了他们被监禁的目的，因为这是切斯特菲尔德县一项伟大福音工作的开始，并导致浸信会原则在该县整个地区广泛流行。韦伯和安东尼从切斯特菲尔德监狱获释后，他们回到了古奇兰县。韦伯从那里前往米德尔塞克斯县，在那里我们看到他再次被投入监狱。

当时，在他布道时，一位地方官员拿着一根棍子接近了他；要不是有人从后面抓住那根棍子，该名官员当时就会把这位传教士打倒在地。此时，还有几位浸信会传教士也在场；他们都被捕了；地方法官得到了一名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牧师、两名治安官和一队当地人马的支持。这次被警察逮捕的传教士是威廉·韦伯、约翰·沃克、詹姆斯·格林伍德和罗伯特·韦尔。陪同他们参加布道会的还有一位平信徒，托马斯·沃福德（Thomas Wofford），他被军官们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身受多处重伤，倒下了。官府人员对这些旅行牧师的马鞍包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搜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携带叛国文件。官府未能发现这一点，于是试图分别向每个人勒索；官府人员把每一个人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要求他们不再在该县传教；地方法官承诺在提供这种保证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获得释放。但该提议遭到他们迅速而坚决的拒绝。四位传教士立刻被扔进了满是虫子的监狱里。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他们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前来为被监禁的传教士提供安慰。当这些同情者聚集在监狱范围内时，这个机会被他们抓住了。就在那里，他们带领监狱栅栏外的群众进行神圣的礼拜，并宣布每周三和周日在监狱窗口举行敬拜集会。群众在布道时蜂拥而至，以至于他们的敌人被彻底激怒，并在礼拜期间敲鼓，以淹没布道者的声音。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中，被监禁的传教士实际上是胜利者，因为这些混乱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同情，并在该地区后来赢得了对浸信会传教士的广泛尊重。尤其是，当时，——这些囚犯被带去接受武装警卫看守的审判（就好像他们是其他刑事罪犯一样）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这

种同情心得到了很大增强。

在法庭上，法官闭耳不听他们的个人请求与申辩，而是命令他们：要不承诺放弃在县里的传教行为，要不返回监狱。他们安静地选择了后一种选择，并再次被投入缺食少水的监狱。经过四天的饥渴困境之后，他们的状况为人所知，朋友们为他们送来了许多饮食必需品，以至于这些食物足够牧师们甚至可以连续几天为厄巴纳镇（监狱所在地）的穷人提供食物。

每件事似乎都在促进福音的传播。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公众的同情心被彻底激起了。囚犯们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忍耐让公众更深地感受到了他们所受的委屈。除了这一切之外，韦伯先生的病又增加了公众对这些上帝仆人所受之不公平监禁的严肃关注；这有助于为该监狱笼罩上一种庄严的气氛，并使它成为全镇最受尊敬的地方。继续聚集在监狱窗户周围的人群变得更加好奇和焦虑，并逐渐对监狱产生了某种迷信般的崇敬。囚犯们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半月之后，这些人被释放，条件是为未来的良好行为提供保证金。

在卡尔佩珀（Culpeper），爱尔兰德（James Ireland）再次被捕并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地方法官粗暴地虐待他，然后将他投入监狱。他所遭受的严酷对待几乎要了他的命。在他被关押在监狱期间，官方不止一次尝试过要谋害他的性命，但每次都失败了。火药被用来将关押他的监狱房间炸毁，但这次尝试失败只是因为火药的威力不足。另一次试图用硫磺窒息，还有一次使用毒药试图杀死他。这些反复从死亡中解脱出来的奇迹，再加上来自外面的兄弟们的爱的情感，把他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属灵的安居处。他的热忱精神使他在狱中写信时，以“来自我在卡尔佩珀的宫殿”来作为他的信件落款。就像他那些其他被囚禁的弟兄们一样，爱尔兰德从他的铁栏杆窗户向人群布道。在卡尔佩珀县，Sanders、Craig、Maxwell、Corbley 和 Ammon 也因布道而入狱；两名教会成员麦克斯韦和班克斯因举行祈祷会而被捕；德莱尼不是浸

信会教徒，但他因允许在他家中举行集会敬拜上帝而被捕；当局变得如此不容忍，充满迫害精神。

历史的讽刺意味在于，在卡尔佩珀旧监狱所在的同一地点，现在是一座浸信会教堂。同样，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厄巴纳监狱的原址，就是沃勒、威尔、格林伍德和韦伯曾经被关押的地方，现在也是浸信会教堂。弗吉尼亚为良心而进行的斗争的记录还有很多，甚至延续到美国独立革命战争初期。与已经列举的情况类似的迫害，在King and Queen县、卢嫩贝格县、奥兰治县、福奎尔县、卡罗琳县、里士满等县也都很普遍。

1774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其家乡各地区普遍存在的迫害深感震惊，他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朋友，说：——“这种恶魔般的、地狱般的迫害原则在某些人中肆虐；那些迫害者永远臭名昭著；据说参与迫害他人的那些圣公会神职人员可以为此目的提供他们的地狱配额。就在此时，邻县有不少于五六个良善人，因发表教义而入狱；而他们的教义其实大体上是很正统的。”

可以说詹姆斯麦迪逊的荣誉在于：——在弗吉尼亚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他是灵魂自由者的坚定朋友。他极力赞同早期浸信会信徒所提倡的福音派观点，而且不止一次，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麦迪逊先生成为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中、为浸信会请愿的、有力拥护者，并反对那些最有能力地反对浸信会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弗吉尼亚早期浸信会为摆脱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压迫而进行的斗争上。因此，这些斗争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为在南方（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所有地区中，该省的人民经历了程度最大的压迫。但是，圣公会教会的残酷行为并不仅限于弗吉尼亚，因为只要存在

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有害结合，就会存在某种形式的压迫。

1698年，查尔斯顿的浸信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默许了一项政府立法措施；该项措施在未来将会导致很大邪恶。然而在当时，在当地社会中大多数人看来，这种未来的恶劣前景并不是很清楚。这件错误是，查尔斯顿整个居住地区，包括浸信会教会会众，一致同意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查尔斯顿主教牧师（即，圣公会、或英国国教教会在当地的主教牧师）及其继任者永远获得一百五十英镑的年度薪水，并且享有一个房子，和两个仆人。”

该法案在约瑟夫·布莱克担任该省总督期间获得了通过。出于保持该省不同人群之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布莱克总督非常赞成该法案措施，并通过他的影响力、作为浸信会的朋友，他成功地获得了他们（浸信会教会成员们）的同意和合作。这一不公正的措施得到了当时在查尔斯顿担任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主教牧师塞缪尔马歇尔牧师的额外支持；马歇尔主教的性格和蔼可亲，并在当地很受欢迎。这最后一个事实，再加上布莱克州长的保守政策，使持不同意见者（浸信会教会成员）对关于该政策的随后之恶劣前景的所有担忧视而不见。

但后来，那些当地的既得利益者们（圣公会、或英国国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们）发现，可以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推崇英国国教教会，并将其在南卡罗来纳推进到法律上的卓越地位。当人们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圣公会神职人员们努力争取省议会中的大多数圣公会教徒的支持时，持不同意见者（浸信会教会成员）惊慌失措。果然，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圣公会神职人员们通过积极的策略，成功地将大多数对他们的狭隘观点持友好态度的人（圣公会教徒）选入了省立法机构。

这些圣公会政治教士们一旦掌控议会多数，就立即采取措施使他们获得的权力利益永久化。原先一开始就获得的优势（即布莱尔总督时期的法案）鼓励他们朝着在南卡罗来纳省永久建立教会权力的方向迈出更大胆的步伐。他们下一步是颁布一项法律，要求其后选出的所有议会立法者必须“遵守英格兰教会（圣公会、或英国国教教会）的宗教崇拜，并根据该教会的权利和惯例领受圣餐之礼”。任何议会候选人若未能遵守这一规定，那么无论他在普选中的票数有多大，都使他没有资格在议院获得席位。很明显，这样的程序可能使一个候选人成为议会议员，尽管他获得的票数最少（因为那些得票更多的候选人可能不符合关于遵守圣公会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法案措施是在格兰维尔勋爵的指导下制定的。

建制派、当权派的这种粗暴行为的结果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但这并没有阻止执政者继续滥用职权，因为在刚刚提到的措施之后，又颁布了另一项任意法案，该法案规定扩大和维持当权派的教堂礼拜模式。新法律规定：——拨款用于建造和维修圣公会的主教会所；圣公会教区农场和教堂墓地的土地通过公共捐赠、购买或业主的公款赠款提供；圣公会薪水由政府固定提供；从政府临时财库中支付给已建立教区的教区长、文员和教堂司事各样工资与资金费用。该立法颁布：——鼓励圣公会主教神职人员移居该省，并在法律指定的几个教区行使他们的宗教职能。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政府召唤的圣公会人员，他们一来就可以每人得到从省财政中拨出的二十五英镑奖励，并且法律规定给他们的年度津贴立即开始分发。

不但如此，还通过了同样令人讨厌的另一项法案措施：——设立了一个专断的高级专员公署法庭，“负责审理教会事务和维护南卡罗来纳州的宗教统一性”。

应当归于一些圣公会神职人员荣誉的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上述一个或两个法案遭到了某些圣公会人员的最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南卡莱罗纳教会法庭的成立，激起了（有圣公会参与的）海外福音传播协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派遣其他传教士，直到该法案被废除。他们立即采取迅速措施，提请祖国（英格兰本土）注意南卡罗来纳省盛行的暴政。关于这些事实的陈述给伦敦的英国上议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建议英女王废除南卡莱罗纳的冒犯性的暴政法律。大英贸易委员会建议废除所有权章程。这些令人讨厌的南卡莱罗纳法律最终被英国政府废除；从这时起，其特许宪章将被废除，该省将直接置于英国王室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 1720 年也在发生着进一步平民民主化权力增加的过程（下议院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九年以后，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北美。这种普遍的胜利所确保的最大程度影响是，对基督教福音派形式的容忍。当时，根据南卡莱罗纳新宪章，英格兰教会（即圣公会、或英国国教教会）在该省建制并仍然由公共政府出资维持，尽管据估计当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南卡莱罗纳人口是持不同意见者（即那些不从英国国教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们）。

北卡罗来纳的情况与上文已经描述的南卡罗来纳的情况非常相似。早在 1678 年，在约翰·卡尔佩珀（John Culpeper）的领导下，就提出了严厉的抗议，反对地方当局的宗教侵犯。1704 年，北卡莱罗纳议会颁布了一项非常偏颇的法案：“剥夺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担任任何公职的权利、利益、荣誉。”之前的议会（1702 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个选区应筹集 30 英镑以支持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名牧师。很自然地，这引起了公众的骚动，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团结起来——包括浸信会、贵格会、长老会和路德会。从威廉姆斯 1812 年出版的《历史》中摘录以下内容，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北卡罗来

纳的宗教不容忍现象：——

“正如我们所见，卡罗来纳已经开垦多年，然后在可敬的宗教外衣下，偏执或骄傲开始困扰居民。18 世纪初为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提供了专属服务。治安官被授权在没有圣公会牧师的教区主持人们的婚姻，并且禁止持不同意见者在公共场合集会礼拜。

“1741 年颁布规定，每个教区的自由业主应在复活节星期一选出 12 名教区牧师；这些牧师有权征收人头税，每次人头税不超过 5 先令，用于建造教堂、购买教产、和维持神职人员生活费用；他们各自的年度薪水不得低于 50 英镑。随后的一项法律将此数字增加到一百三十三英镑六先令八便士。根据另一条法律，圣公会牧师主持结婚仪式、颁发结婚证的费用应为 10 先令，而宣告结婚的费用为 5 先令。每个被选为教区牧师、却拒绝服役的人都将处以三英镑的罚款，然后教区会选出另一名成员代替他。据推测，在很多教区（尽管那些教区中可能大多数选民都是持不同意见者）都会找到十二名圣公会教徒，或者说准备宣誓就职的人，随之而来的是公众要为圣公会教堂缴纳税款。

“这条法律虽然不公正而且很狡猾，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有些教区没有选出教区牧师，或只是选出了持不同意见者，而他们中没有人愿意宣誓效忠圣公会。因此，在许多西部教区，没有为圣公会的牧师提供薪资。在多布斯总督执政期间，正如我们看到的，议会被发现能够通过上述的可耻法律；而在后来的议会会议上，该法律甚至被进一步推进、扩展，成为更强大的推行强制教会制度的暴政。”

1740 年，北卡罗来纳最严重的迫害发生在克雷文县的纽伯恩。似乎三位浸信会传教士布林森、福尔希尔和普瑞菲在申请在纽伯恩建造教堂的许可证时遇

到了某些控告者；这些控告者认为申请人犯下的数项轻罪违反和蔑视现行法律。传教士不仅被鞭打，而且被监禁三个月。同一法院的记录证明，在 1730 年至 1745 年期间，该地区对浸信会教徒的迫害相当普遍。所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对什一税制度的所有异议者强制执行，而另一个是对所有持异议的牧师执行该省的召集法，并禁止浸信会牧师主持婚姻。最后一项法律于 1776 年被废除。

与其他南部各州浸信会相比，佐治亚浸信会同样坚定地抵制国家对人民宗教特权的侵略。他们也坚定地拒绝向政府缴纳支持圣公会教会的税款。另外，他们也同样坚定地拒绝政府把公共资金发给他们、或用于支持他们运营教会。

1785 年 2 月 21 日，佐治亚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支持宗教的法案，规定任何社区中的“三十户家庭”都可以联合起来选择一名牧师“解释和灌输宗教义务”，并且，通过“每一百英镑价值的财产抽税四便士”，从公共税收中提取资金以支持这样的牧师；对此，佐治亚州浸信会立即提出抗议。他们本来很容易利用该法的规定得到利益，因为他们构成了该省许多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相反，他们联合起来发表反对意见，并由 Silas Mercer 和 Peter Smith 发出警告，祈祷废除如此令人讨厌的法律（因为它把支持宗教牧师的资金费用强行附加在整个社区的税收上）；最终，这个法律后来被取消了。

当最初定居在密西西比州的浸信会信徒践行宗教敬拜自由时，他们遇到的困难大大增加了。正如本书前文已经看到的那样，最初的密西西比浸信会信徒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纳奇兹定居点的进展迅速，引起了那里的罗马教士的强烈反对。然而，直到一些浸信会牧师开始对天主教徒的信仰进行

轻率的攻击之前，浸信会并没有面临暴力阻挡。这种无端的攻击（某些浸信会牧师对于天主教信仰的攻击）为罗马教徒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这种愤怒随着浸信会原则在密西西比河新定居点的盛行而积聚起来。许多罗马天主教徒皈依浸信会也丝毫没有缓解这种情况。

在 Curtis 和 d'Alvoy 逃跑后，Natchez 的定居点有一段短暂的平静，但浸信会教会继续或多或少地秘密举行会议，而罗马教徒则变得更加警惕。浸信会传教士欧文被迫隐藏了一段时间，以逃脱警惕的天主教牧师的魔掌，而贝利·钱尼则直接逃离了该省（密西西比），以免落入他们的手中。与此同时，皈依浸信会的人数继续增加，有一段时间，其中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洗，因为所有被授权的浸信会牧师都逃走了；但在紧急情况下，教会明智地选择了执事威廉·钱尼（Deacon William Chaney）来主持洗礼仪式。

不久之后，一位名叫马尔基的牧师出现在纳奇兹区。据说他是一位超凡能力的浸信会传教士，并且拥有卓越的精神。以前曾引起天主教徒极大关注的浸信会集会的兴趣，在马尔基先生的布道下又恢复了。由于最近镇压此类宗教集会活动的努力，天主教徒在马尔基的一次集会上派了一名军官逮捕他，但集会的会众被一种真诚的愤慨情绪所激起，大胆地抵制这种无端的干涉，并驱赶了军官和他的警卫。愤怒的人们决定不再处于防御状态，拿起武器，向当地堡垒进发，该堡垒由总督 Don Manuel Gayoso de Senies（西班牙人）指挥；之前所有的麻烦都是在他的怂恿下挑起的。总督被如此可怕的一群愤怒的人的出现吓坏了，发现自己太虚弱无法抵抗他们，于是同意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继续他们的宗教集会，但立即派了一名特工到巴吞鲁日寻求增援，并尽快赶来；援军一到就摆出敌对的态度。浸信会再次被击溃，马尔基等人离开该省，天主教暴政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大约在 1796 年，安德鲁·埃利科特上校被任命为美国的特别专员，与西班牙

牙纳奇兹地区的当局协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对此存在一些争议。埃利科特上校抵达后，浸信会牧师汉拿先生向他申请允许在他的护卫营地布道。对加约索（Gayoso）总督的尊重促使上校将此事转交给他决定；加约索总督同意了。汗拿牧师的布道引发了他与一批爱尔兰天主教徒之间的后续讨论，这些天主教徒此前曾狠狠地殴打过他。汗拿向 Gayoso 申请保护，但他被 Gayoso 总督立即逮捕，投入监狱，他的脚被绑在柱子上。这导致了总督和埃利科特上校之间的异议，后者威胁说，如果事情不迅速调整，就会摧毁西班牙堡垒。经过两周的正式谈判，汉拿先生获释。在西班牙人不情愿地放弃纳奇兹区后，美国人迅速建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据点，并任命贝利·钱尼牧师“在星条旗下传教”。一大群人向他致意；美国政府在纳奇兹地区举行的第一次宗教仪式令人愉快。

第三章

南方浸信会与革命

在为宗教自由而进行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之后，随后而至的是，为美国人民赢得公民自由的斗争努力。这似乎是一个（前者是宗教自由）导致了另一个（后者是公民自由），——如果这确实不是自然而然地涉及公民自由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同一场斗争，——以实现美国的自由原则。

因此，很容易看出南方几个殖民地的浸信会教徒将如何成为点燃独立战争革命之火的精神的迅速贡献者。近一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他们反抗暴虐势力的压迫。很自然地，他们不会将即将到来的斗争视为一场单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场涉及寻求自由的人民所珍视的一切权利的斗争。政治自

由固然是伟大的，但宗教自由是更伟大。

美国革命的第一个音符于 1771 年 5 月 16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拉曼斯响起。无论是在民事政治历史还是在宗教历史上，这一事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是相当大一部分美洲殖民者第一次反对英国王室代表的侵夺行为的民众起义。

民众愤慨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上一章提到的所谓“Vestry 法案”的通过；该法案于 1764 年在多布斯总督执政期间由议会通过。该措施的主要条款是用公共税收来支持圣公会神职人员薪资和建造圣公会礼拜堂；但评估和征收这些税款以及征收罚款和处罚所采用的方法一开始就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最初的规定是，法律要求拥有五十英亩土地的每个自由人都必须在复活节星期一在法院开会，选出十二名教士官（Vestry）。如果不这样做，一个人将被处以 20 先令的罚款，“由该县范围内的任何治安法官发出搜查令追缴。”为了排除所有持异议者，规定当选的教士官必须宣誓“不反对依法确立的英格兰教会（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的教义、纪律和礼仪。”这些教区官员被赋予征税、建造教堂和礼拜堂、支付牧师薪水的权力，以及负责购买教产，建造豪宅和便利的外屋，供养穷人，支付文员和教区职员的工资，并支付教区的其他杂费；如果他们未能或拒绝“征收足够的税款来满足”圣公会牧师的要求，圣公会牧师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治安官被要求以沉重的负担收取由此征收的税款。

执行这样一项法律的努力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普通民众很快就召集会议商讨怎样对此进行反对。这些会议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受欢迎的组织，称为“监管者”。多布斯总督非但没有因民众的不满而放缓措施，反而变得更加严厉，

群众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1764 年，威尔明顿创办了一家名为“北卡罗来纳公报和每周邮报”的报纸，提供时事新闻。这个先驱企业极大地帮助了人民的事业，因为它告诉他们不时为压迫他们而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敲诈勒索在政府的每个部门都变得普遍。洛辛说，“副测量员、入场员和其他下级官员，成为了执行上级诡计的行家。”事情正在迅速恶化，收到《印花税法》通过的消息后，情况丝毫没有缓解。1765 年 6 月，消息传到该省（北卡罗来纳）。大众集会变得普遍。人们非常激动。经过不止一次民众集会，人们于 1767 年 4 月 4 日聚集在希尔斯伯勒，并通过决议，在确定税款法案的合法性之前，不再缴纳税款；向官员支付不超过法律严格要求的费用，除非被迫这样做，然后公开表示不满；谨慎选举议会代表；向总督、理事会、国王和议会请愿，要求纠正冤情；保持成员之间的持续通信；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将所有不同的判断提交给整个法规制定过程，多数人的判断为最终判断。

在评论卡罗莱纳爱国者的这一行动时，洛辛（Lossing）说：“这次集会所通过的决议，几乎等同于宣告国家民事权力的独立。特赖恩于 1765 年成为该省省长，他试图通过对北卡罗来纳州议会施加不当影响来镇压监管者运动，并提到了监管者运动是起源于贵格会和浸信会的一个派系，旨在推翻英格兰教会（英国国教教会）。”

在这段动荡时期，浸信会的人数远超该省任何其他宗教教派，因为北卡罗来纳州 23 个县中的 17 个县有 22 座浸信会教堂。其中一些教堂，如桑迪溪教堂，拥有众多会员。甚至早在 1758 年，它的会员人数就有将近九百名。与浸信会相比，圣公会主教的会众人数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浸信会无法遵守当权派的教义（即要求，所有担任公职者，必须宣誓效忠圣公会体系），所以，所有政府公职都由前者担任。然而，浸信会会众（该省的大部分百姓）

支付了维持该省政府机构以及圣公会教会的大部分税款。

不难看出北卡罗来纳省多年来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必然趋势。当忍耐到极点的时候，人民公然造反。武装冲突发生在阿拉芒斯。主要由浸信会组成的“监管者”队伍被英国皇家军队击败，并逃往西部。结果是，北卡罗来纳省作为本来是浸信会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现在几乎完全被他们（浸信会教会）抛弃了。浸信会会众向西逃到肯塔基、田纳西和佐治亚，等等；于是在那些地方，浸信会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保守派浸信会教徒摩根·爱德华兹（Morgan Edwards）在 1775 年说：“这种逃散的原因是政府滥用权力；它在该省盛行太多，最终导致居民奋起武装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但在 1771 年 5 月 16 日被击溃后，他们（北卡罗来纳的居民）对看到更好的时代感到绝望，因此离开了该省。据说自从阿拉芒斯战役以来，有一千五百个家庭离开了；据我所知，还有更多的家庭只是在等待处理他们的种植园以后就跟随他们。在我看来，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不满是真实的，他们所受的压迫是巨大的。”

战斗发生地的桑迪克里克教堂的成员从 900 人减少到 14 人，这表明该浸信会社区的人数大幅减少了。

北卡罗来纳的浸信会教会从对他们的压迫中撤退，并开始质疑对人类权威的最轻微假设（即对于任何政府集权的权力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压迫使他们在主张灵魂自由原则时走向极端。这种精神表现在桑迪溪浸信会教会协会在后来三十年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以及亚德金浸信会教会协会在后来十二年的时间里，都一致拒绝选举任何教会协会主持人来领导或主持他们。由于他们站在如此极端的立场上，因而后来，约翰·加诺（John Gano）在南方传教之旅中，劝阻他们，不要他们跟随自己。

与北卡罗来纳的这些革命运动同时发生的，是弗吉尼亚和南方其他省份的浸信会的同样类似发展。长期的压迫使他们警惕地努力避免任何机会以助长英国和美国各地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增长（即，他们努力地想摆脱英国政府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南方浸信会迅速抓住这些优势，明智而有力地推动他们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没有停止或妥协。

作为公民，他们为公民自由而斗争；作为基督徒，为了宗教自由。

浸信会从未忘记一件事——废除所有合法的教会区分（即政府强行以法案规定，哪些教会体系是合法的，哪些教会体系是不合法的；浸信会对此强烈反对）。祖国（英国）日益增长的苛刻政策引发的政治危机促使浸信会更加积极地为实现这一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奋斗，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公民，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异教徒。他们所主张的是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以便前者可以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简而言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绝对的宗教自由。在这场比赛中，浸信会得到了长老会和社区其他成员的帮助。浸信会的精神完全不包含对任何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敌意，他们完全受原则驱使；这清晰地体现在他们1784年通过的弗吉尼亚大会章程中：“为了我们可怜的眼盲迫害者，以及为了我们亟待释放的弟兄”。

1775年，弗吉尼亚浸信会总协会纪念该省对英国进行军事抵抗的会议，同时在一项原则宣言中提出“公民政府仅仅对宗教的宽容是不够的；不应存在任何国家宗教机构；所有宗教派别都应该站在同一立场上。”为此，一个委员会被弗吉尼亚浸信会总会协会专门委派参加弗吉尼亚国民公会大会，并为实现预期目标而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尽管所要求的一切并没有都得到满足，但当弗吉尼亚国民公会恭敬地回答他们、并通过一项决议时，对浸信会的要求做出了非凡的让步，允许“持异议的牧师被允许举行神圣的崇拜并向士兵布

道。”这是弗吉尼亚宗教平等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弗吉尼亚国民公会的目的是安抚浸信会，使他们停止进一步的努力。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它只是激发了他们更大的能量和更激烈的抗议努力。如果它给浸信会带来希望和鼓励，那它一定是向当权派（圣公会）的神职人员表明，他们的权力已经开始衰落。但是，圣公会（英国国教教会）长期以来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利益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此，当权派的圣公会神职人员立即开始积极游说，分发请愿书以企图把圣公会主教团保留为弗吉尼亚的永久性合法机构；这反过来又激起了浸信会的反请愿书。浸信会的努力导致他们获得了一万人（其中主要是有选举权的自由业主）的签名。

1776年标志着通过了弗吉尼亚宪法的时代，该文书享有“世界历史呼唤自由、主权和独立国家公民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的殊荣。宪法以权利法案作为序言，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撰写的第16节规定了“最充分的宽容”。但通过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干预，“宽容”一词被删除，而是所有人都会被宣布平等地有权自由信奉宗教。经麦迪逊修正的著名部分内容如下：

“宗教，或者我们对造物主的责任以及履行它的方式，只能由理性和信念来指导，而不是由武力或暴力来指导，因此所有人都平等地有权根据良心的指示；所有人都有责任互相实践基督徒的忍耐、爱心和慈善。”

浸信会受到已经取得的胜利的鼓舞，现在在整个弗吉尼亚州鼓起新的勇气。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变得更具进取性。对于长期错误的忍耐加深了他们挣脱英国暴政枷锁的决心。他们激起了每一个可能的反对机制，并启动了一股强大的民众潮流，这股潮流正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向已经摇摇欲坠的当权派施压。除了浸信会教徒之外，其他人以前有些冷漠，并以传统礼仪的态度看待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而现在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反对当权派的群众队伍。长老会尤其如此，他们原来享有的特权大大超过了浸信会。1776年的

汉诺威长老会，在为所有教派寻求平等保护的同时，要求免除政府对于任何教会的支持税——只要是超出他们作为个人或出于自愿义务的选择可能同意的范围。”1776年，第一个独立立法议会的会议召开，是我们国家各教派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在立法机关召开之前，浸信会活跃了几个月，在整个弗吉尼亚州传播请愿书，要求登记那些赞成将宗教自由的好处扩大到每一类公民的人的名字。当立法议会大会在当年召开第一届会议时，它发现自己被如潮水般涌来的请愿信所淹没，因而不得不进行最认真的考虑。来自弗吉尼亚各地的大批请愿者清楚地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冲突。“拥挤”的请愿者被提交给一个由17人组成的委员会，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其中的成员。接下来是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较量，杰斐逊在他的自传中将其描述为“他所参与过的最严厉的行动事件”。他继续叙述道：“最终，委员会经过从10月11日到12月5日的激烈而漫长的辩论以后，决定：——废除限制宗教意见或自由的法律，并且免除持不同意见者为支持建制派教会而被迫缴纳的所有印花税、专项税款和强制税。”这是压倒性的胜利——向绝对宗教自由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尽管这场斗争是伟大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比赛还没有结束。看到当权派教会的基础正在逐渐被削弱，它的朋友们开始拼命阻止其摇摇欲坠的组织的溃败。因此，他们成功地确保了一项声明的通过，大意是规定应该为神职人员的继承和监督他们的行为做出规定。在通过的法案中，“明确保留是否不应通过法律对每个人进行一般评估，以支持他选择的牧师；或者是否应该全部留给自愿捐款。”（即，法案中包含了，是否应当对于每一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进行某种程度的核查的考虑。）

现在，通过立法措施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成果，浸信会愿意等待一段时间，相信他们的最终目标最终会实现。但作为爱国者和对移民居住地事业的忠诚，他们并没有闲着。来自库尔佩珀县的浸信会牧师、麦克拉纳汉长老，主要从浸信会教堂的成员中，为美国陆军征召组建了一个士兵连。当他作为他们的

队长带领他们去战斗时，他也作为他们的牧师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评论麦克拉纳汉长老的布道时，就他担任志愿者连队队长的服务而言，豪伊(Howe)在他的著作《弗吉尼亚历史》中评论说：“浸信会是公民自由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浸信会的杰出事工为华盛顿的事业带来了很大帮助；他宣布：“浸信会牧师是军队中最杰出和最有用的人之一。”扛起火枪加入美国军队的人中有戴维·巴罗牧师，他是那个时期浸信会事工中最杰出、最有用的人之一。在大屠杀的战场上，他的效率与他在家中和平服事时一样高效。丹尼尔·马歇尔牧师虽然年事已高，尽管多次受到英军的警告和威胁，但仍坚持不懈地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爱国呼吁。他如此顽固地谴责祖国（英国），以致于最后被捕并被置于严密看守之下；但在获准发言后，他用劝诫和祈祷压倒了他的敌人。

浸信会反对英国王室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的任何特定地区。他们在整个南方都受到同样精神的驱使。南卡罗来纳省浸信会是最先向省议会表示忠诚的省份之一。她组织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对行政权力的称呼，由 13 名杰出公民组成。该议会的主要关注之一是通过公开演讲让人们通过使他们与新成立的政府和解，来争取他们的支持，消除他们的偏见和误解，从而同情（美国独立）革命运动。从革命伊始，奥利弗·哈特牧师和他在查尔斯顿的教会就热烈拥护国家解放事业。由于他在偏远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哈特先生与另一位浸信会教徒威廉·坦南特牧师，和威廉·H·德雷顿 (William H. Drayton) 一起被选中加入“安全委员会”，代表美国解放、独立事业，来唤起卡罗莱纳人的爱国主义。另外，Richard Furman, Sr., DD 同样因其影响力和爱国主义而引人注目。事实上，据说他已经严重激怒了康沃利斯勋爵，以至于英国指挥官为逮捕他提供了可观的赏金。根据托马斯杰斐逊的说法，当革命开始时，弗吉尼亚州三分之二的居民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们几乎完全由浸信会和长老会教会的会众组成。虽然后者（长老会会众）有许多知

名人士，但与浸信会会众相比，他们的教会人数很少。这间接表明了，浸信会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其对于美国独立事业的重要意义。

1777 年，弗吉尼亚浸信会再次决定为实行政教分离而呼吁。考虑到这一点，浸信会弗吉尼亚总会在其 1777 年的会议上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并向该机构报告联邦政府中是否存在任何压迫性宗教措施或教会法。这一行动的结果是一份详尽的报告，阐述了一个事实，即许多严重干扰行使宗教自由的法规仍然普遍存在。这份报告导致，浸信会总会协会向立法机关发表了正式而恭敬的讲话，呼吁人们注意这些压迫性和令人讨厌的法律；随着讲话的传播，浸信会和长老会的请愿书又一次泛滥，最强烈地抗议联邦政府试图维护一个国家教会体系。圣公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会则提出了自己的反对请愿书；后者（卫理公会）在那个时期与圣公会合作。这些向弗吉尼亚州立法者展示的、相互矛盾的请愿书，引起了不小的兴趣。由此产生了一项法律：暂停为支持宗教教师而征税。这给浸信会带来胜利（因为浸信会一直以来反对政府对于宗教人士和机构提供物质性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导致腐败、信仰虚伪、强迫、以及不义），也助长了他们未来的进取精神。

浸信会总协会在 1778 年举行了两次会议。在前几届会议取得的成就的鼓舞下，他们再次成立了一个“公民申诉”委员会，导致提交了一份报告，最坚决地反对对所有教派进行支持的提议；——这个提议是来自于圣公会的支持者为防止圣公会机构彻底崩溃而采取的和解措施（即，圣公会支持者们提议，作为缓和性措施，联邦政府为所有宗教教派都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圣公会支持们的这个提议，是为了避免圣公会教会机构的崩溃，因为，如果缺乏政府资金支持，圣公会由于会众人数少、或自愿捐款数量少，而很可能无法继续运营下去）。该浸信会报告还强烈反对法律授予圣公会神职人员举行婚礼仪式的专有权利、并以非法婚姻为由处罚（即，原有法律规定，只有圣公会神

职人员主持的婚礼仪式下所结成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婚姻；任何其他形式的婚姻都是非法的；——这样的法律使得圣公会神职人员拥有超过其他基督教教派的特权地位，因此受到浸信会的强烈反对）。这些庄严的抗议，采取了与前一年相同的方式——它们通过一个最有能力的委员会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浸信会代表团所取得的最大成似乎，使得立法机关采取了有利的前瞻性行动；在次年的浸信会总会会议上，一项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总会成员，并获得普遍批准。和以前一样，这里任命了专门委员会访问立法机关，敦促议会将非圣公会牧师所主持的婚礼下所结成的婚姻合法化。浸信会这种持续活动的结果是使得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废除了所有授权征收税款以供养神职人员的法律。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南方被英国军队占领的时期（1780-81年）。南部省份的战区是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众所周知，浸信会传教士对自由事业的忠诚使他们成为英国指挥官报复的对象，皇家将军们还为其中一些人提供了丰厚的奖励。浸信会教堂也因被改造成储藏室、临时处所和野战医院而遭到亵渎。英国军队对夺取这些礼拜神殿并将其沦为战事服务的地点似乎是特别高兴。然而，当人们记住浸信会是最热心的异议者和最好战的爱国者时，这就不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了。在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在1780-81年的两年间，浸信会教会普遍士气低落。牧师被赶出他们的岗位，有时甚至逃命，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则以牧师或指挥官的身份参战；会众被驱散、并分散到各个可能的方向。革命是浸信会早期占领西部地区的契机。由于英国皇家官员的勒索，这场运动在革命开始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一直持续着。

正如我们所见，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南方浸信会保持了最大的一致团结性。

武装斗争本身只是对在武装冲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的抗议活动的一种更加强烈和血腥的表达。在战争的整个岁月里，浸信会同样引人注目地在国家立法会议上强调自由的主张，并抵抗英国皇家军队的入侵。

弗吉尼亚浸信会总会在努力打破教会与国家的最后纽带方面最为坚持不懈。在 1782 年和 1783 年举行的两次会议期间，他们任命了“民事申诉”委员会，并且对当权派、教会建制派（圣公会）仍然珍视的两个项目——政府划拨土地给官方教会、和对所有教派牧师的支持的普遍评估——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坚决抗议的主题。1783 年，浸信会总会要求，地方协会将申诉的方向委托给一个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每个下属地区协会的不超过四名代表组成。1784 年，该委员会再次向立法机关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该立法机构提出的一般教派评估的拟议法律，以及关于宗教社团、教区和婚姻法的合并法律。一名专员专门被委派，向立法机关提交该委员会的备忘录。当年，立法机关大会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所有教派牧师主持婚礼的合法性权利（而放弃了以前、只有圣公会教会牧师才有主持婚礼的专属权力的法律体制）。

在 1783 年的上届浸信会总会大会上，推迟对总分摊法案（即，政府对于所有教派的总体评估法案，并对所有教派提供资金支持）采取行动，以便让人民表达意见。这有助于激发弗吉尼亚浸信会教派的全部力量和影响力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完全意识到这种普遍的表达方式所涉及的内容（即，广大数量的会众都认识到，政府拟议中的总分摊法案的内容、目的是什么，以及浸信会总会为什么要采取反对它的立场）；——浸信会的影响力已达到最大程度。在浸信会总务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下，敦促不同县的人们准备请愿书，反对拟议中的总分摊法案，认为该“教派评估法案”与福音精神和宗教自由相抵触。弗吉尼亚州的此类请愿行动所依据的浸信会决议案文如下：“大会反对政府对基督教教师的支持进行全面评估的总分摊法案；尽快着手进行请愿和反对；人们认为立法机关如此处理宗教事务与福音精神相悖；我们宗

教的神圣作者（耶稣基督）不需要这种强制措施来促进他的事业；福音不需要人软弱的手臂支持；它已经并将再次通过神圣的力量战胜一切反对者；如果立法机关行使向人民征税以支持福音的权利，那将是对宗教自由的破坏。”

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以浸信会为代表和领导，也包括长老会、路德会等）的反对者（圣公会的支持者们）巧妙地缩小了斗争范围，以至于几乎将斗争对象完全限制在浸信会教徒身上，他们（浸信会）在努力击败这些巧妙的措施时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立无援。在此之前，浸信会一直能够依靠长老会的友好合作，但这种共融现在已经分裂了（因为长老会不像浸信会那样、强烈地反对政府拟议中的“总体分摊法案”）。（即，圣公会支持者们的策略是，先试图击败浸信会，然后再依次对付长老会等其他目标）。反对派（即圣公会的支持者们）的华而不实和阴险的借口是，——“应该对人民进行评估，以便为所谓的道德败坏和宗教普遍衰落提供补救措施”。

当怀特岛县的一份请愿书出现在议会立法机关面前时，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位议员的面前。对浸信会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和托马斯·杰弗等杰出议员的支持合作。但是，他们遭到帕特里克·亨利、乔治·华盛顿、理查德·亨利·李和约翰·马歇尔等爱国者的反对。尤其是，“一般评估法案”（即，政府将对于所有宗教教派进行一般性总评估）得到了帕特里克·亨利的支持；他与詹姆斯·麦迪逊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詹姆斯·麦迪逊作为反对这项拟议中的、令人讨厌的法案措施的领导人出现。这是一场巨人之间的较量。议会的讨论热烈而激烈。有一段时间，这场战斗中，似乎浸信会立场占了上风（即，只有少数议员倾向于认为，政府不应当对各个基督教派进行一般性总体评估）。因而，当该法案被命令三读时（即，马上准备全体议员对之投票表决），它可能会被通过，它的支持者充满信心。浸信会立场的支持者们（议会中的少数议员们），除了拖延，别无希望。由于集结了充分反对该措施的力量，议会程序管理人员成功地将投票表决行动

推迟到下一届会议。这导致了此事向人民群众的陈述。1785年，议会大厅的大桌子在反对“一般评估法案”的请愿书和抗议声的重压下，几乎沉没。人民的抗议声势浩大，以至于该法案的拥护者没有进一步斗争就投降了。浸信会终于赢了。

作为灵魂自由的支持者，杰斐逊抓住了现在的机会，提交了以下旨在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该法于1785年12月16日通过，至今仍是弗吉尼亚州的基本法：

“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由大会颁布，任何人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场所或任何事工；任何人的身体或财产也不得因宗教事务原因而被强迫、被限制、被骚扰、或被负担；任何人也不得由于他的宗教观点或信仰而受到强迫、限制、骚扰、负担；——但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承认、并通过辩论来维持，他们在宗教事务上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决不当会削弱、扩大或影响他们的公民权利能力。”

浸信会并没有丝毫放松努力，以消除剩余的压迫痕迹，并挫败他们的敌人努力获得这样的立法以获得他们在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浸信会坚决反对，任何基督教派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权利；尤其是坚决反对，任何基督教派对于他人的强迫、压制性措施）。

浸信会总务委员会现在将注意力转向反对旨在“合并圣公会”的措施（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仍然保留和接纳圣公会原有教会制度，包括保留其教产和机制体系等）。在该浸信会委员会于1786年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应起草请愿书并在各县传阅，并提交给下一届州议会，以祈求废除《合并圣公会法》，并且建立新法案，使圣公会的物产被出售，这笔钱用于公共用途；由鲁本福特和约翰利兰代表浸信会总务委员会作为代理人出席下届州议会，表达浸信会诉求。”

在这一步过程中，长老会重新加入浸信会的请愿诉求，坚持废除该法案并处理圣公会财产。

与此相反，弗吉尼亚圣公会主教会议建议全州的教区准备和提交抗辩请愿书，以抵消浸信会和长老会的请愿诉求；但他们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为 1787 年 1 月 9 日，这条“合并圣公会”法律被废除了。浸信会教徒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投入的（争取宗教自由、反对政教结合）工作现在几乎完成了；原来的圣公会机构只有一个剩余的元素需要他们注意，那就是圣公会教产土地问题的解决。浸信会综合委员会对此作出判断，决定这些圣公会教产土地是人民的财产——理所当然地属于公众——因为它们当初是用从人民那里征税的钱买来的。1799 年，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承认属于圣公会的原所有财产都应移交给联邦善良人民的原则。紧随其后的是 1802 年的一项法案，命令出售圣公会原教产土地。

回首数十年来，当斗争开始时，很少人、或根本没有人，鼓励进行南方浸信会所珍视的工作。由于困难重重，浸信会几乎希望落空，但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主张，坚守所获得的每一寸进步，并利用每一个优势积聚新的勇气，直到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他们在福音禾场和政府立法会议厅中同样活跃，以实现确保新共和国获得最充分信仰自由的目标。

弗吉尼亚公约会议（即，州议会）对联邦宪法的批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像浸信会牧师约翰利兰这样的人的自我牺牲和努力。当时，在选举州议会代表时，麦迪逊先生因公事不在当地，利兰被同意为候选人，担任麦迪逊在 1788 年弗吉尼亚公约中应担任的职位。1788 年，该弗吉尼亚大会将决定审议，批准或拒绝美国国家宪法。返回弗吉尼亚后，麦迪逊拜访了利兰并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这导致后者退出竞选，支持前者。麦迪逊先生出席大会恰逢其时，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宪法在弗吉尼亚的受到批准,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如果当时麦迪逊先生没有作为议员出席弗吉尼亚议会大会,那么,该美国宪法就可能在弗吉尼亚州受到州议会否决)。美国新宪法遭到帕特里克·亨利的反对,他认为新宪法“蔑视君主制”。由于他个人的声望和出色的演说,他带动了许多人来支持他、并反对新宪法;如果不是当时的麦迪逊的影响力,那么,亨利本可以成功阻击新宪法在弗吉尼亚州的批准过程。对此,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巴伯(John S. Barbour)断言:“弗吉尼亚州通过美国宪法的功劳完全属于一位名叫利兰的浸信会牧师,他以前是弗吉尼亚人。如果麦迪逊没有参加弗吉尼亚公约会议,宪法就不会被批准;并且由于该宪法文书的生效需要九个州的批准,而且由于弗吉尼亚州恰恰是第九个州,所以,如果它(宪法)被她(弗吉尼亚州)拒绝,宪法将失败(其余各州就会效仿弗吉尼亚州,而反对新宪法)。正是通过浸信会牧师、利兰长老的影响,麦迪逊先生得以被成功选入弗吉尼亚州议会。无可置疑的是,若没有利兰的退出选举和高风亮节(并转而支持麦迪逊、使之成功当选为弗吉尼亚议会议员),那么,我们国家的著名宪法很可能就无法诞生。”

联邦国家宪法虽然被普遍接受,但并非完美无缺。很自然地,那些为这个刚刚还在襁褓中的年轻国家奋斗了这么久、牺牲了这么多的人对它进行了最严格的审视。在1788年的弗吉尼亚浸信会总协会会议上,总委员会提交了以下问题供审议:“最近公开亮相的新联邦宪法是否为安全享有宗教自由做出了充分规定?”

委员会一致认为没有。这发生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批准它的三个月前;该议会在试图批准联邦宪法时做出了某些保留,其中包括,政府可以剥夺无教派者的自由或权利(即,弗吉尼亚议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派,那么此人的某些自由和权利不应当受到保障)。——浸信会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良心自由,是不能被剥夺、限制或修改的。浸信会总务委员

会与麦迪逊先生就未来的行动进行了磋商，随后就该主题致函华盛顿总统。

++++++

浸信会委员会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信中说：——

“在联邦层面的缺乏效力、以在各州之间的部分行政管理与法律的冗余状态，显然要求，对我们的制度进行新的安排。为此目的，各州的智慧人士汇集在一次盛大的宪法会议上；您，华盛顿先生，荣誉地主持了该会议。作为此次宪法会议的成果，关于全国联邦政府的、所有部分的纲领计划现在正在实际运作中。

“当联邦宪法首次来到弗吉尼亚州时，作为一个社团，我们内心有着不同寻常的挣扎，担心良心自由（对我们来说比财产和生命更重要）得不到充分保障；也许我们这样的心情是因为历史上的、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弗吉尼亚的政府习惯而加剧；——当时，暴民、苛税、罚款和监狱是我们弗吉尼亚的常事。

“我们一方面深信，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政府，各州将陷入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弊端；另一方面，担心如果联盟中的任何一个团体压倒所有其他团体，那么，我们可能会助长某些宗教压迫。但在所有的不安中，我们的安慰来自于这种考虑：——即这个计划一定是好的，因为它带有一个久经考验的可靠朋友、您的签名；如果宗教自由在宪法中相当不安全，——那么，‘政府将阻止一切压迫，因为华盛顿将主持政府。’

“根据我们的意愿，联邦政府的一致声音已经呼唤您，华盛顿先生，从您深爱的隐居处再次出发，进入人类事务的混乱海洋，以担任美国的掌舵人。如

果在亚洲和欧洲肆虐的可怕罪恶——派系、野心、战争、背信弃义、欺诈和对于良心的迫害——曾经接近我们幸福国家的边界，那么，愿我们敬爱的总统的名字、和他所主持的政府，就像白天的辐射源，驱散美洲上空的所有乌云。”

++++++

这封写给华盛顿的信是浸信会牧师约翰·利兰（John Leland）的明智而及时的作品；他拥有丰富的智慧、冷静的判断力、勇敢的性格和成熟的虔诚信仰。

++++++

华盛顿总统在回复这封信时写道：

“如果我有丝毫担心，由我有幸主持的宪法大会所制定的宪法可能会危及任何教会团体的宗教权利，那么，我当然不会在上面签名；如果我现在能够设想，联邦政府的政治管理方式可能会导致良心自由变得不安全，那么，——我请求你们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热心地建立有效的屏障来抵御精神暴政的恐怖和各种宗教迫害。因为你一定记得我经常表达我的立场：任何人都应当表现得像一个好公民，并且只对上帝负责他的宗教信仰与观点。

“我满意地回忆起你们所在的宗教协会在整个美国一直是公民自由的坚定朋友、和我们光荣革命的坚定推动者；我更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们（美国的所有浸信会教会）将忠实地支持一个自由而高效的一般政府。在这种令人愉快的期望下，我很高兴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依靠我最良好的祝愿和努力来促进他们的繁荣。与此同时，先生们，请放心，我对你们为我今生和永恒的幸福向上帝的热切祈求而表示理解。

先生们，我是
你们最顺服的仆人，

乔治·华盛顿。”

+++++

这封信件的结果是，詹姆斯·麦迪逊在美国联邦众议院提交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该修正案遭到强烈反对，但它最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又获得三分之二的州批准，正式成为宪法法律而生效。浸信会一直坚称，这项修正案的功劳属于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当时为此主题（宗教自由）而向华盛顿发出了呼吁信，而华盛顿总统也很快就回信、并同意了这一点、而且承认了其中（宗教自由）的智慧。这一诉求也让麦迪逊立即做出了判断，并给了他一个果断的机会，在美国联邦众议院提交宪法第一修正案、并确保其通过，并赢得了南方浸信会的喜爱。

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本应结束关于宗教自由的这场斗争；但直到1798年，所有障碍才被扫除，持不同意见者（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等）才获得与美国圣公会同等的权利地位。

第四章

宗派扩张

1770年，就人数而言，南方的浸信会总体上是相当弱的。在那个时期，现在南方领土所覆盖的各州只有很少的教会组织。相对来说，虽然其中有少数浸信会教会是人数上的强者，但大多数浸信会教会都是人数上的弱者。

根据最近的一位作者的说法，在1770年报告的美国全国70座浸信会教堂中，只有7座被认为存在于南方（实际情况可能要多于这个数字）。不但如此，革命开始时，美国的浸信会教徒可能还不到一万。那场伟大斗争的结果是打散了南部省份的浸信会教会。浸信会会众积极参与自由事业，几乎没有一个浸信会教会遵守政府规定的礼拜季节（这些政府的强制宗教规定，以及英国国教教会、圣公会的各种僵硬宗教礼仪条规，——使得圣公会教会会众中充满了冷漠、不冷不热的属灵状态，而且有着大量道德败坏的信仰虚伪人士）。在大多数情况下，浸信会牧师被招募为随军牧师，浸信会会众作为士兵入伍。

然而，战争结束后，浸信会的教会发展有了迅速反弹。浸信会会众们团结联合在一起，忘记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不同意见，统一在浸信会教派的教义与纲领之下；他们的唯一目标是使美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所有人都经历过共同的苦难和斗争，在这场巨大的奋斗结束后，他们更容易团结起来。1787年弗吉尼亚“独立”浸信会和“正规”浸信会的轻松融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各州浸信会教会联合的信号；在弗吉尼亚浸信会融合后的几年内，该教派就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战线。这种合一的精神反过来又加强了南方浸信会共同遭受苦难和斗争的原则的单一目标的结果，并成为美国革命以后时期的标志性浸信会宗派扩张的源泉。由于信仰自由的实现，到处弥漫着感恩的情绪。长期以来因压迫者（圣公会等建制派掌权者）的卑鄙用途而遭到褻渎的礼拜场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大家的崇敬。礼拜堂在拆毁的地方重建，在损坏的地方修复；浸信会会众又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聚集起来，毫无惧怕地继续敬拜上帝。只有遭受迫害的人才能体会到自由的恩惠是多么宝贵，而这些人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礼拜场所是很自然的。

他们无惧打扰，真挚敬虔地敬拜神。

来自革命动荡时期的善意成果，有利于产生普遍存在于南方浸信会中的感激之情。

这种自发的精神决定了同样自发的敬拜；这成为后来整个南部各州的浸信会教派显著增长的起点。

从浸信会教会的这种普遍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属灵大复兴；它不仅大大增加了现有教会的成员人数，而且迅速增加了教会本身的数量。似乎早在 1784 年，仅弗吉尼亚州就有 151 座浸信会教堂和 14960 名成员，8 年后，教堂的数量增加到 218 座，有两万四百四十三名教会成员。属灵大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 19 世纪初的时代；因此在 1810-12 年间，我们看到弗吉尼亚有 292 座浸信会教堂和 35665 名成员。这些数字仅是关于弗吉尼亚浸信会教堂的常驻成员；而且，Semple 估计在 1791 年到 1810 年期间整整四分之一的弗吉尼亚浸信会移居到肯塔基州。尽管在美国革命时期，北方浸信会的人数远远超过南方，但在 1814 年，南方浸信会的教会成员人数已经经历了如此极大的增长，以至于——弗吉尼亚的浸信会教堂数量是纽约州浸信会教堂数量的两倍；弗吉尼亚的浸信会教堂数量比整个新英格兰所有州的浸信会教堂数量还要多。

同样的属灵复兴精神也曾经延伸到北卡罗来纳州；但直到 1800 年，该州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属灵大复兴才发生。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詹姆斯·麦格雷迪（James McGready）于 19 世纪初在北卡罗来纳州开始掀起了复兴，震撼了该州的中心；很快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也感受到了属灵大复兴。在当时战争刚刚结束不久、重返和平以后，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教会的许多做法导致会众士气低落、失去热忱；这需要坚强的英雄主

义来改革。从这个了不起的人（麦格雷迪）的工作中，浸信会极大地增加了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教会成员数量。

人们已经注意到北卡罗来纳州最早的教会组织，其中有许多矛盾、不和谐。1784年，我们发现该州有42座浸信会教堂，会员人数为3276人；八年后，即1792年，浸信会教堂的数量增加到九十四座，成员增加到七千五百零三个人。麦格雷迪（McGready）复兴的结果在1812年统计的数字中显而易见；——因为那时我们在该州发现了204座浸信会教堂，拥有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名教会成员。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的浸信会教会发展，都是来自于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会的大量移民。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教堂几乎被革命过程中的战争摧毁。南卡罗来纳浸信会领袖奥利弗·哈特在激起人民的爱国主义并鼓动他们反对英国皇家军队的伟大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激起了英国指挥官的愤怒，以至于在他们的军队接近到查尔斯顿时，朋友们建议哈特牧师寻求安全的避难所。他向北前往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他牧会的教堂长期以来一直是南卡罗来纳州南部传福音的中心，几乎被摧毁。随着和平的恢复，哈特先生被召回教会担任牧师，但他拒绝了。理查德弗曼博士随后被从桑蒂的高山上呼召到查尔斯顿；1787年10月18日，他在那里开始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牧师生涯。教会成员很容易集结起来；查尔斯顿再次成为南方浸信会教派的福音传播中心。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教会都分享了属灵大复兴精神；这种精神现在正盛行于所有南部定居点。著名的属灵大复兴主义者麦格雷迪

(McGready) 于1802年访问了该州，并跟进了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完成的工作。许多听众蜂拥而至，来聆听他的布道；估计有4000到8000人，他们来自附近许多地区，甚至来自佐治亚州的许多县。就像在西部地区一样，在那个时期的复兴布道会议上，常有非凡的身体反应。有人会突然失去力气、昏厥、异常、呻吟、身体不自觉但剧烈的痉挛性抽搐——所有这些表现都在卡罗来

纳的这些非凡集会中被见证。

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教派的增长表现在——1784年该州有27座教堂，会员人数为1622人；到1782年，也就是在八年的时间里，教堂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七十多个教堂，有四千一百六十七名教会成员；1812年，教会总数为一百五十四间，教会成员总数为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人。

理查德·弗曼（Richard Furman）博士于1787年成为查尔斯顿的牧师，当时他只收到了一份临时通知。没有什么比他在接管教会时在查尔斯顿定居更幸运的了。那时人们刚刚从美国独立期间的战争的不良影响中振作起来；会众再次意识到浸信会教会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查尔斯顿浸信会教会）是该州教派影响力的中心；它的机会和发展潜力很大。在战后许多不确定性情况的局面下，教会的发展需要一位大师级的领导人，以精明的审慎指导，掌握局势、并有效地运用力所能及的机构。这些因素结合在理查德弗曼身上；他很容易成为美南浸信会的领袖，并且是整个国家浸信会教派中一位重要的领导。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被赋予了很高的才智；通过自我应用、刻意培养，他成为当时最有教养的人之一。幸运的是，他自由而明智地使用他的资源与手段，并在整个国家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教会随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影响。

在肯塔基州成立的第一批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尽管人口增加到两万或三万人，尽管八个浸信会教堂已经存在多年，但直到1784年，肯塔基州仍然没有人受洗。勤奋的布道工作和热切的讲道似乎对提高教会的灵性或激励会众没有任何帮助。但1785年经历了一次复兴，使该州的各个浸信会教会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因为直到那时还没有利益共同体（即州浸信会教会协会）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两年后，约翰·加诺（John Gano）从纽约搬到肯塔基州，并为州浸信会协会的有效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很容易

易在浸信会教派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受到深深的尊敬。

1789年，影响深远的属灵大复兴再次在整个肯塔基州盛行。然而，这种复兴并不局限于该州，而是在整个南部上游州，尤其是弗吉尼亚州普遍存在。在肯塔基州的某些地区，它（属灵复兴运动）持续了三年，并产生了令人喜悦的极大效果，将浸信会教派融入更大的团结状态、并提高了教会效率。在这个非凡的属灵复兴时代，数千人受洗，许多新教会成立。这次复兴之后是1800年所谓的“伟大复兴”，几乎所有南部和西部州都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这一复兴运动。这是北卡罗来纳州詹姆斯麦格雷迪领导下开始的复兴，它席卷了南部和西部各州和地区，并很快改变了宗教社团（教会协会）的面貌。所有的反对力量似乎都屈服于属灵的前进潮流。邪恶的巢穴被关闭，路边旅馆和其他受欢迎的度假胜地所特有的淫秽和亵渎，让位于祈祷和敬虔地赞美上帝。许多地区的群众会集中在同一地点，搭起帐篷，并举行帐篷大会。人们有时骑马或乘坐马车远行一百英里来参加这些非凡的复兴布道集会。在一些地方，据信曾一度聚集了多达两万人。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了一个敬拜的场合：——“这里汇集了影响想象力的所有元素。晚上呈现的奇观是最狂野的壮观之一。熊熊篝火的光芒落在密集的大脑上（人们同时鞠躬表示崇拜），并从四面八方的长长的帐篷反射回来；数以百计的蜡烛和油灯悬挂在树丛中，还有无数的火炬来回闪烁，在颤动的树叶上投射出模糊的光，使森林深处显得昏暗无边。赞美诗的庄严吟唱在夜风中传扬和落下；慷慨激昂的劝告；诚恳的祈祷、抽泣、尖叫或喊叫，从内心极度激动的人口中迸发出来；突然的痉挛抓住了数十人并出乎意料地将他们摔倒在地；有许多这样的、与那伟大的运动相关的身体兴奋。据说在一次敬拜的仪式中，有3000人同时跪在地上。其他人则剧烈抽搐，而有人则在地上打滚或疯狂地跑来跑去；还有人仍然在跳舞和唱歌；而其他人则像许多狗一样狂吠。”

虽然复兴运动在早期阶段主要由长老会牧师指导，但浸信会同样是其优势的

参与者。1790年，我们在肯塔基州看到有42座浸信会教堂，共有3105名会员；1800年，“大复兴”之初，有一百零六个教堂，有五千一百一十九名成员。1803年有219座教堂，会员人数为15495人。肯塔基州一系列复兴运动最有益的结果之一是消除了独立浸信会和正规浸信会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之前曾多次尝试在肯塔基州实现这种融合，但直到1801年才完成。

东田纳西浸信会与北卡罗来纳州桑迪克里克协会保持联系；直到1786年，他们加入了霍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的宪章化联盟；起初只包含七个教堂。该地区分享了1800年至1803年伟大复兴运动的美好成果，因此在其成立六年后，霍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增加为36个浸信会教会，共有2500名会员。由此，田纳西州浸信会教会协会成立了。直到美国独立大革命期间，大约在1780年，浸信会才在田纳西州中部扎下根来、成为那里的重要教派。

1791年，安布罗斯·达德利（Ambrose Dudley）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骑马从两百英里外的肯塔基州出发，穿过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协助组建硫磺叉河口的田纳西教堂。三年来，这座教堂一直是传福音的孤零零的前哨站。但是在1794年怀特在多里斯长老的带领下从北卡罗来纳州移民，来到田纳西这里，并定居在硫磺叉河的源头。事实证明，多里斯先生转移到田纳西州中部对该地区奋斗的福音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幸，因为他的存在对于他的教会、和它成为其成员的教会协会来说都是一个干扰源。正是在田纳西州的这个地方，发现了1765年成立的一个杂乱无章的教堂的遗迹。由于印第安人在该地区的暴行，该教会组织于1774年被迫解散。1797年，田纳西州中部有五个教堂，彼此距离如此之近，使它们能够组成梅罗教会协会。随后成立了坎伯兰教会协会，该协会在1806年拥有39个教会。麋鹿河教会协会成立于1806年。1808年，足够数量的教会从坎伯兰协会退出，另外成立了红河教会协会；1810年，另一部分教会脱离了坎伯兰协会的教会成员资格，另外成立了康科德协会。

以下统计数据表明了田纳西州教派的扩张：

1784年，田纳西州境内有六个教会，会员人数不到四百人；1792年有二十一个教会，九百名教会成员；1812年，教会增加到156个，会员总数为11325人。大约1807年，浸信会向南扩展到阿拉巴马领地，该领地南北两端的定居点稳步发展。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教派直到新奥尔良战役和随之而来的与英国的和平之后才开始迅速增长。

在南方，移民迅速从旧州向东、以及从田纳西州迁移到阿拉巴马州。

但直到美国独立革命之后，佐治亚浸信会的进展甚微。从 Tuckaseeking 开始，作为他工作的共同中心，博茨福德将他的传福音工作扩展到萨凡纳河，有时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布道。在佐治亚州一侧，他的工作向北延伸至基奥基定居点，向南延伸至埃比尼泽。博茨福德先生于1773年被奥利弗哈特和弗朗西斯佩洛任命为该地区的全职工作。多年来，他一直是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人口稠密的定居点最热心、最有效率的传道人。1780年，当哈特先生赶在前进的英国人之前逃跑时，博茨福德先生陪同他向北远至弗吉尼亚，但在和平恢复后返回。要不是因为丹尼尔·马歇尔的英雄主义，佐治亚四五个苦苦挣扎的浸信会教堂可能在战争的风暴时期已经灭绝。他似乎因他的儿子亚伯拉罕·马歇尔、西拉斯·默瑟和爱德华·博茨福德的退出而显得孤立无援（后者都在革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寻求安全隐退）。但是，丹尼尔·马歇尔不顾一切危险，不屈不挠、从容不迫地继续福音事工的工作；——他不知疲倦地、平静地工作着，就好像世界和平已经到来一样。除了在战前建造的 Kiokee、Botsford 和 Red Creek 三个教堂外，还增加了 Little Brier Creek 和 Fishing Creek 两个教堂（这都是由于丹尼尔辛勤工作的结果）。此外，还有一座教堂位于巴克海特溪，其名称现已不为人知，其牧师马修摩尔是一名忠实信徒。在革命战争期间，该教会的成员分散，教会活动

几乎绝迹。1787 年，它在詹姆斯·马修斯 (James Matthews) 和本杰明·戴维斯 (Benjamin Davis) 牧师的努力下得以复兴；他们将其命名为 Buckhead Creek Church。

以上述这几个教会组织为核心，沿着萨凡纳河上下延伸，浸信会教派（在革命战争成功以后、美国与英国宣布和平后）在佐治亚州开始了惊人的发展。佐治亚浸信会教派在其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成功地建立了浸信会信仰的教会，这对丹尼尔·马歇尔牧师来说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他是一个理想的组织者，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发展他所牧养的教会。他明智地运用教会成员的各样恩赐才能，在当时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发展这些恩赐。聪明的牧师很快就观察到了教会增长的迹象，会众的恩赐被滋养到各种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的场合。从这样的属灵指导中诞生了佐治亚浸信会教会历史上一些最耀眼的名字——亚历山大·斯科特 (Alexander Scott), Tom、William Davis、Jeremiah Reeves、Joseph Baker 等人。通过这些人的积极的传教工作，该浸信会教派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开始了新的事业。

将众浸信会教会组织成协会，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扩张方式。佐治亚的早期教会尤其如此。1784 年召开了起草佐治亚浸信会教会协会章程的初步会议，尽管该协会机构直到次年才正式组织起来。这些早期团体的每年聚会所产生的刺激，表现在他们领域内教会数量的增加。例如，仅在威尔克斯县，在佐治亚浸信会教会协会的领域内，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就增加了二十二个教会。到 1794 年，即其（佐治亚浸信会教会协会）成立十年后，它拥有 56 座教堂，其中有几座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协会机构的迅速生长导致了 Hepzibah 浸信会教会协会的成立，以及后来的 Sarepta 浸信会教会协会；这两者都是从母组织（佐治亚浸信会教会协会）的机构中创建出来的。这是佐治亚浸信会一段充满激情的进步时期。佐治亚州很幸运从一开始就拥有卓越的领导人。丹尼尔·马歇尔 (Daniel Marshall) 是一位罕见的对群众有影响

力的人；他于 1784 年去世；他的领导权落在了西拉斯·默瑟（Silas Mercer）身上；这位品质比他的前任更为严厉的人，却是一位对人民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造就力的传道人。默瑟于 1775 年从北卡罗来纳州移居到佐治亚州，并通过丹尼尔马歇尔的教会协会机构接受了其毕生工作的培训。默瑟（Mercer）得到了 Abraham Marshall 的亲切而干练的支持。

从 1772 年的一个浸信会教堂开始，1773 年佐治亚州有两个教会；1774 年有三个；1777 年有四个；1780 年有七个；1782 年有八个；1784 年有九个；1785 年有十一个；1786 年有十五个；1787 年有二十个；1788 年有三十个；1789 年有三十五个；1790 年有 42 个，1794 年有 53 个教会，近四千五百名教会会员。

1786 年，耶利米·沃克（Jeremiah Walker）牧师因不当行为被弗吉尼亚州浸信会免除了其牧师职位；其后，他准备前往佐治亚州。然而，就在离开弗吉尼亚之前，他已经被弗吉尼亚浸信会恢复了牧师资格。当时廷斯利先生陪同他去了佐治亚州；廷斯利先生曾是他在弗吉尼亚州因监禁而遭受迫害的同伴。当沃克和廷斯利作为阿民念主义的热心拥护者出现在佐治亚州时，佐治亚州的早期浸信会教会还完全没有异端邪说的污点；两人在那里开始了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职业生涯。他们（沃克和廷斯利）在两位浸信会传教士马修·塔尔博特（Matthew Talbot）和纳撒尼尔·霍尔（Nathaniel Hall）的身上找到了现成的同情者（即，后两者也倾向于阿民念主义的观点）。耶利米·沃克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有能力，并且拥有迷人的演说能力。在上述其他三人的协助下，耶利米·沃克着手在佐治亚传播阿民念主义的观点。随即，其他佐治亚浸信会教派领导人对此深情地抗议，希望能使阿民念主义的拥护者从错误中恢复过来。有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充满骚动的场合。最后，在混乱分子不肯屈服的情况下，他们终于被驱逐出教会，从而使佐治亚浸信会恢复了秩序。耶利米·沃克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同事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当时，佐治亚浸信会对阿民念主义观点的表述不太宽容，也许是因为卫理公会教派正在与浸信会争夺每一寸领土，以迫使公众注意他们的主张。【译者注，——关于圣经启示之上帝救恩的教义，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上帝的主权是超乎一切的，人的得救是因上帝的拣选；并且，人的本质是完全败坏的，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与福音，那么，任何世人作为罪人都将落在上帝对于罪的终极审判和永恒刑罚之中。（请注意，加尔文主义的拣选教义、以及预定论，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宿命主义，更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人就应当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在传播福音事业、荣神益人的伟大事工中勤勉努力，因为这显然是与圣经的教导、基督的吩咐相悖的。——核心原因在于，人是在时间之下的，而上帝是在时间之上的；他是永生之神、是在永恒之中、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一切时间都铺展在他的眼前。请注意，人在福音之中，应当勤勉、热忱、努力、进行属灵的争战、打那美好的仗，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否则，人虽然有名义上的信心，但若没有真实的爱、以及从热忱之爱而导致的真诚热忱信仰之生命，那么就如同“鸣的锣、响的跋”一般；或者说，这样的人的信心是“死”的，而不是真正的信心。——然而，人的热忱信仰、努力事奉、真挚信念，从终极层面而言，正是上帝恩典拣选的结果）。阿民念主义者则与加尔文主义不同；他们认为，虽然考虑到上帝的超乎一切之上的主权，但是，人的得救不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拣选，而且还必须“由于”人的主动认信；换言之，就本质而言，阿民念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人的得救是上帝恩典与人的优点相结合的效果。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超加尔文主义”的观念，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总结中，错误地进行了延伸，即认为，既然上帝的主权是超乎一切之上的，那么，我们就不必要（甚至不应当）去主动地传播福音，因为一切反正都是上帝所“预定”的。】

桑德斯·沃克 (Sanders Walker) 在那个时期的宗派领袖人物中名列前茅，他可能是佐治亚州有史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浸信会传教士的人。他是弗吉尼

亚人，但被关于其他州的福音传播流行的诱人报道所吸引；这些报道称福音传播在西部较新的领土上享有优势。被任命为浸信会传道人（传教士）之后，他成为那些州的福音传播的中坚力量。

再往西，在密西西比州，该领土在 1812 年战争结束后迅速被浸信会的福音事工占领。

但在那之前，浸信会宗派进展甚微。当地人口的联合特征（有很多西班牙或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影响），加上当地印第安人的强烈敌意，——在和平秩序建立之前，福音工作很难在那里快速进展。本世纪初（十九世纪初），“新希望教会”在亚当斯县成立；此外还建立了Bayou Sara 的伯特利教堂；艾米特的新普罗维登斯教会和埃比尼泽教会。

在简要回顾导致浸信会教徒显著增长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将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所遭受的迫害的反应列为一个主要因素。这种长期持续迫害的压力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如此严厉的对待不仅使受迫害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弹，而且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再加上浸信会事工不受抑制的传道热情所引起的热切兴趣。两个这样极为有利的因素（即，过去一百年中，浸信会所受的迫害所引起的巨大同情；以及，浸信会本身的不可抑制的巨大的、传播圣经纯正福音的热情）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和平回归后（美国独立战争等结束以后）浸信会教派扩张的迅速。

造成这种巨大精神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方早期浸信会事工的传教热情。世界从未见过比早期南方各州这些平实简陋的传教士所表现出的更虔诚的热忱信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普通社会阶层，而且大部分是耕种土地的人。他们会在农场劳作直到接近周末，晚上研读简明的英文圣经，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他们的聚会，通常在四十多英里之外。在先驱地区，印第安人

的足迹路径是团结不同定居点的唯一道路（即，那些先驱开拓者们，必须要沿着印第安人所走的路径，才能来到彼此约定的聚会地点，因为在那原始荒野之地，不存在任何的其他道路）；这些顽强的人经常会遇到涨水且没有桥梁的溪流，但他们会毫不畏惧地游到对岸并迅速继续进行他们的旅程。他们对教会群众需求的熟悉使他们能够轻松地满足各种场合的需要。他们无私的热情激发了大众的尊重，使这些朴素无华的人的言论对那些大众来说几乎成为神谕（他们所讲述的福音，是源自圣经的平实话语；因而他们所说的话，正如同上帝对会众亲自所说的话）。在新移民定居点，无论遇到如何的干扰与困境，往往都提交给虔诚的浸信会传教士，由他们进行冷静的决定；而他们在强烈的正义感的引导下得出的结论，不仅使他们能够直面困难、解决难题，而且给了他们一个美妙的抓住大众的思想和心灵的机会。

不但如此，由于这些人（传教士）的福音劳动没有得到报酬，这种影响的力量和范围与程度得到了加强。在现有条件的压力下，这（即传道人没有收入、报酬）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克己，福音才能传给边境地区上的那些条件极其简陋的定居者，因为他们在头几年经常遭受极度贫困。这种没有回报的劳动给了早期传教士非同寻常的自由和朴实无华的言谈的机会。尽管此时有利（即传道人对于被传福音的对象不收取任何资金报酬或捐献），但未能从早期教会发展那里获得薪偿，证明了多年后南方教会发展的障碍（即，当传道人没有薪金的习惯文化形成以后，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牧师传道人都是免费的；会众没有十一奉献的精神、以及努力为福音事业贡献资金支持的心志；这导致了，后来在建立教会、运营教会的时候，常常面临资金匮乏、缺少全时间专职牧师、无以为继的困难局面）。

但是，尽管有这许多困难以及福音事工的不尽完美之处，总而言之，——由于这种不懈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教会开始在南方早期的定居点大量增加，教会协会开始成立、组织起来，福传事业变得更加系统和有效。一个浸信会

组织，无论是教堂还是地区教会协会，都立即会成为传福音的中心；而且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触手可及的、未传福音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地区，它肯定会受到浸信会的、积极进取的、国内传教士的巨大影响。

继他们在上述困难和尴尬条件下的、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地讲道取得成功之后，这些热情洋溢的人将一起离开家园数周（当他们的庄稼不再需要严格关注时）（即在农闲季节），日复一日地向数百人进行福音讲道。

由于浸信会教会的政体（更倾向于去中心化的、教会之间彼此平等的、信徒之间彼此平等的、以浸信会教会协会、协会总会为核心组织架构的方式）与新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共和精神（即，也是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州之间完全平等的、州内各郡、各市、各单位、在各个层面上彼此平等的、共和主义的政治权力架构）的完全一致，南方浸信会在美国独立革命后的时期取得了更快的进展。

如果浸信会为实现美国独立做出了很大贡献，那么该事件的完成反过来又为他们的浸信会教派扩张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原来的、来自英国皇家统治和与王室有关的一切专制主义原则的反弹性反应是巨大的（即，人们在从前的长期专制主义特征统治下所受到的压迫，使他们极其渴望自由、热爱自由、感恩自由，并在信仰方面极其热忱、真挚、谦卑）；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独立革命战争结束后的二十五年多的时间里，属灵大复兴运动接连席卷了整个南方【译者注，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美国北方（即纽约州及其东北部例如马萨诸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从1620年开始一直是以清教徒移民文化为核心。而在美国南方（即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莱纳、佐治亚等地），则从十七世纪初开始一直是在英国国教教会、即圣公会的直接掌控之下；与具有强烈会众主义特征的美国北方清教徒教会不同，英国圣公会教会体系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特征，以金字塔式神职人员权力架构为其组织机构的核心。

而当时的美国中部（即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马里兰等地）则介于南北方文化之间】。

早期浸信会事工的不懈努力受到了卫理公会骑马巡回的牧师传道人在所有地方的存在的刺激。

在南方的定居点，这些早期的卫理公会牧师大胆、积极、进取和好斗，与浸信会传教士激烈竞争争取每一寸土地。在革命期间，卫理公会教派并没有像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贵格会等）那样坚定不移，而在浸信会反对当权派的努力中，他们往往比其他人更同情英国王室的支持者【译者注，卫理公会教派运动由约翰卫斯理创立；卫理公会教会体系具有类似于圣公会的金字塔式神职人员权力架构的特点；卫理公会与圣公会之间，无论是在英国本土、还是在美国，都有很多合作】。在英美敌对行动结束后（美国与英国达成了和平协议，结束战争，美国建国独立），这虽然对卫理公会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相比于美国独立建国之前，卫理公会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在美国建国之后的初期，与圣公会一样，受到负面影响、有所下降），但他们在坚定的传福音事业努力中没有受到阻止。浸信会教徒在农村地区的传福音事业中，比卫理公会影响力更大；但在人口中心城市，卫理公会教徒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更稳固的立足点（因而比浸信会影响力更大）。传道方法的普及，加上对教会成员资格要求的适应，极大地促进了卫理公会教徒的影响力在南方不断发展的城镇中的扩张。

==

第五章

教育工作

在美国独立革命战争前后的时代，在其历史早期的南方各州，惊人的浸信会教派的成长，使得其中一些最杰出的浸信会人士们认识到，需要有知识装备更好的牧师福音事工的重要性，以组织和指导这支在浸信会宗派旗帜下征募的福音大军。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一时期南方浸信会的牧师队伍都是由文化水平很低、但认真虔诚的人组成的。因而，其中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教会领袖率先制定了提高浸信会教会讲坛知识水平的方法。由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原因，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一些勇敢的人承担，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样一项值得称赞的教育事业会受到那些文化较低的牧师的、有意无意的抵制。文化较低的牧师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这样的教育建议并不能帮助提高他们的传道能力；其他人则认为这（开办神学教育事业）是一种不虔诚的暗示，因为它（教育事业）似乎是说，如果没有人的努力的拼凑，上帝对传教士、牧师传道人的呼召是不完整的。还有其他人则仍然将这样的提议（开办神学教育事业）视为一项迎合个人和公众的自豪感的处置（即，他们的意思是，教育事业并非是帮助神国福音事业，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和自义）。就这样，一个本来能够带来最大好处的建议，在不开明和有偏见的牧师手中，变成了用来对付虔诚和进步领袖的大棒（即，一些虔诚的教会牧师和领袖，希望通过开办神学教育机构事业，来更好地装备浸信会牧师队伍，从而使得福音开拓事业更加高效、普及、扩张；但是，另一方面，另外那些不开明、有偏见的浸信会牧师，则对此阻挠和反对，并以此来攻击前者）。

这些反对教育的传教士、牧师传道人本身是文化很低的人；而同时，他们在被带进教堂的大量未受教育的教会会众中找到了许多衷心的支持者（即，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会众，也和这些文化较低的牧师传道人一样，反对教育事业）。

南方的浸信会教派，在十九世纪初、与众不同的非凡复兴时期结束后，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其主要特征似乎是随心所欲。如果他们要完整地成为一个组织良好的教派（这似乎是上帝的意旨安排所要求的结果），那么有效的组织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智的指导和引领，这样的组织是不可能的，而明智的指导必须从当地的牧区领袖开始。因此，浸信会事工（包括开展浸信会神学教育事工和事业）在十九世纪初的思想更为进步。然而，当这样一个计划遭到它寻求使之受益的人群的强烈抵制时，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这些反对开办教育事业的人，在教派教会的普通民众的支持下，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牧职部门反对智力发展，没有表现出任何恶意（即，这些文化较低的牧师传道人的对于教育的反对是真诚的，而不一定是出于私意、或自私；他们真诚地认为，属神的福音传播事工，并不需要人为的知识体系、神学体系，而只要有圣经、上帝自己的话语和启示，就足够了）。世人从来没有比他们在信仰上更真诚。这就是反对派的最大力量因素。无知是偏见之母，偏见是进步之敌；当无知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宗教通常是从属部分，通常被分解为一种升华的迷信。这些诚实、信仰热忱、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心理发展的规律，也不管完全没有上帝的应许话语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圣经中并没有像他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反对或禁止对于教会牧师传道人进行关于神的话语和启示的、系统性教导和教育）；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上帝呼召牧师传道人，那么在场合可能需要时，就会有超自然的安排来使其能够履行职责（即，他们没有看到，通过认真诚恳、勤勉地开办神学教育事业，系统性地把神的话语和启示，向一代又一代未来的教会牧者、传道人、执事、会众、普通教会成员——进行教导、教育，——这本身就是真诚敬虔地、智慧地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才能、与资源，来热忱真挚地服事神、服事于基督国度的伟大事工事业）。他们（那些反对教育事业的人）真诚地相信这一点，并在与他们著名的领导人（文化较低、并且反对教育）一样无知的群众面前真诚地推崇这种反教育的立场和观念。

南卡罗来纳州的 Furman 和 Pelot 以及佐治亚州的 Holcombe 和 Mercer 等人并没有被这些巨大的困难吓倒；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事业的艰巨性；他们与整个南方的其他一些人一起，决心创造更好的方法，来装备和训练未来的浸信会牧师队伍。这些人在彼此之间相距甚远的南部各州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但却被同样的冲动所感动、激励，因为整个南方各州的情况（牧职文化水平较低、缺乏教育）都是一样的。一开始，他们筹集资金购买书籍，把凡是可行的牧师都聚集到课程和教学中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规模的教育开端，带来了更充足的供应，并最终显明了，学校可以更好地培训浸信会事工。从这些粗略的原始教育计划中发展出现在在所有南部各州都能找到的浸信会宗派神学院。

南方最早的浸信会教会协会和传统组织建立在双重理念、宗派扩展和事工教育之上。这项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立革命前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在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牧区管理，因为正是他首先提出了组建一个独特的、浸信会教会协会的问题。三个教会加入了这个最初的浸信会教会协会组织：——查尔斯顿第一教会、阿什利河教会和威尔士颈教会。这一行动早在 1751 年就发生了。这一进步运动的主要执行人是奥利弗·哈特、约翰·史蒂文斯和菲利普·詹姆斯，即这三个教会的牧师。次年年初，Euhaw Church 的牧师 Francis Pelot 的加入，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1775 年，约翰·加诺成为查尔斯顿协会的传教士。他负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寻找上帝所呼召的、有恩赐才能的年轻人，来加入传道事业，并将他们推荐给查尔斯顿协会。1756 年，查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就筹集了一笔总额为 133 英镑的教育基金。当时成为该基金受益人的有 Evan Pugh、Samuel Stillman 和 Edmund Botsford。这些早期的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牧师在曼宁博士担任校长期间是罗德岛神学院的慷慨捐助者；哈特先生与曼宁先生非常

熟悉。

当美国独立革命战争爆发后，这些早期的浸信会教育事业的努力被革命进程打断了。显然，当充满针对教育的敌意的煽动时期到来时，南方浸信会在教育方面做得最少。

考虑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革命结束时，南部各州的浸信会宗派进步都归功于那些未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浸信会牧师传道人的大力工作。在这些艰难时期，未经学校训练的人所取得的福音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扩大福音事工、扩展神学教育事业、和教牧发展的障碍。

1788年，罗德岛浸信会神学院的曼宁校长通过浸信会总会委员会致函弗吉尼亚浸信会，敦促他们采取措施建立一所培训和装备浸信会牧师传道人的学术神学院。这次沟通之后，弗吉尼亚浸信会采取的唯一行动是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推动尊重学术神学院的业务”。这件事一直拖到1793年，当它被重提、并交到约翰·威廉姆斯牧师和托马斯先生手中时，他们提交了一份当时被认为可行的计划；但随后该计划被放弃，问题被驳回。这个主题在1809年重新出现，当时弗吉尼亚浸信会大会上仅有的两个主题似乎是，“儿童的宗教教育和建立一些神学院或公立学校以帮助年轻的传教士获得文化知识”，与建立学习机构有关的问题被提交给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以获取信息并消化理解这样一所关于神学院的计划”。但直到多年后，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种行动所达到的最大效果是，使浸信会教派能够始终关注、并意识到这个主题本身的存在。为了弥补不足，使出了各种权宜之计。一些地区的计划是通过共同基金建立牧师图书馆，并将书籍借给可能希望自学、寻求进步的年轻牧师。在不少情况下，传教士中最有学问的人会自愿承担指导那些愿意接受指导之人的任务。

在那些为年轻传道人提供宝贵服务的人中，应该提到约翰·M·罗伯茨博士；他是南卡罗来纳州桑蒂教堂高山的牧师。多年来，这位博学的传教士、牧师传道人无偿地向查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之教育基金的受益人提供指导。

在十九世纪的前 25 年，美南浸信会花了大量时间和思考在教育问题上。随着时代的需要，这（开办神学教育事业）每年都变得越来越迫切；这增加了路德·赖斯（Luther Rice）在此方面的热情努力；他对神圣事业的奉献在传教和教育之间平分秋色。

没有什么比越来越需要有能力和影响力的传教士（牧师传道人）来占据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中心的教会讲坛更明显的了；但是南方各州浸信会教会协会都没有足够的一致意见来制定浸信会教派教育计划。相关决议很多，委员会被任命，报告被提出，不胜枚举；但没有具体说明此事要怎样去开展、执行。困难重重（正如上文所述）；另一个阻碍因素是，创建教育学习机构的总体计划的缺乏；即，没有计划来快速开发南方新州本来的资源条件。——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给整个南方地区带来了普遍的繁荣，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个人财富。幸运者中有许多是浸信会传教士，他们将拥有土地和奴隶，这使他们有能力和闲暇私下学习学业。最积极和最清醒的管理世俗事务的那些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浸信会中最进步、最雄心勃勃、最有才华的人。但他们对这件事（即浸信会神学教育事业）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神学教育机构以普遍改善事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十九世纪第一个25年末期的、南方浸信会宗派教育精神的复兴中，我们发现南卡罗来纳州再次处于领先地位。在教会极大增长后导致成立教会协会的原因，现在在教会协会数量大大增加时又促使组织州大会——使教派事业稳定、规范和统一（即，在各个地区，随着浸信会教会数量的极大增长，以及教会会众成员数量的极大增长，州内每一个地区都纷纷如雨后春笋一般

地成立了各地区浸信会教会协会；然后，当这些地区性教会协会数量增长以后，导致成立州大会——即全州的浸信会教会协会；这样，教会的发展、各样事工，就能够得到稳定、健康、成熟、规范、统一的维持与进一步发展）。

在这项工作（成立州大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理查德弗曼博士；他在 1821 年在哥伦比亚市召集查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萨凡纳河浸信会教会协会和埃奇菲尔德浸信会教会协会的代表集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浸信会教派正式组织成立南卡罗来纳州大会（即，在整个全州的层面上的、浸信会教会协会），弗曼博士担任主席。这位令人尊敬的主席准备了一份重要演讲，提交给州浸信会大会，其中非常强调受过教育的牧职事工的重要性。弗曼博士预料到，可能会有人对这一建议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以最熟练的方式、通过逐一谈话沟通、解决了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让这种情绪（即，对于神学教育事业的支持的观念）生根发芽。次年，接替弗曼博士（Furman）成为该州浸信会大会主席的 WB Johnson 博士开始提到了同一主题，并对其进行了更充分的讨论。

为了最终取得成功，并出于经济原因，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协会希望与佐治亚州浸信会协会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的神学教育学习机构，因为这两个州的浸信会教派都在鼓动为更好地装备牧师而提供手段；牧师教育的问题是南方浸信会建立的所有神学院的基础原因。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之间建立合作机构的计划已经确定，商谈显示了每一个成功的迹象。

因此，1826 年，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协会在 Edgefield Courthouse 建立了一所学校，并将其称为 Furman 学院和神学院，并由 JA Warne 教授负责。查尔斯顿浸信会协会总委员会收集供牧师学生使用的书籍；这构成了新学院图书馆的核心。但是，这个学校机构是昙花一现，第二年就没落了。

更好地培训牧师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环境压力下应该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回答是保留已没落的教育机构的神学系；该教育机构在搬迁到高山后由杰西哈特威尔牧师负责。1829年 哈特威尔牧师 (Mr. Hartwell) 正式被选为Furman神学院的校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已故查尔斯顿牧师的儿子塞缪尔弗曼与哈特威尔先生一起担任联合校长。经过两三年的生存斗争，该教育机构又消亡了。仍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教育机构。1835年，在费尔菲尔德地区进行了另一项努力，在那里与学校培训相关的是体力劳动的想法。多年来，这是南方最受欢迎的方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在查尔斯顿学院晚期的贝利 (Bailey) 教授的领导下，开始了混合教育机构。它并非没有成功的迹象。

新大楼、装备精良的师资队伍和鼓励赞助，为这家年轻的教育机构提供了成功的保证；但学校建筑物在 1837 年被烧毁，贝利教授一年后辞职，而学校于 1840 年停课。随后的教育机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以不同的命运开展；在不同时期，北卡罗来纳大学已故的胡珀博士与这些机构有明显的联系；Maginnis 教授，后来与纽约州汉密尔顿和罗切斯特的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从这些努力和斗争中最终发展出成立于 1851 年的弗曼大学。

没有一个州的浸信会教徒在教育方面比佐治亚的记录更好，也没有任何一个州的浸信会教徒更受天才领导的青睐。佐治亚州浸信会最重要的教育推动者之一是霍尔科姆 (Henry Holcombe) 博士；他最初是一名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中的军官。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在南卡罗来纳长大，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军队，并声名鹊起。他被带领去学习新约；他深信自己的责任，并立即骑上马，骑马从营地二十英里去接受洗礼。回来时，他仍然骑在马上，按照他的使命而布道。1785年，他被按立任命为牧师，并立即在他所居住的佐治亚州的浸信会教派中占据显著位置。他被选为参加旨在通过联邦国家宪法的佐治亚州议会的民意代表。之后，他成为南卡罗来纳州 Euhaw 教会的牧

师，后来又成为萨凡纳教会牧师。霍尔科姆牧师到该教会任职时，萨凡纳的浸信会礼拜堂似乎正被长老会租用。城里的少数浸信会教徒建议呼召霍尔科姆博士，让他共同为长老会教会和浸信会教会服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接受了一份 2000 美元薪水的召唤，这可能是当时浸信会牧师收到的最高薪水。1800 年，他组织了一个有 10 个成员的浸信会教堂，两年后增加到 60 个教会成员。

在设计和执行浸信会教派扩张的方法方面，他是弗曼真正的同伴。和查尔斯顿的弗曼牧师一样，霍尔科姆的身材比例非常棒，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三百磅。在他的公共服事工作系列中，可能会提到他对佐治亚州监狱系统的贡献，以及他在建立萨凡纳女性孤儿收容所中所承担的部分。

但他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是与杰西·默瑟（Jesse Mercer）的努力相结合，以促使浸信会教派在宣教和教育方面采取一致行动。霍尔科姆（Holcombe）牧师是第一个通过建立 Mt. Enon 学院来对浸信会青年进行教育、从而在佐治亚州对浸信会教派教育给予独特重视的人。直到 1825 年，公众对浸信会宗派教育的兴趣才开始在佐治亚表现出来。佐治亚浸信会共筹集了十七美元五十美分，用于牧师教育。次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 WB 约翰逊博士布道的启发下，又募集了一百零八美元，“用于虔诚青年的教育”。结果，一位受益人被录取；佐治亚浸信会并指示执行委员会“准备一些计划，通过该计划可以为受益人提供神学教育基金。”这是佐治亚浸信会在教派教育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像佐治亚州的情况，在整个南方其他地方也都存在：——大多数浸信会牧师都是没有学问但献身的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文化很低。在 Brantley, Sr.、Jesse Mercer、Adiel Sherwood、Henry J. Ripley、Iverson L. Brooks、JP Marshall、BM Sanders 和 JHT Kilpatrick 等人的推动下，导致了建立高等学术机构的第一次运动。虽然许多人支持这样一个项目，但也有更多人反对。

霍尔科姆从佐治亚州退休以接受费城教会的呼召；这使杰西·默瑟（Jesse Mercer）成为公认的佐治亚州浸信会领袖。从此以后，他成为宗派进步的热心使徒，坚决抵制来自许多方面的强大反对。而上述那些人给了他大量的帮助和同情；他最忠实的伙伴也许是阿迪尔舍伍德，他既是传教士又是教育家。在伊顿担任牧师期间，他是那个地方学院的校长，并以各种方式为教派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他是寻求事工的年轻人的热心助手，并在为他们的准备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杰西·H·坎贝尔（Jesse H. Campbell）。

佐治亚浸信会在 1820 年代表现出他们对普通教育事务的兴趣，响应路德赖斯的呼吁，慷慨地向哥伦比亚学院捐款；他们通过赖斯和杰西默瑟向该机构捐款不少于两万美元。这种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杰西·默瑟是哥伦比亚学院的董事。默瑟（Mercer）先生为促进教派利益所采用的显着成功的手段之一是一份刊物《基督教索引》；他使用其中的专栏文章在针对那些抵挡教育和反对传教的人们的打击方面产生了强大的效果，并在当时有效地服务于佐治亚浸信会的利益。

佐治亚州浸信会大会于 1822 年组织建立。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建议首先来自 Sarepta 浸信会教会协会，但它次年取消了它的行动。佐治亚州协会于 1822 年 6 月在 Powelton 集会，并正式组建了该机构。渐渐地，州内的其他教会协会也加入了行列，布道和运输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事态的转机稍晚出现了，从协会公会支持者的强烈反对看来，它似乎要分崩离析了。但是大会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期即将到来，因为 1829 年，约西亚·彭菲尔德（Josiah Penfield）向大会遗赠了 2500 美元作为神学教育永久基金的基础，条件是州大会等额支付同样数量的捐款。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Jesse Mercer 以 250 美元领头，Cullen Battle 博士以 200 美元紧随其后，并且其他人也以类似的金额跟进捐款。在 1831 年的协会公会会议上决定，“一

且资金充足，本公会将在该州的某个中心地区建立一所古典神学学校。”进一步规定，这将与体力劳动部门联系起来，并且只有那些为该部做准备的人才能被接纳。阿迪尔舍伍德立即承诺通过认捐筹集一千五百美元购买所需的土地。1832年，在格林县购买了一块适合神学院所在地的场地；为了纪念约西亚·彭菲尔德，该村庄以他的名字命名。

教派的快速发展和长老会筹备建立高级学院，促使杰西·默瑟（Jesse Mercer）取得更大的成就。他提议在他位于佐治亚州的家附近大规模建造一所著名的学府，称为“美南浸信会学院”，这激起了民众的极大热情。很快就获得了执照，代理人开始工作以筹集捐赠基金。很快就认捐了十万美元，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发生金融危机，这个计划无疑已经实现了。结果，认捐的价值贬值，办学执照不得不交出，大众的热情降温；在金融危机耗尽其力量之前，恢复暂停活动的可能性已经过去。可以转移到 Penfield 教育机构的认捐被转移到那个目的，因此开始了 Mercer 大学。BM Sanders 成为校长，SP Sanford 成为教授之一，Adiel Sherwood 被选为神学教授。默瑟向该机构捐赠了大约四万美元，包括他的遗赠。为将该机构从 Penfield 撤走进行了多项努力；但直到 1870 年它被移至梅肯时，位置才发生变化。该机构的主席是：Sanders、Smith、Dagg、Crawford、Tucker、Battle、Nunnally 和 Gambrell。

成立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的公开目的是为宗派教育创造手段。在 1832 年的浸信会国民公会会议上，教育委员会明确建议并一致通过“购买合适的农场，并采取其他初步措施，根据劳动原则在本州建立浸信会文学机构”。”同年在维克县购买了 615 英亩土地，但学校直到 1834 年才开办。它被称为维克森林学院，纽约的塞缪尔·威尔被选为校长。最初招收二十五名学生，人数很快增加到七十人。

起初，学生们被要求每天进行三个小时的体力劳动；然而，这很快就减少到

每天一小时。然而，一年四季，锄头和犁都伴随着书桌和黑板。在第二年，学校得到了复兴的祝福，它深深地、永久地植根于教派的心中。1838年，通过对原教育章程的修正，学校更名为维克森林神学院。十年后，学院不堪重负，欠下两万美元的债务，似乎要垮掉了。前景令人绝望；导致董事会主席和学院主席辞职。就在这个关头，詹姆斯·普尔福长老发起了一项自愿行动来减轻负担，他在第一年就勇敢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有了这个捐献，该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到1861年，它拥有四万六千美元的捐赠基金；这笔资金的筹集主要归功于温盖特校长的不懈努力。南北战争结束后，维克森林神学院从战争废墟中脱颖而出，但可用的捐赠基金只有一万四千美元。通过明智地管理，捐赠稳步增加，到1883年底，学院拥有十万美元的捐赠，其中十分之一是纽约的博斯威克(JA Bostwick)先生的礼物。1886年，他又增加了五万美元的捐款，并在1890年再次增加；博斯威克先生希望为学院提供帮助，同时激励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进行自助，他提出在1891年3月1日之前为捐赠基金筹集到的最多五万美元的金额中再增加一半捐款。当时间到期时，已经筹集了两万六千美元。该机构目前处于最繁荣的状态。该学院的校长依次是韦特、胡珀、温盖特、普里查德、罗亚尔和泰勒。

在弗吉尼亚，到1830年，人们发现哥伦比亚学院不足以满足弗吉尼亚州对更合格牧师日益增长的需求。这种考虑导致了弗吉尼亚浸信会教育协会的成立，其目的是“设计并提出一些计划来改善年轻人；根据他们的教会的判断，这些年轻人被呼召到牧职事工的工作中。”在这个教育协会中，John Kerr成为主席，James B. Taylor成为秘书。一个由WF Broadus、JB Taylor、JB Jeter和H. Keeling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制定计划并报告与提供更有有效的牧师资格相关的独特行动的权宜之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声明，它承认继续忠于哥伦比亚学院的重要性的义务。它进一步指出，根据它的判断，在弗吉尼亚浸信会的支持下立即建立一个学习机构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就委员会而言，建议将培育牧师对象（即那些将要被教育培训为牧师的人）安置在“有经验的

牧师弟兄的家庭中，他们的教育、图书馆和提供有用指导的机会可能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年轻弟兄提供必要的服务。”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安排必然是昙花一现。其他州正在推进教育工作，他们的年轻传道人正在尽可能最令人鼓舞的条件下适应未来的工作。很快就发现，如果弗吉尼亚浸信会要保持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立场，除了采纳一个像提出的那样随意的计划之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一个体力劳动学校的必然计划（即神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被采纳了。在里士满附近购买了一块地；Robert Ryland，一位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被选为该校首任校长。学校正式命名为弗吉尼亚浸信会神学院。赖兰德先生虽然不赞成立即组织一所学校，但支持迅速开办这样一所学校的流行趋势太强大了，无法阻止。反对意见失败后，他试图从中删除体力劳动特征；但他在这方面也失败了。然而经过两年的实验，体力劳动的特点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像往常一样，农场被卖掉，并在里士满市区范围内购买了一处有吸引力的房产。直到 1840 年，弗吉尼亚浸信会才建立了一所学院。也许，毕竟，延迟是有好处的，因为该教派在较晚的时期对大学有了更高的概念，显然在里士满学院成立前十五年还没有。弗吉尼亚大学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指导获得了额外的优势，其影响力在全州范围内最为振奋人心。

南北战争之前，浸信会为里士满学院提供了十万美元的捐赠，但其中大部分都在那场伟大的斗争中损失殆尽。人民因战争而屈服，他们重新集会支持里士满学院，并于 1866 年再次向学生敞开大门。与南方的其他浸信会教派学院一样，里士满学院一直是北方捐助的接受者；没有北方的捐助，它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重振旗鼓；而有了这样的帮助，它已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且在教学标准方面可能是南方所有浸信会学院中最先进的。

肯塔基州浸信会是最早采取措施建立宗派学校的南方各州之一。早在 1829 年，乔治敦学院（当时被称为乔治敦文学和神学学院）就获得了办学执照。威廉·斯托顿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牧师和教育家，曾担任哥伦比亚学院的校长，

被任命为乔治敦学院校长，但他在从首都华盛顿前往肯塔基州任职的路上不幸去世了。1830年，Joel S. Bacon 博士被选为接替他的职位。培根博士立即发现自己与一些门徒们发生了严重的纠纷，这些门徒们当时正在全州与浸信会决裂，他们对学校提出了索赔要求，甚至使学校陷入诉讼。在与逆境抗争两年后，培根博士辞职了。该教育机构随后降为高中级别，直到1838年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罗克伍德吉丁斯现已成为校长，他致力于为捐赠基金筹集捐款的工作，并筹集了八万美元。1840年，马尔科姆博士接替吉丁斯担任校长，并提高了学院的教育标准。后来的历任校长分别是Reynolds、Campbell、Crawford、Manly，和Dudley——他是著名先驱传教士Ambrose Dudley的后裔。Georgetown College（乔治敦学院）目前由AC Davidson博士主持，处于最繁荣的状态。

位于同一州的伯特利学院于1849年由伯特利协会筹划成立。它最初是一所高中，1856年布卢维特先生成为第一任校长时，它被提升为大学的标准。除了南北战争期间的两年外，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运作良好。它的历任校长是George Hunt、Rust教授、Noah K. Davis, LL. D.（现任弗吉尼亚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莱斯利·瓦格纳（Leslie Waggener）（曾任德克萨斯大学校长）；现任校长是WS Ryland博士。该学院目前享有十万美元的捐赠。

1845年，西浸信会神学院位于肯塔基州卡文顿，不幸的是，只要它存在，它就成为争论的对象。它注定是短暂的。它经历了十年的艰难历程，当时有价值的财产被出售，收益在不可调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瓜分。肯塔基州牧师教育学会成立于1844年，正如其名称所示，其目标是“帮助浸信会教派的贫穷、虔诚的年轻人获得适当的教育，以向他们所属的教会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显明他们蒙上帝呼召传福音。”资源匮乏限制了学会的运作，但它以一种安静的方式为适合传道工作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帮助。乔治敦学院的最终成功排除了该学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与肯塔基州一样，田纳西州有两所属于浸信会的教育机构——默弗里斯伯勒的联合大学和杰斐逊县的卡森学院。在 JH Eaton 校长和 JM Pendleton 博士作为神学教授的领导下完成了一些出色的工作后，联合大学就消失了。它的存在生涯无疑因南北战争而缩短。1873 年，另一所教育机构在杰克逊成立，被称为西南大学，现在由校长 MC Savage 成功管理。

卡森-纽曼学院，前身为卡森学院，于 1850 年在莫西溪镇附近成立。它是在州浸信会总协会的赞助下特许成立的，并以其主要捐助人的名字命名。詹姆斯·H·卡森（James H. Carson）将一万五千美元遗赠给该教育机构，其中的利息将用于教育年轻牧师。该机构近年来获得了部分额外捐赠，目前由校长 JT Henderson 主持。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开始鼓动建立浸信会宗派学校的问题；与其他州一样，浸信会的成长和他们牧职事工的低效表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为了建立这样一所学校，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采用了体力劳动计划（即建立神学院，同时要求神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以勤工俭学），尽管它在其他州失败了。此时该教派的领袖是 DP Bestor、Hosea Holcombe、Alex·特拉维斯、JH De Votie 和 AG McGraw。1834 年，计划中的学校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投入运营，设有文学和神学两个系。WL Williford 成为第一任校长，DP Bestor 被选为讲授神学。在短暂的存在生涯之后，该教育机构失败了，结果，阿拉巴马州的浸信会发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在与债务搏斗了一段时间之后，该教派出售了教育机构物业财产，并在多年内完全放弃了教育事业问题。同时，通过向年轻牧师提供神学著作，尽可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出于建立一所学校以满足阿拉巴马州浸信会教派迫切需求的绝对必要性，现在成立了霍华德学院。

1842年，在 SS Sherman 的干练管理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受人尊敬的大学机构。从成立到南北战争爆发，它得到了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的大力支持。在经历了将近五十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之后，该学院从其原址马里恩迁至伯明翰附近的东湖，并在那里重新建立。

在 1861 年南北战争敌对行动爆发时，学院正享受着一笔可观的捐赠，但这在战争中完全毁于一旦。在过去 25 年内为该教育机构提供捐赠资金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尽管历经风云变幻，学院仍继续做着出色的工作。它的历任校长是 SS Sherman、H. Talbird、SR Freeman、JLM Curry、JT Murfee、BF Riley 和 AW McGaha。

与其他州一样，密西西比州浸信会的教育工作最初是支离破碎且不能令人满意的。州浸信会教会协会建立在教育和宣教的双重理念之上。最终归属浸信会的建立学校的生涯相当曲折。1826 年成立亨普斯特德学院，其名称在次年通过协会章程更改为密西西比学院，董事会被授权通过彩票筹集两万五千元作为捐赠基金。1830 年，密西西比学院的名字被正式赋予该机构，但 1842 年，它被转移给长老会统筹管理，而长老会的管理只持续了八年。当密西西比州浸信会协会在州首府召开时，该学院被提交给该浸信会机构并被接受。浸信会一经掌握，便立即在该教育机构领域安排了一名代理人，该代理人在十年内为其捐赠筹集了十万美元现金和三万美元的订赠费。南北战争导致运营暂停和捐赠基金遭到破坏。1867 年，希尔曼博士就任校长，发现该教育机构欠下了一万美元的债务，他立即清算了这笔债务，修缮了学院建筑，到 1873 年筹集了四万美元的捐款。该学院位于克林顿，是一所就读人数众多、且受欢迎的教育机构。

直到一个相对较晚的时期，路易斯安那州的浸信会都依赖其他州的教育机构来教育他们的青年，使他们成为未来的牧师传道人。但在这个州的教育问题

上，浸信会教派的先驱运动试图将一个教育机构置于比南方大多数其他州更高的水平。一所成熟的大学，至少在名义上，最初是在黎巴嫩山考虑的，被称为黎巴嫩山大学。这项事业是由 B. Egan 博士计划的，他得到了黎巴嫩山教会牧师 George W. Bains 的热烈支持。从 1847 年开始的五年里，这个主题一直很令人激动。但他们直到 1852 年才采取实际行动；他们除了决定建立一所高年级学校，“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神学系，以及作为目标的辅助，还有一所女子神学院”。

WH Bayless 牧师被新成立的校董事会选为财务代理人，并很快筹集到 1768 美元 12 美分。他们采购了很多东西，并安排建立了一座足以容纳 200 名学生的建筑。William E. Paxton, AM 被选中通过为预备部门开设课程来建立新学校。这是他在 1853 年 3 月做的，大约有 25 名学生参加。随后在 7 月举行的州浸信会大会上，浸信会教会会众向神学捐赠基金认捐了 5280 美元。

1856 年，神学院系成立，Bartholomew Egan 博士被选为院长，拥有四名教授。校长和神学教授都同意无偿服务，而其他讲师则在预科部。所有从事这项苦苦挣扎的教育事业的人都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热情，到 1857 年底，已经筹集到相当于两万五千美元的资金。杰西·哈特韦尔牧师 (DD) 作为校长的服务于 1858 年开始。然而当 1859 年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会议为此教育机构而收到一万美元的捐款时，哈特韦尔校长就在此时去世；W. Carey Crane 牧师被确保接替他担任学院院长。1861 年学院共有 127 名学生。南北战争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学院停办了。南方邦联当局对这座学院建筑印象深刻，将其用作医院，因此一直使用到战争结束。内战结束后，学校试图重振教育事业，但在国内混乱的形势下它倒塌了，最终被废弃。

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于 1870 年在什里夫波特创办了另一所大学，但没有那么成功，也远没有那么有经营智慧。为了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在什里夫波特

郊区购买了占地 70 英亩的 Helm 学校物产。不幸的是，学校预支了建造大学大楼的资金。学校于1871年开学，三年后仍未建校舍，连接学校与城市的铁路尚未建成，商业萧条来临，黄热病肆虐城市，1874年的金融恐慌席卷而来，慷慨帮助该教育机构立足的保险公司本身倒闭了，所有这一切结束了短暂但多事的什里夫波特大学的生涯。

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目前的主要教育机构是 Keachi 学院，这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Keachi 女子学院和 Keachi 男子学院于 1879 年合并，JH Tucker 牧师担任校长。塔克校长于 1881 年去世，由 TN Coleman 牧师继任，随后是 CP Fountain 牧师，然后目前由CW Tomkies 牧师继任校长。

佛罗里达浸信会沦为教育事业的落后者；直到 1887 年来自费城的 John B. Stetson 先生在迪兰建立了“约翰 B. 斯泰森大学”。虽然它是南方各州最年轻的教派学校，但它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最光荣的记录。John F. Forbes, AM, Ph. D.，是斯泰森大学才华横溢、积极进取的校长。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哥伦比亚学院有着独特的历史。它由路德·赖斯（Luther Rice）构想为一个国家浸信会教育机构；该机构本应该因其在国家首都的位置而变得非常重要。这位虔诚的创始人的主要目的是将教育和宣教的重大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使它们可以相互帮助和补充。这样一个计划的最初构想无疑部分是由于美国浸信会在缅甸的外国传教工作中引起的传教热情，部分是由于华盛顿教育设施的可用性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怀着极大的热情，赖斯着手联合推动这些重大利益的主张，但公众的思想未能以其双重身份（教育与宣教）理解它们。代表国立浸会大学激起的热情使它成为其他外国传教士机构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姐妹单位。三年来，为哥伦比亚学院的呼吁激起了北方浸信会和南方浸信会教派之间的异议。当时在全国各地已经组织了浸信会社团，并在 1820 年全国浸信会三年一度的大会会议之前筹集了大量资金。

在该机构（全国浸信会协会）的会议上，教育和宣教的实际联合问题得到了全面的思筹，并决议认为，美国的牧职教育和缅甸的宣教使命相去甚远，以致于它们永远无法在促进两者的实际计划中联系起来；这些利益很快就脱节了。财务困境很快威胁到哥伦比亚学院，并导致其在 1827 年停办，但次年 在斯蒂芬·查宾（Chapin）博士担任校长的新团队领导下又恢复了工作；他担任了 15 年的校长，并且不仅取消了债务，而且恢复了教育机构正常运作。

Chapin 博士从校长办公室退休后，拉格斯（William Ruggles）教授暂时担任该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随后 1843 年 培根（Joel S. Bacon）博士成为校长。他发现该机构没有债务，同样也没有捐赠。培根博士一直担任校长，直到 1854 年，拉格斯教授再次被任命为学院院长，为期一个季度。在培根博士执政期间，捐赠基金的工作在不同时期由博士进行。AM Poindexter 和弗吉尼亚州的 William F. Broadus 是主要捐赠者；后者提供了两万美元的订赠，并通过这种方式履行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约翰·威瑟斯（John Withers）的有条件承诺，获得同等金额捐赠。牧师 GW 萨姆森（Rev. GW Samson）于 1859 年成为校长，并在南北战争的动荡时期维持了学院的运作能力。尽管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由于特别艰难的战争时期而遇到了困难，但该教育机构的效率和物业价值都大大提高了。Samson 博士于 1871 年辞职，JC Welling, LL. D. 成为校长。1873 年，WW Corcoran 同意捐给大学 20 万美元，前提是它的其他捐赠者们再筹集 10 万美元。这一条件得到遵守，于是该机构开始了新的繁荣事业。Rev. BL Whitman, DD, 现为（1898 年）大学校长。

在南方浸信会的直接或间接主持下，为女孩和年轻妇女提供教育的机构也数量众多。其中一些学校与州浸信会教会协会保持有机联系，而另一些则是私营事业或地方事业的结果。后一类之所以也算是浸信会教育机构，只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或所有者是浸信会信徒。

本章所提到的学校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向每个州的年轻牧师（或那些即将被呼召、培养为牧师的年轻人）提供学术教育优势，而女青年学校则是为了回应公众对女性文化教育的需求，而这通常不考虑教派区别。

在像这样一本内容有限的书作中，扩大阐述这些有价值的年轻女子学校的历史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其他附录或著作中，提请读者注意实际上或完全在南方几个州的浸信会教派在这方面（女子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第六章

不同的异议

尽管美国南方浸信会基本上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宗派，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意见分歧。已经出现了呼吁注意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早期浸信会的不同观点的场合。最初的意见分歧出现在一般浸信会和特殊浸信会之间，前者（阿民念主义）主张普遍救赎的教义，与有限救赎的教义（或特殊浸信会所持有的选民得救的教义）（加尔文主义）截然不同。【译者注，——关于圣经启示之上帝救恩的教义，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上帝的主权是超乎一切的，人的得救是因上帝的拣选；并且，人的本质是完全败坏的，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与福音，那么，任何世人作为罪人都将落在上帝对于罪的终极审判和永恒刑罚之中。

（请注意，加尔文主义的拣选教义、以及预定论，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宿命主义，更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人就应当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在传播福音事业、荣神益人的伟大事工中勤勉努力，因为这显然是与圣经的教导、基

督的吩咐相悖的。——核心原因在于，人是在时间之下的，而上帝是在时间之上的；他是永生之神、是在永恒之中、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一切时间都铺展在他的眼前。请注意，人在福音之中，应当勤勉、热忱、努力、进行属灵的争战、打那美好的仗，应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否则，人虽然有名义上的信心，但若没有真实的爱、以及从热忱之爱而导致的真诚热忱信仰之生命，那么就如同“鸣的锣、响的跋”一般；或者说，这样的人的信心是“死”的，而不是真正的信心。——然而，人的热忱信仰、努力事奉、真挚信念，从终极层面而言，正是上帝恩典拣选的结果）。阿民念主义者则与加尔文主义不同；他们认为，虽然考虑到上帝的超乎一切之上的主权，但是，人的得救不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拣选，而且还必须“由于”人的主动认信；换言之，就本质而言，阿民念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人的得救是上帝恩典与人的优点相结合的效果。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超加尔文主义”的观念，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总结中，错误地进行了延伸，即认为，既然上帝的主权是超乎一切之上的，那么，我们就不必要（甚至不应当）去主动地传播福音，因为一切反正都是上帝所“预定”的。另外，阿民念主义错误地认为，因为上帝是“慈善”的，所以一切世人都“将能够”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恩典所救赎；然而圣经清晰地告诉我们说，将要有终极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使得一切没有得到救赎恩典的罪人都将要与神永远隔绝。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救恩固然是能够使一切世人都“可以”因着悔改认信而得救，但是，在实际事实上，只有那些真的在基督福音中悔改归信的人，才能够得救。】

这两种观点的拥护者来自大西洋以外（即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最早的浸信会。一般浸信会的原则和实践或多或少都有松懈的特征。不需要恩典的经验，也不需要教义的陈述，一般浸信会在教义条例的管理上是鲁莽的。他们是沉浸洗礼主义者，这是他们和特殊浸信会唯一达成一致的一点。一般浸信会的随和要求，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一个人彻底地悔改、放弃自己的前罪，真

正地重生。在最早的历史中，他们在美国南方最著名的代表是保罗·帕尔默 (Paul Palmer)。不幸的是，人们对这个非凡的人知之甚少，但有迹象表明他是直接从英格兰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虽然他通常被授予北卡罗来纳省浸信会传教士先驱的荣誉，但很有可能他被已经存在的浸信会教堂吸引到该省；不管如何，我们没有对此的确切的记录。在早期历史上，相对而言（相比于其他早期美国南方省份），北卡罗来纳省浸信会显著地不受迫害，这可能是对热爱自由的帕尔默的一种诱因；他最大的乐趣在于布道。帕尔默的观点与英国阿民念浸信会的观点完全一致。他对北卡罗来纳省的殖民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帕尔默在该省的早期教会播下了阿民念主义的种子。但在怀特菲尔德出现后，潮流转向了加尔文主义。与费城和查尔斯顿这两个影响中心一样，加尔文主义传教士也从那里传了出来，其结果是对教义标准的迅速而根本的改变和更正。

下一个分歧存在于独立浸信会和正规浸信会之间，前者实际上是持加尔文主义教义的卫理公会信徒，主要由那些受到怀特菲尔德巨大影响的、卫理公会教派中的信徒组成。他们在 1750 年兴起，最初被称为“新光”。然而，他们被舒贝尔·斯特恩斯组织成独立的社团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独立性，他们后来被称为分离社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他创立这个新教派一年后，斯特恩斯成为了一名浸信会教徒，并且大多数分离者都跟随他加入了浸信会教派。当这位伟大的领袖采纳了浸信会的观点时，分离派作为一个教派就绝迹了（而并入了浸信会教派）。然而，他们将他们独特的观点带入了浸信会，这些观点是关于“信徒受圣灵直接教导”的引导，这种超自然的迹象被他们视为具有属灵的性质，并且高于、虽然不违背“理性道理”。在弗吉尼亚省浸信会遭受迫害期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独立浸信会是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建制派反对者。正是独立浸信会的代表被关押在弗吉尼亚州的监狱中，他们受到鞭打，尽管遭受了这些可怕的迫害，他们还是从监狱的窗户传道。1787 年，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独立浸信会和正规浸信会建立了联合与

融合，两个独立分支的名称因此都被终止了。

但是这个教派成分注定会比最初的时期产生更大的干扰和更激烈的内部纷争，尤其是在浸信会南方历史的先驱时期。在南部上游和较古老的地区，独立浸信会在最偏远的定居点以狂热的热情传播福音。随着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中心，人们渴望提高牧师的资格、牧师的薪酬和扩大传教士运作的想法；但提倡这种观点会引起反对，这种反对表现为普遍的反传教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浸信会在南方的进步。——这类反对者直接阻挠浸信会教派沿着拓展教育路线发展的一切努力。在南方建立一所具有任何特色的浸信会神学院校（这些神学院总是具有双重使命：1. 牧职教育；2. 宣教事工）往往需要艰苦而持久的斗争。

不难看出，这一切事情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随后对所有传播福音的机构提出了党派纷争性质的、激烈的反对。如果说“人的力量”在神圣事工的装备（即神学教育与牧职教育）上是令人反感的，那么在传播神圣福音的手段的创造上（即拓展宣教事业）同样如此。（因而，那些自认为“属灵”的人们，反对通过“人的努力方法”，来进行牧职教育、以及宣教事工拓展）。因此，主日学、圣经学习社团、和宣教委员会与牧师教育事业一样，被列为令人反感的类别。正是在这一点上，南方浸信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开始了最激烈的斗争，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当地的传教士先驱，浸信会教徒在南方从未被任何其他人超越。他们的事工在向贫困地区传福音方面是最积极和自我牺牲的。但是，如果有最进步的人在美国南方努力敦促大家向世界最遥远地区（例如非洲和亚洲）传播福音，就会受到随之而来的坚决反对。那些反对者们，坚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反对海外宣教事工），他们在整个南方各州向那些奔赴海外的传教士团体发动了一场稳定而无情的“战争”。

这种反对的力量因当时出现的两份期刊《时代的迹象》和《原始浸信会》而显得更加强烈。这些充满派系纷争腔调的期刊文章作者来自南方以外的州；他们的狂妄言论被容易上当受骗的南方群众当作神谕一样接受。该浸信会教派的反传教分子坚持自称为“老派”或“原始”浸信会，其明显目的是宣称自己传承了浸信会教派的原始原则，并诽谤那些被反对者是背离浸信会信仰和教义的人，斥责他们（被反对者）引入新的信仰实践来更改原始标准。

这些反传教努力的浸信会教徒，接受了最荒谬的观念（即认为，建立神学院牧职教育机构、以及拓展宣教活动是不符合圣经、是违背神旨意的），并由上文所述的反对势力力量助长；那些反对势力分子的影响力在上文所述的时间进入南方。例如，上文所述的期刊中的一篇文章坚持说，牧师、传教士和其他人筹集的资金从未用于声称筹集神学院资金的目的，而是专门用于在北方城市的投机投资计划。这种立场也与以下一段文字相等，它是“阿拉巴马州朝圣者安息协会会议纪要”的字面引述：

“我们认为神学院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中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对宗教自由是危险的。无论这种神学院在哪里组织，——无论是在犹太人、异教徒、罗马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中间，——他们都是对基督教会进行迫害和流血的根源。”

而上述文字是出于他们其中一位领导人的手笔。他们的另一位牧者写道：

“不要忘记敌人（传教士）；牢记它们；他们是——咆哮的、破坏性的狼，贪婪的狗，以及它们肮脏的、无数的幼崽。通过仔细观察和参考神圣的、永不遗漏的、描述性话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衣着、举止和行为上的相貌，以及许多其他刻痕、不可磨灭的描述性标记，等等。狼的气味足以使人警惕、对之怀疑和确定；狗的牙齿被注意到，狼的独特嚎叫被听见，等等。”

不管这些文字里有没有道理，它的尖酸和暴力是毋庸置疑的、针对传教士的态度。他们中的一员曾在一个场合断言，即使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临、并宣布传教事业是出于上帝，他也不会相信。无知、偏见和亵渎神明的人聚集在整个南方的浸信会教会中占相当程度的主导地位，因此传教士精神的发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宣教士们并没有被这些示威吓倒，而是坚定而明确地阐明了他们的原则。随着对立情绪的强度增加，浸信会的两翼（即主张宣教、与反对宣教的两个力量之间）变得更加彼此分离。然而，传教士精神明显增长，而反对传教士的精神则相应下降。前者的增长，导致那些主张宣教的人更受到很大鼓励；而后者的缩小，则使得那些反对宣教的人变得更加顽固和鲁莽。反对者的队伍偶尔会出现分裂，并导致更多的新人加入主张浸信会宣教的力量。当这样的情绪发生变化、此消彼长的时候，对传教是有利的。然而，在田纳西州，这个趋势（即主张宣教的势力增长，而反对宣教的势力衰退）有一个特别的例外，那里对宣教有明确的强大反对力量（即，在田纳西州，反对宣教的力量不但没有衰退，反而一直非常顽固、非常强大）。

起初，看来路德·赖斯在访问南方期间，成功地在田纳西州的教会中激起了宣教的热情。但是大约在 1820 年，情绪的潮流发生了变化，反对宣教的势力呈现出最恶毒的形式。事实上，反对力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据说，“没有人敢开口支持任何宣教或慈善事业或行动。”其结果是，赖斯所曾经推动的组织化宣教工作在田纳西州分崩离析，浸信会教会内一片混乱，反对宣教派的朋友们纷纷集结，宣教事业长期瘫痪。这种反对宣教的强大影响力甚至一度蔓延到邻近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此，北阿拉巴马州的教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传教。

对宣教缺乏兴趣、并反对宣教的原因有多种。

据称，人民群众的文盲状态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他们的时间如此专注于清理土地和开垦土地这一农作事实加剧了这一障碍。此外，对超加尔文主义的强调【译者注，超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主义正统教义上进行了错误的延伸，即认为，在宇宙、世间、一切世事上，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掌管、运作、经营、预定、安排、等等，因此，人不应当在任何事情上做任何努力，而是应当在任何事情上都“顺其自然”，任其本身自己演化和发展；甚至，在这之中，人的任何努力、干预、经营、计划，都是不对的，都是违抗神意、或不尊重神意、不顺服神意的。——换言之，人就应当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尤其不要在传播福音方面去进行人为的、勉强的、热情的努力。——显然，这种超加尔文主义并不深刻地明白，预定论与宿命主义之间的重要而鲜明的本质区别，也更是对于圣经的直接而显然的悖逆、违背。超加尔文主义是一种明显的对于圣经教义的曲解、谬解、歪曲】，被推到如此荒谬的结论，以致贬低所有人类的努力，严重阻碍了宣教的进展。在一个意志坚强、但对于圣经没有详实正确了解的牧者团队所施加的影响下，很容易看出超加尔文主义者将如何占上风。

再一次，卫理公会、坎伯兰长老会和门徒们的咄咄逼人运动，以及他们的阿民念主义教义，加强了超加尔文主义的浸信会信徒的抵抗力量，从而削弱了为传教事业掌握必要手段的可能性。最后，反对宣教者丹尼尔帕克的活动力量是宣教精神发展的最大障碍。

除了上述这些原因，还可以适当地加上世俗性原因；它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迅速增长。任何有助于减少私人金库资金外流的借口都受到欢迎（即，在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局面下，很多人们都忙于赚钱、经营、投资、经商，——而不愿意为教会事业、宣教事业捐献资金）。

直到 1836 年或 1838 年左右，南方的浸信会教会、和浸信会教会协会之间一直存在混乱和纷争；这段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大分裂”时期。这时反宣教势力已经变得非常具有敌对性，并坚持要从所有支持宣教的教会和教会协会中撤出。这种分裂是最幸运的。这次分离预示着，南方浸信会以及宣教事业更好日子的黎明。

浸信会家族两个分支的发展历史差异最具启发性。在主张宣教与反对宣教的 two 股力量之间，——在彼此分离以后，一个随着启蒙和发展而成长，建立并维持了它的神学院校，建立了最著名的宗派出版社，产生了一种与最纯正信仰的学术水平相当的神学教育，在最重要的地方建立了它的教会中心，并将其传教士派往全球最偏远的地区。——另一个则稳步留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远离启蒙和进步的范围。

南方浸信会教会中另一个最有成效的干扰源是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观点及其广泛传播。——他在反传教运动期间作为一个新宗派的创始人出现。事实上，坎贝尔先生尽其所能地利用了干扰局面来促进他自己的观点。他与反传教分子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传教事业和牧灵支持（即，他们反对牧职人员在教会中获得薪酬）。通过他的机关报《基督教浸信会》（这是一份小型宗教月刊，于 1823 年首次出版），坎贝尔先生极其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严格地在字面上符合圣经标准，并使自己与——海外宣教活动、圣经协会、神学教育协会、董事会、实际上是所有福音派机构的——所有反对者结盟。坎贝尔先生拥有健谈的口才和好辩的精神，他很快作为辩手在当地享有盛誉。坎贝尔先生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四处旅行、讲道，南至纳什维尔，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并为自己赢得了相当大的荣誉。这是一个显着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坎贝尔先生善于辩论、尖锐的讽刺和反讽、精明的回答，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摒弃了常规的讨论方式，用一种魅力和新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总是能引起大众的关注。

对于像坎贝尔先生这样的反对宣教者来说，没有哪个时节比他出现的时间更合适了。“教会变革”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多年以来，“极端加尔文主义”或“唯我论”的观点一直在讲坛上大肆宣扬。在炉边、家庭圈子以及讲台上对如此狭隘观点的不断讨论，已经耗尽了成千上万听众的耐心。源于极端加尔文主义观点的干巴巴、乏味的推测的呈现，使知识分子的品味黯然失色。人们渴望面包，却得到一块石头（即，加尔文主义作为对于圣经教义的尽量正确全面的总结，本应当使人认识到上帝的主权、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以及使人在反思己罪中谦卑、悔改、并坚定地信靠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并且热忱勤勉地、事奉神、服事于教会与福音伟大事工；然而，超加尔文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却在加尔文主义教义中进行了错误的延伸，甚至使所谓“预定论”变成了“宿命主义”，从而否定了人应当有热忱、真挚、奉献、勤勉专注于事奉工作的信仰与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坎贝尔突然崭露头角。对他来说，当时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很好地利用了它。

数百人涌向被称为“改革者”的坎贝尔的标准；这是一个他很高兴的称号。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称“改革派”的教派，但被他们的反对者羞辱地称为“坎贝尔派”。坎贝尔先生的出现是冲突、分裂、疏远和恼怒的信号。他好辩的支持者最积极地劝说他人改宗。他们热情多于礼节，不断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遇到的所有人。这一运动对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教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它迅速蔓延到邻近的州。在某些情况下，整个教会陷入困境。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第一教堂的情况尤其如此，该教堂有一段时间完全处于坎贝尔门徒们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坎贝尔的追随者和浸信会之间的分裂早在三年前就在肯塔基州发生了，但它被 1827 年开始的伟大复兴所阻止。由于浸信会教会与坎贝尔的追随者断绝了团契，使得后者通往独立组

织的道路变得容易了。

坎贝尔的追随者们声称要回归基督教的原始原则；新教派采用了“门徒”的名称。从浸信会、卫理公会和长老会教会中，都有信徒加入了这个新组织的行列；但浸信会教会会众中间提供了更多的人数。多年来，该新教派非常受欢迎。它像一场燎原之火席卷了新西部，并深入到南方各州。有一段时间，它似乎会压倒所有其他教派。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继续涌向它。他们在获得新皈依者时，并不总是遵守最严格的规定。各种手段都受到赞扬；从而引起偏见，在教会和社区中造成不和，并在摇摆不定的人的思想中造成混乱。人们大声喧哗，厚颜无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蜂拥而至听取他们（坎贝尔门徒们）的讲道。不管对这种坎贝尔流派的鼓动还有什么看法，毫无疑问，它极大地帮助了反对婴儿洗礼、以及浸入式洗礼教育。坎贝尔门徒们对浸入式洗礼的强烈强调向数以千计的儿童浸礼会教徒强调了彻底检查该主题的重要性。结果是很多人皈依了浸入水中洗礼的教义。

坎贝尔流派拒绝那些接受儿童洗礼牧师所施行的有效洗礼；他们否认儿童浸礼会组织是基督教会，并且否认他们的牧师是适当授权的福音牧师。格雷夫斯博士试图在这些观点上推崇“非共融”的观点；即，在这种观点中，他否认他领导的浸信会教会的成员有权与他所属的教会以外的任何其他基督教会进行共融交流。

这些观点在密西西比河谷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田纳西浸信会》找到了表达方式；格雷夫斯博士自 1846 年以来一直担任该期刊编辑。格雷夫斯博士是一位有非凡能力的辩论家，和一个充满魅力的演讲者。在他身上同样融合了轻松的作家和雄辩的演说家风格，因此通过口耳相传、以及通过《田纳西浸信会》的专栏文章，他能够影响到众多受众。多年来，他的报纸期刊一直是西南部浸信会的动力引擎。他在整个南方各州也并非没有追

随者。他大胆主张的观点为教会会众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有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异议。

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精神主要在密西西比河大盆地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那之后，一种改变开始了，开明的保守主义（例如，他们虽然坚持浸礼教义的正确性与重要性，但是，并不认为那些浸信会以外的基督教宗派就不是正统教义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译者注，请参考约翰欧文所著《基督教会的合一与爱》】重新抬头。虽然在南部和西南部的不同地区仍有一些人坚持最初的“反宣教”、“反共融”的观点，但与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人相比，他们已经很少了。

第七章

在分离前对于宣教的兴趣

南方早期的浸信会以他们对本地传道的热心而著称。这个事实，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大程度地导致了，该教派在其早期历史的前半个世纪中的惊人扩张。南方早期的浸信会福音事工在向穷人提供福音方面有着无法抑制的热情，因而从未被他人超越。这些南方的原始传教士勇敢而英勇，他们是南方文明的前驱，部分是被夕阳西下的未开发、但诱人的地区所吸引，部分是被扩大基督教福音传播范围的愿望所驱动。随着旷野和荒地的开垦，那里的群众也因着广传的基督福音而从罪恶中得到了拯救。

这些传播基督福音的英雄们冒着一切危险，忍受着一切艰辛，下定决心传道。即使在使徒时代，福音传教士们热情的罕见表现也没有超出过这样的程度。

本书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这种南方浸信会早期传福音的精神。

从来没有人反对南方本地传教的工作；但是，当向早期的美国南方浸信会教会提出海外宣教的问题时，立刻引起了一些反对。甚至，对这种海外宣教运动的反对变得激烈，——因为它被认为是对上帝神圣特权的明显侵犯，因为它企图承担向地球遥远地区（例如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福音传播责任（即，那些反对向海外宣教的人们认为，全世界万国万民都在上帝的神圣主权之下；所以，不应当历尽艰险而去向海外差派宣教士、传播基督福音；——这些反对宣教者错误地认为，那种向海外宣教的努力是侵犯了上帝的主权与管理）。

这些反对宣教者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外国传教士的反对意见，其实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国内传教士（即，根据那些反对宣教者的“神学观点”，那么，国内宣教事业也是不对的，因为它也是对于上帝神圣主权和管理的不当“侵犯”）。引导南方各州广大浸信会教徒将宣教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世界范围的努力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事实上，在不少地方，到目前为止，这种尝试仍然不很成功。南方浸信会教会中有数以千计的浸信会教会成员被误称为宣教浸信会的教会成员。

在南方浸信会寻求传福音开拓事业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努力始于查尔斯顿浸信会教会协会，当时约翰·加诺作为传教士首先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的亚德金地区。南卡罗来纳浸信会在布道事业中的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在。从一开始，他们就享有杰出领导的卓越地位——尽其所能的、尽职尽责的领导。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会从未从 Screven、Hart 和 Furman 领导的恩典事业的崇高水平上退缩。甚至在贾德森和赖斯博士的海外宣教事工之前，Furman 博士就在为出版凯里文字和马什曼文字的圣经译本而筹集资金，并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热情。理查德弗曼（Furman）博士的智慧在与这一值得称赞的工作（圣经翻译）相关的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即寻求激发早期牧师的愿望，以

便更好地准备他们的海外宣教工作。他的睿智促使他在传教运动中超越眼前的结果——他希望看到这种传教精神成为一种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精神。为此，他在努力募集捐款翻译圣经的同时，力图提升对于宣教牧师教育的、有组织培养工作。这导致了 1821 年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的成立，这是理查德弗曼出色领导的证据。该州浸信会教会大会建立在事工教育（即对于牧者的系统化神学教育培养）和传教扩展（即对于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宣教工作与规划）的双重理念之上。在弗曼博士看来，它们就像影子和实体一样不可分割。当路德赖斯访问南方时，他也以同样的热情敦促神学教育事业和宣教事业；他发现至少在一个地方，已经有人先于他而倡导了这些相关思想。

1817 年，赖斯和弗曼作为同伴，一起站在费城举行的全国浸信会三年一度的大会的讲台上，倡导这些不可分割的事业兴趣。任何熟悉浸信会教派的人都不会看不出，这些属神的人在这两个事业要求（即，1. 神学教育、牧灵培养；2. 以及宣教事业拓展）的同等紧迫性中的智慧。

紧随南卡罗来纳浸信会有组织的努力之后，是佐治亚州的浸信会教派。在默瑟（Jesse Mercer）领导的工作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组织成立。像弗曼一样，在毗邻的佐治亚州，默瑟先生将向世界传福音与开明的牧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是著名的 Powelton Conferences（Powelton 浸信会教会协会）成立的主要推动者；佐治亚浸信会的传教和教育组织由此而生。这些协会会议发展成为总务委员会，由佐治亚州各地区浸信会教会协会的成员组成，其独特目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巡回布道促进州内宣教使命，并沿着该州的西部边界延伸、在克里克印第安人中建立一所学校。

亚伯拉罕马歇尔被任命为佐治亚浸信会总务委员会主席，亨利霍尔科姆担任秘书。该会发表了一份一般性的讲话，部分针对该州的浸信会，部分针对“本州内所有不属于他们的教派的福音传道人；希望在和平的纽带中实现精神的

统一。”讲话的第一部分与浸信会教派有关，旨在解释该浸信会福传运动的性质，并邀请合作、推动其发展。这讲话的第二部分，写给其他教派的牧者时说：“怀着最大的敬意和感情，我们邀请弟兄们进行调查，以便根据圣经调整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共同合作。”虽然该运动和它的发起人一样真诚，但它在一开始就被教派联合的尝试结果所削弱。它同样未能获得浸信会和其他教派成员的认可。它确实不代表浸信会的普遍情绪，并被婴儿洗礼者拒绝。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其他教派的两位牧者回应了邀请，一位是卫理公会成员，另一位是圣公会成员；但教派统一的主题从未被提及。从此以后，注意力仅集中在浸信会宣教和牧职教育上。

但是，在试图将浸信会与其他教派融合时，总务委员会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疏远了全州浸信会教会协会的各个教会与会众。教会协会以不祥的沉默忽略了这件事，这表明人们严重怀疑浸信会教派正在被出卖到最恶劣的公开共融中。总务委员会的成员永远无法修复这个错误，使浸信会宗派满意。随后是教会无所作为的时期。但在 1813 年，人们对宣教的兴趣重新兴起，起源于萨凡纳河浸信会教会协会。在 William B. Johnson 博士的领导下，在州内传福音方面采取了先进的步骤，并且还决定了，劝告教会尽最大努力支持州外宣教。萨凡纳浸信会成立了外国布道会，其中的成员威廉·T·布兰特利博士成为相应的秘书。一封致佐治亚州浸信会协会的通函成功地激起了传教士的热情。它立刻变得很明显：必须有一个更紧凑的组织。这种必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以至于佐治亚总协会于 1822 年成立，这导致五年后，佐治亚的浸信会一再努力采取措施使查塔胡奇河东岸和西岸的印第安人基督教化。最后，在 1823 年，印第安人改革教会和学校在威辛顿站的克里克成立，该站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现址以南约 30 英里处。这些事工被分配给 Rev. Lee Compere 照顾。

然而，这些奋斗的努力并不代表佐治亚浸信会在从本世纪初到 1827 年的整

个时期内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并且在很久以后，他们为传教事业做出了慷慨的贡献，影响了整个浸信会教派。需要很多技巧来产生一种普遍倾向，以帮助教派推动的福传事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领导者中包括霍尔科姆、布兰特利、默瑟、舍伍德、马歇尔、桑德斯和基尔帕特里克等领导人。

在十九世纪初，以及紧随麦格雷迪复兴之后的那段时期内，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很特殊。大约从 1812 年到 1832 年，那个州的浸信会教会中有一种停滞不前的精神。然而，他们拥有足够的能量和活力来抵抗本地或外国福传事工的进展。在这段时间里，相隔不少于二十年期间，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堂增加的成员不超过 6000 人。大约在 1815 年曾有人试图将教会从他们的昏睡中唤醒，并建立一个系统的传教组织，但没有成功。当时公认的北卡罗来纳浸信会领袖约赛亚·克鲁德普（Josiah Crudup）和罗伯特·丹尼尔（Robert T. Daniel）对传教事业没有丝毫兴趣。

再次，在 1826 年，人们努力为宣教创造热情，这种努力最终促成成立了一个苦苦挣扎的组织，称为浸信会慈善协会，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的成立。该组织于 1830 年 3 月 20 日在格林维尔镇附近的一个大谷仓中成立。

这项事业是梅雷迪思（Thomas Meredith）牧师明智的指导和不懈的热情的结果；他在会议之前准备了章程；这个年轻组织的目的在章程的第二条中明确而有力地提出：

“本公约的主要目标是教育蒙上帝呼召从事传道工作并得到他们各自所属教会认可的年轻人，在州内范围聘用传教士，以及与美国全国浸信会大会合作，促进一般使命。”

只有少数人参加了这个最初的机构，他们完全知道这样的行动会遭到强烈的

反对。完成拟议传教工作的方法尚未确定。当时在该州内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各种信仰的浸信会教徒；他们以近乎骇人听闻的冷漠态度对待所成立的州浸信会公会。但是，梅雷迪思（Thomas Meredith） 牧师等事工发起者并不气馁，而是尽最大努力为了实现州公会的拟议目标，任命了 12 个人到州内各地进行游说。这些人将在没有薪酬的情况下在各个方向走遍该州，并在最坚决的反对者面前倡导公会的福传主张。梅雷迪思先生准备了一份要发送给北卡罗来纳州各地浸信会教堂的演讲，阐述了州大会的目标并呼吁合作。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取得的进展一点也不令人鼓舞。但是运动的发起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因此没有被遇到的阻力吓倒。这进一步证明了北卡罗来纳州宗派发展的起点，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该州成为美南浸信会各州的人数第三大的州。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会中，涌现出许多最睿智、最能干的浸信会领袖，其中可能包括 Mercers、长老 Brantley、长老 Basil Manly、John Kerr、RBC Howell 和 AM Poindexter。

弗吉尼亚浸信会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后的斗争有助于消除他们内部之间的细微差异，并使他们更具凝聚力。但是，反对传教事业的人并没有能够阻止该州传教精神的进步。

在弗吉尼亚总务委员会的主持下颠覆了当权派之后，另一个机构于 1800 年成立，称为通信委员会。这个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州大会委员会的作用，激发了人们对宣教事务和宗派事务总体方向的兴趣。通信委员会一直持续到 1823 年弗吉尼亚总会成立之时。在这个组织成立期间，弗吉尼亚有不少于四万名浸信会教徒和二十个地区协会。RB Semple 被选为总协会的第一任主席，JB Jeter 和 Daniel Witt 被任命为第一批传教士。这些虔诚的人寻求实现两个目标，就是使贫困地区的群众皈依基督教，以及在宣教问题上教育教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坎贝尔作为一个勇敢的争论者而声名鹊起，他

与那些领薪水的牧师和组织化的传教士作斗争（即，坎贝尔先生错误地反对牧师在教会中领受薪水，而且错误地反对众教会在宣教事业上进行组织化行动）。坎贝尔先生的言论和行为极大地分散了公众的精力和注意力；泰勒、杰特、维特和森普尔抵制了坎贝尔先生。虽然坎贝尔先生成功地吸引一些人采纳他的观点，并疏远了其他人，但大多数浸信会教派会众都对全国浸信会的一般宣教工作表示同情。弗吉尼亚的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路德赖斯代表哥伦比亚学院和缅甸传教士所激发的热情；他们的领导人是美国全国浸信会三年一度大会的重要成员。

如前所述，马里兰州浸信会的人数从来都不多，但他们是南方各州最早表现出传教士精神的人之一。早在 1793 年，巴尔的摩浸信会协会就成立了，并很快将自己登记为传教机构。然而，最终，一种反传教士精神逐渐兴起，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到 1836 年，当时反传教士的浸信会教会以七张的多数票控制了巴尔的摩浸信会教会协会。1836 年，该协会以 16 票对 9 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反对“与世俗社会联合”的决议，并宣布不与那些已经这样做的人建立友谊。这意味着他们与传教组织、主日学、圣经协会、福音小册子事工和禁酒协会等所有福音机构的分离。这一行动导致该浸信会协会破裂、并终止了协会的传教热忱。然而，在马里兰州（除了巴尔的摩以外的地区），浸信会众教会通过马里兰浸信会联合会表达了他们对组织化宣教的兴趣；它于 1836 年被组织为一个独特的传教机构。这个福音机构聚集了那些抵制反传教浸信会侵蚀的人；自成立以来，马里兰浸信会联合会一直是一个热情的传教士团体。

早期浸信会认识到在美国国家首都建立浸信会教会的必要性。早在 1802 年，华盛顿就成立了一座浸信会教堂；当时华盛顿是一个正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镇，只有很少人口。只有六名正式成员加入了 1802 年 3 月 7 日在华盛顿成立的第一浸信会的教会章程。为了提供牧养服务和讲台供应，这间新生教

会被迫依赖当时担任国会牧师的威廉·帕金森牧师。

临近当年年底，一座朴实无华的礼拜堂建在了 I 街和第十九街的拐角处。五年来，这个苦苦挣扎的教会被迫依赖国会的牧师来得到它所能享有的任何布道或牧养监督。但在 1807 年，Rev. O. B. Brown 承担了教会的牧养责任，并在非凡的四十任期内为该教会服务。

斯宾塞·H·科内 (Spencer H. Cone) 在皈依并放弃舞台后，就进入了这座教堂。三年后 Cone 先生获得了传教士执照。1814 年，Hon. O. C. Comstock，国会议员，加入教会，受洗，并后来获得传道许可。教堂的位置于 1833 年更改为第十街，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的礼拜堂。1859 年，第一教会和第四教会合并。它的历任牧师是 Messrs. Brown、Hill、Cole、Samson、Gillette、Cuthbert 和 Stakely。

华盛顿第二浸信会教堂，有时也称为海军造船厂教堂，成立于 1810 年 6 月 10 日，最初只有五名成员。这个小小的教会首先聚会的地方是在一座小型建筑内。斯宾塞·H·科内 (Spencer H. Cone) 就是在这座小房子里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当时，科内先生是财政部的一名文员，后来升任国会牧师。Lynd、Neale、Chapin、Maginnis、Poindexter、Bacon、Adams、Sydnor、Boston 和 Cole 的名字出现在该教堂的历任牧师名单中。

这些教会代表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首都成立的浸信会教会集团。浸信会很难在华盛顿获得永久立足点，若不是少数热心男女的忠诚和奉献，浸信会在首都的立足就会大大延迟。

自现在考虑的时期以来，除了已经提到的教会的历史与现状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相关教会与情况，但这里不在此提及它们。在他们的协会联系和传教工

作中，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浸信会在教会会员资格上分为哥伦比亚协会和弗吉尼亚州的波多马克协会。

在他们历史的早期，肯塔基州的浸信会是最有进取心的一批人，尤其是在州内传教方面。他们对一般传教工作的兴趣可以追溯到 1800 年的伟大复兴。在此之前，肯塔基州的巡回浸信会传教士几乎没有尝试走出该州边界。受 1800 年震撼全州的伟大复兴的热情所激发，浸信会传教士将他们的工作扩展到俄亥俄州等地，进入北部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以及南部的田纳西州。

根据 JM Peck 博士的说法，肯塔基浸信会是第一批进入伊利诺伊州的新教教徒。詹姆斯史密斯牧师是一位英勇的传教士，他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后来发展成为那个伟大州（伊利诺伊）的荒野之地。就在这样尝试努力的时候，他落入了印第安人的手中，他的兄弟们以一百七十五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中赎回了他。1801 年，南麋鹿角教会向麋鹿角教会协会发出请求，“派遣传教士到印第安民族这里来传福音”。由于任命了一个福传委员会，此事立即受到关注。五名委员会成员听取并决定，应牧师的要求，如果大家对此感到满意，则为此目的向所差派的传道弟兄提供全权传道证书；接收用于上述任务的捐赠物品；并建议教会鼓励为上述目的捐款，并将钱存放在执事处，以便在委员会要求时用于该目的。任命了以下委员：大卫·巴罗、安布罗斯·达德利、约翰·普莱斯、奥古斯丁·伊斯汀和乔治·史密斯。

结果是约翰·杨被埃尔克霍恩教会协会派往印第安人传教。

早在 1816 年，当海外宣教的主题受到整个南方教会的关注时，我们在肯塔基州看到了六个宣教协会，它们是向费城浸信会宣教委员会财务部的慷慨捐助者。

肯塔基州的教会在 1817 年再次蒙福，经历了一次非凡的复兴，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再次转向了宣教主题，因为紧随其后的是在乔治敦附近为印第安儿童建立了一所学校。这是肯塔基传教士协会的工作，它给新学校起了乔克托学院的名字。这种新的福传兴趣持续了数年，并派遣了两名传教士，萨姆森·伯奇和罗伯特·琼斯，前往遥远西部的印第安人那里传福音。

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坎贝尔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干扰和分心时期。出现在那个地区的，是与坎贝尔先生密切相关的是丹尼尔帕克；他是一个文盲但非凡的人，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破坏教会中的传教士精神。他满怀无知的自信，大胆断言宣教是不合乎圣经的，并向任何胆敢反驳他立场的人发起辩论。

坎贝尔和帕克这样两个人的结合努力，几乎摧毁了肯塔基州教会的宣教精神。1832 年肯塔基州浸信会州大会成立，但很快因内部纷争而支离破碎，并于 1836 年被迫解散。然而，第二年，在肯塔基浸信会总联合会的指定下，努力恢复悬而未决的福传兴趣，该组织明显建立在州内传福音的理念之上。这种谨慎的做法表明，将海外宣教的要求强加给教会已不再明智、或不可能。肯塔基州从在传教工作方面最进步的南方各州之一，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最积极进取地反对坎贝尔和帕克的影响力的州之一。

田纳西州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同样的精神。那个州的浸信会是最先热情支持在州外（海外）传教事业的教会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最激烈的反对状态。

在路德·赖斯访问期间，教会在传教方面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热情是炽热的；但是突然发生了转变，对宣教的最强烈反对开始盛行。教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遭受着这种属灵的瘫痪，甚至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为止。诚然，全州到处都有教会参与宣教活动，但它们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多

次努力克服这种冷淡症，但都无济于事。

在阿拉巴马州，就像在田纳西州一样，传教士和反传教士浸信会之间为争夺权力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该州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的竞争最为激烈，但无一地区免于冲突。各区浸信会教会协会的年会是赞成派和反对派激烈斗争的场合。尽管如此，教派中较进步的分子仍活跃于当地的传教工作，并不懈地努力在教会方面培养仁慈。阿拉巴马州有组织的布道工作时期可以追溯到 1816 年，当时联合传教士开始工作。

1823 年，州议会完全根据宣教组织，立即派出 15 名传教士到州内不同地区。他们到处都遇到了敌对的力量，但他们坚决执行他们的工作。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领导人是特拉维斯、贝斯特和霍尔科姆，他们的住所分别位于该州的南部、中部和北部。通过一致行动，他们成功地维持了足够的组织来遏制反对派，同时继续他们的福传工作。

密西西比浸信会是最后一批组成一般州教会协会组织的组织。在成立于 1839 年的这种组织之前，也就是在美南浸信会大会成立前几年，地方教会协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传教工作。考虑到新奥尔良战役后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随后与英国的和平，以及在新地区遇到的困难，密西西比浸信会在耕种家园的福音传播方面完成了一项最值得称赞的工作。

浸信会事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建立完全归功于传教士在最严酷的障碍中所做的努力，以至于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被带进教堂的人很自然地吸收了传教士精神。多年来与密西西比州的浸信会组织一致，路易斯安那州的浸信会教派终于开始在其当地福传工作中变得与众不同。

协会的章程早在 1818 年路易斯安那浸信会教会协会成立时就开始了。随着

教派的扩大，密西西比河两岸也成立了类似的团体。路易斯安那州浸信会大会直到 1847 年才组织起来，即美南浸信会大会成立两年后。

由此可见，在从美国独立革命（1776年）到美南浸信会组织正式成立（1845年）的漫长时期内，南方的教派在地方宣教工作中特别活跃，并沿着先进的传教努力方向发展。南方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有必要在地方性的福音传播上付出很多努力。在原始和混乱的人群中，这项必要的工作是如此重要、强调和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更难将注意力转移到同样重要的世界（遥远地区）福音化问题上。那么不可否认，当时的商业主义严重阻碍了宣教的发展。当这些人全神贯注于征服更严酷的自然力量，同时又被巨大收益的前景所诱惑时，要争取人们献身于神圣的工作并不容易，其必要性并不明显。对这样的人来说，布道讲坛关于仁爱的训诫和督责被认为仅仅是功能性的。这些条件可能有利于世俗精神并且确实如此，但它们相应地阻碍了仁爱精神。

第八章

美南浸信会的成立

美南浸信会大会的成立是关于蓄奴问题煽动的直接影响后果之一。在南北浸信会分离之前的许多年，奴隶制问题已经在浸信会圈子和教会协会中得到热烈讨论。南方许多最大的奴隶主都是浸信会教徒（因为浸信会在南方整体人口中都占多数），他们在浸信会教派中名列前茅。他们对奴隶制的捍卫与北方浸信会对奴隶制的谴责一样明确和真诚。在内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时节，这两个部分对彼此的反感情绪相应增长。在世俗和宗教媒体的期刊专栏中，在讲坛上，在论坛上，在国会，这个问题的鼓动必然会扩大南北之间的分歧。

作为南方的一个制度机构，奴隶制经历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三个阶段。到 1835 年，它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已经耗尽了它的力量，而直到它存在的最后时期，它继续影响着南部经济。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会产生最可怕的后果。因此，它把浸信会这个伟大的教会机构也分裂成两部分，最终将国家卷入血腥冲突。

三年一度的全国浸信会（教会协会）大会理事会中智慧和节制的影响多年来搁置了不那么谨慎的人的热情。除了偶尔因一些不明智的言论或行为而产生摩擦外，直到 1844 年，美国浸信会教派的普遍和谐状态才开始受到挑战。这是由于明智和冷静的精神的影响；他们刻意压制所有最初的苦涩的表现。南北浸信会宗派领袖的目的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目的是尽可能避开这场迫在眉睫的麻烦。直到 1844 年，南方浸信会教会与北方浸信会教会在对由三年一度全国大会维护的协会财政捐助方面展开竞争。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全国大会解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其他人来说，同样清楚的是可以避免中断（避免分裂）。属于后一类的是著名教会领袖理查德·富勒（Richard Fuller），他于 1844 年在三年一度全国浸信会大会上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我国某些地区对我们全国浸信会大会的主旨或特征存在一些误解，最可取的是消除这种误解；因此，决议，本大会公约是一个有限权力的机构，用于其章程中定义的特定目的；因此，其成员被授权仅为处理上述章程规定的事务而开会；并且本机构的合作不涉及、也不暗示：对于与上述指定目标无关的其他任何事项的任何一致或同情意见。”

该决议提议立即得到纽约州的斯宾塞·H·科恩的附议，并得到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海恩和弗吉尼亚州的 JB·杰特的支持。但它遭到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科尔弗（Nathaniel Colver）的顽固抵制，他表示希望自己在任何可能提交给大会机构审议的问题上都不受到阻碍。

经过一番讨论，该决议被撤回，并提出、通过了以下决议内容：

“鉴于，在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存在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当前全国大会组织，与支持奴隶制度的某些教会协会联合，或与旨在反对该制度的某些教会协会联合；兹此决定，作为本大会公约的成员在外国宣教使团的工作中共同合作，但我们不接受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意涵，无论是支持奴隶制还是反奴隶制；但作为个人，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以基督教的方式和精神表达和宣传我们对这些主题的看法。”

富勒博士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很冷静、并不热情；虽然他并没有被说服相信奴隶制是一种罪恶，但他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罪恶。他进一步说，他在南方的弟兄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希望并祈祷该制度可能被废除。

南方浸信会教派中支持奴隶制的拥护者声称，就在 1844 年三年一度全国大会之后，外国传教士委员会敦促约翰布希黑德牧师退休（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印度浸信会传教士），因为他是奴隶主。这在整个南方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奴隶主从此以后将不会被任命为宣教委员会的成员。同年，也就是 1844 年，在韦兰和富勒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奴隶制争论。后者回应了出现在《基督教反思者》专栏中的某些废奴制言论，并在这样做时引用了韦兰的《道德科学要素》以支持南方对该问题的观点，来反对《基督教反思者》期刊所表达的观点。这就需要韦兰博士的书面答复，争论由此开始。辩论双方是南北浸信会教派公认的思想领袖。这个重大问题的伦理和圣经基础都经过审查，并且当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唯一的好处，也许，来自于争论过程是一种礼貌和基督教精神的展示，使它自始至终都与众不同（即，双方的争论过程虽然针锋相对、南辕北辙、毫无交集，但是，彼此之间仍然保持了彬彬有礼的礼貌和互相对于彼此的仁爱精神）。

以如此平静和礼貌的方式讨论该制度（奴隶制）最严肃的特点，在一段时间内有助于减轻痛苦的情绪。但这是短暂的。世俗媒体助长了公众的兴奋之火。国会大厅里充斥着对多方面主题的讨论。整体分裂的机会虽然很小，但经常被这个紧迫问题的双方的拥护者放大。争论像战斗中的枪声一样来来回回。任何一方的任何明显行动都会更远的距离上击退另一方。波士顿浸信会委员会内政秘书 RE Pattison 博士的某些言论表明了这一点，这些言论暗示三年一度全国浸信会大会理事委员会将不再容忍奴隶制问题。正是这些言论促成了著名的阿拉巴马州决议。塔斯卡卢萨教堂的提问引起了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州议会的注意；该提问的作者是 Basil Manly Sr. 博士。该提问是：“南方，为了传教和其他慈善目的，在奴隶制被正确控制之前，向我们北方的弟兄们寄更多的钱是否是公平地站在双方一边？希望这个问题有助于采取敏锐而果断的行动”。该查询连同佐治亚浸信会大会发给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大会的信件，被提交给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老巴兹尔·曼利博士担任主席。委员会行动的结果体现在以下决议中：

“鉴于，多年来，非洲黑人奴隶财产所有权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在团结于慈善事业中的浸信会教派的不同部分之间激起了讨论；我们的大部分弟兄现在将这些南方和西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归罪为一种既严重、明显、又低下的罪过；因而，——

1. 兹此决议，……当基督教弟兄自愿契约的一方不愿意承认与另一方的整个社会平等，以及关于联盟的所有特权和利益，甚至不愿意避免弹劾和烦恼，——即使在基督教仁慈的神圣事业中，——那么，这些各方之间的联合努力也不再令人愉快、有用或适当。
2. 兹此决议，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职责是要求所有那些我们为其捐款或与我们有任何联系的机构的适当当局，明确清楚地承认奴隶主有资格，并且与非奴隶主一样，有权享有他们几个协会的所有特权和豁免权；特别是接受可能在其业务或职责范围内运行的任何机构、任务或其他任命。

进一步坚持认为，如果申请人的道德品质受到质疑，则应将此类问题提交给他所属的教会解决。未来对这些协会的贡献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令人满意。”

外国使团委员会的答复也是有着类似的张力。它说：——

“据我们所知，在委员会存在的三十年里，没有奴隶主申请成为传教士。另外，由于我们不派遣传教士携带佣人或仆人，因此，根据我们过去的所有安排或目前的计划，传教士携带奴隶这样的事情，即使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发生。然而，如果有人自荐为传教士，且拥有奴隶，并坚持保留他们作为他的财产，我们就不应该任命他。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任何暗示认可奴隶制的安排的一方。”

仔细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上述双方发表的言论中有一定的谨慎和保留意见。语言充满了内敛的力量，在传统的礼貌之下隐藏着坚定的火焰。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州大会的发表言论是迄今为止双方之间言论中最具决定性的言论。据信，该言论的挑战性的尖锐特征对促成最终的南北方之间分离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快，浸信会全国大会的国内宣教协会拒绝任命佐治亚州塔拉普萨教会协会的詹姆斯·E·里夫斯（James E. Reeves）为传教士；这个立场得到了实际的重视。这一拒绝决议是直接向佐治亚浸信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理由是里夫斯先生是一名奴隶主。由 JL Dagg、VR Thornton、JB Walker、Thomas Stocks 和 BM Sanders 组成的佐治亚浸信会执行委员会立即指示其财务主管扣留其准备向北方浸信会捐献的所有资金，直至收到进一步指示。随后，浸信会全国大会国内宣教委员会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详细叙述国内宣道会的行动细节。

解散的时刻到了。南方各州的教会协会开始一个一个地退出。与他们一起退出的还有传教士辅助协会，它们曾为三年一度的全国浸信会大会理事会做出

了如此丰富的贡献。弗吉尼亚外国传教士协会董事会建议邀请南方浸信会于1845年5月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开会，以指明未来的行动方针。与此同时，全国（北方）浸信会教派的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在北方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举行。前一年由美国浸信会国内布道会任命的委员会的报告已提交，以考虑友好解散该协会的问题。内容如下：

“鉴于，美国浸信会国内布道协会由居住在蓄奴州的捐助者组成；鉴于，章程不承认协会成员之间关于协会和董事会赠与的所有职位和任命的资格的区别；鉴于，已发现协会的组织基础是协会所有成员和朋友现在愿意采取行动的基础；所以，——兹此决议，现在组成该协会的成员此后应在南方和北方的不同组织中行动，以促进该协会最初设想的目标。——兹此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报告一项计划，通过该计划可以以最好的方式和尽早的时间实现前一项决议中所设想的目标，同时保持所有成员的章程权利，并以最小的可能性中断协会的传教工作。”

这份报告的提交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领导这场讨论的突出人物是干练而保守的韦兰主席。在解散问题上，他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反对草率行动。但北方成员的极端废奴情绪和南方成员的苛刻要求表明，甚至对弗朗西斯·韦兰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赢得的比赛。报告获得通过，最终解散的时间到了。阿拉巴马州的决议被提交讨论；外国使团委员会也已对此作出答复；决议得到了审议；该委员会采取的行动得到了认可。这是韦兰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的结果。这份报告自始至终都带有和解的气息。它说：——

“1. 总会章程的精神，以及它从一开始就进行的工作的历史，表明所有浸信会教派的成员，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只要信誉良好，都符合章程规定的、所有来自公约或董事会的任命。

2.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执行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有必要进行任命——在北方的弟兄们实际上、或在基督教社区看来——对他们凭良心无法允许的机构。

3.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希望我们的弟兄们做出这样的任命违背他们的职责信念，而应该认为他们有责任将此案提交给委员会公约作出决定。

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时，浸信会教派中最能干的人都参与了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一个庞大的、有影响力的、富有的、基督徒团体的仁慈态度。——现在不是采取激烈或突然行动的时候。需要极其谨慎和小心。尽管解散全国浸信会大会令人痛惜，但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南北这两个部分的代表队伍中都可以找到保守主义。如果他们的建议占了上风，破裂可能不会来得这么早。但事实是，如果不严重损害必要的热情以及北方和南方的慷慨善意，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合作。在南北这两个部分之间，奴隶制已成为一个令人非常恼火的问题。苦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每个领域都感受到奴隶制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和南方的奴隶主若要团结一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为此动荡不安了。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冷静和智慧，以及在这些暴风雨时期所表现出的基督徒品格，导致了，由于某些原因，南北浸信会之间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幸的。就算如果它不是在 1844 年到来，就像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南北浸信会在 1845 年正式分裂），那么，它也一定会在 1861 年发生（美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尽管，如果它（南北浸信会的分裂）可以推迟到 1861 年，那么解散（南北浸信会之间的分裂状态）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即，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南北浸信会之间形成了永久性的分裂状态）。

虽然南北这两个部分都因切断状态而遭受损失，但不可否认的是，南方遭受的损失更大。从冷静的角度考虑，很明显，南方因全国浸信会大会的、与北方浸信会联合的、保守主义力量的丧失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不是说南方没有保守主义，因为尽管南方的浸信会自由派有时会展示压力，但保守主义还是相当盛行。那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偏离教派教义的东西，已经被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等州的保守情绪所抵消。自南方浸

信会成立以来，这些大西洋沿岸各州就代表了南方浸信会理事会中严格的保守主义，并使该教派免于在理论上退缩为自由派的极端行为。

1845年5月8日是美南浸信会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期。为了响应南方浸信会代表集会的号召，三百七十七名代表当时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举行会议，目的是成立南方浸信会大会。这些代表来自八个南方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肯塔基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场合。WB Johnson博士在原来的三年一度全国浸信会大会上作为理事官员而赢得了荣誉，被选为大会主席；佐治亚的Hon. W. Lumpkin, of Georgia, 以及弗吉尼亚的JB Taylor博士被选为副主席；Jesse Hartwell牧师与James C. Crane先生被任命为新组织的秘书。

该机构（南方浸信会大会）的才能体现在一项决议中，该决议是由每州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的结果。该决议如下：——

“为了和平与和谐，为了成就最大的善，为了维护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大会最初成立时所依据的那些圣经原则，本大会在一旦开始组织成立即以传播福音为工作主旨。”

这个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准备了一份详尽的告白书；并向“美国的兄弟们；与各自教会有关的会众；和所有坦率的人”发出呼吁。该告白书以坦率的声明开头：——

“美国浸信会的传教活动发生了痛苦的分裂。我们将解释该分裂的起源、原则和目标，或在何种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组织美南浸信会。不要夸大这种分裂的程度。目前它只涉及该教派的国外和国内宣教使团。南北浸信会仍然是兄

弟。他们在信仰上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遵循相同的福音秩序原则。在某些方面确实进行了狂热的尝试，将南方排除在基督徒团契之外。我们不反驳这些尝试，并认为它们的范围相对有限。我们的基督徒团契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是一件强加于任何人的事情。我们遵从于我们的上帝、他的爱子和他所有受洗的追随者。我们提到的少数极端北方兄弟愿意采取他们喜欢的方式。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影响我们。我们不认为破裂会延伸到基础原则，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的北方兄弟会如此看待它。然而，分裂已经令人遗憾地进行了很远。我们职责的第一部分是表明它全部起源于他人。”

接下来是对逐渐促成美南浸信会形成的连续事件的陈述。其中提出了对于三年一度全国浸信会大会违背其成立时所依据的原则的指控。告白书中声明有关的原始文件依据是全国浸信会大会公约成立时的宣告：“其宪章对奴隶主和非奴隶主没有区别。”该告白书进一步声明，南方浸信会公约的成员并未脱离原始的全美浸信会大会宪章。它进一步声称，美南浸信会的创始者们对“北方的弟兄们”“慷慨解囊”。同一份文件说，“在南北教会平等权利的平台推动下，我们只是重建了这个平台。”

随后进一步强调声明：

“实际上，我们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离开它，更不会服从这种篡夺的权力，或者尊重这里涉及的这种明显背信弃义的行为；违背圣约的方式有多种，有天上的，也有地上的。我们再说一遍，他们会禁止我们向外邦人说话。”

然后是一个声明，其中包含一个坚定的目标，即要在各处传扬福音。因此，在分析细节、分离的原因、美南浸信会的原则及其目标方面均有介绍。详尽的告白书最后得出结论：——

“与我们心爱的弟兄们、以及在这项事业中的合作者分手时，我们本可以哭泣，并且已经为我们自己和他们哭泣；但是我们不得不相信，哭泣和徒劳吵

闹的季节刚刚过去。多年来，世人的手对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我们的弟兄们已竭尽全力争取我们的特权和神圣权利，但这只会促使我们热情奔放的灵魂恰当地将我们新的努力注目于主、普世教会和垂死的世界；虽然外在的压力很大，但内在的动力更大。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甚至我们自己的上帝）的义务的巨大压力（即，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应当承担的职责）；归于基督，归于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归于圣灵、及其影响下对个人和社会的祝福，——催促我们生命之水的细流流淌；——直到我们可以到达的每一个荒野和荒凉的地方（以及，明智地考虑，——世界上究竟有什么荒野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范围？）（即，世上任何地方，都应当是我们传福音所努力达到的地方）将（因为福音）感到高兴，——即使有这分裂的灾难；直到未归正的人性的荒漠像玫瑰一样欢欣绽放。”

分别在阿拉巴马州的马里恩和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成立了两个总委员会，称为国内宣教委员会和外国宣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中的每一个的副主席都是从南方浸信会公约中有代表的每个州（共八个南方州再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任命的。按照美国浸信会全国大会最初的会议方式，会议被指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被指定为下一个会议地点，日期为 1846 年 6 月 10 日。这样做了，于是，美南浸信会大会的第一届会议休会。

尽管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已经计算了如此艰巨任务的代价，但想到他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他们的精神依然沉重，就像主放在古代先知身上的重担一样。

第九章

在变化的条件下工作

在南方浸信会新公约成立之初，当他们开始组织工作时，创始人们因不可避免的困难并发症而感到尴尬。对众教会、教会协会和各个州大会来说，要一下子切断将它们束缚在原来的三年一度的美国全国浸信会大会上的纽带，并立即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条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明显，从一开始，新成立的南方浸信会公约机构所处的特殊环境将阻止迅速开展拟议的工作。其中一个特点原因是与已经在福音禾场的传教士有关。在那些浸信会传教士们中，其中一些是南方人，但他们一直在三年一度的美国全国浸信会大会的主持下工作。他们会被邀请切断与上级机构的联系，并将自己置于南方浸信会新公约的照管之下吗？即使他们这样做了，南方浸信会公约会承担上级机构的职责、以及由此开始的工作吗？这岂不是又一次造成摩擦和长期干扰吗？

所有这些问题和建议都交给了头脑清醒的美南浸信会领导人，他们认识到组织的必要化，应当不同于原来的三年一度的全国浸信会大会。这些困难是事先考虑到的，并没有在现场才临时发现。就南方出生的传教士而言，他们向北方浸信会委员会提议，在国外的工作中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寻求救济；但北方委员会明智地拒绝了任何此类可能导致未来复杂化的可能性。最后，问题的解决选项留给了外国传教士自己。如果他们希望留在旧的全国浸信会之外国宣教会，那好吧；如果没有，他们将受到南方浸信会宣教委员会的热烈欢迎。

在南方浸信会大会第一年结束时，人们发现从普遍存在的困难中略微解脱出来。在指定的时间，美南浸信会代表们在弗吉尼亚里士满会面。这次会议是一场庄严而得体的会议。大约一百五十名代表到场。来自美国和海外圣经公会、美国主日学联合会、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和肯塔基州浸信会总协会的代

表也都出席了会议；所有这些人都表示愿意与美南浸信会新公约的成员友好相处，而且与他们合作是可行的。

代表们以与场合相称的庄严气氛致辞。会议早些时候提出的一系列庄严决议表明了这一点，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兹此决议，在对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终表决之前（以及在全体会员认为合适的其他时间），美南浸信会公约的事务应暂停，并向全能的上帝祈祷以寻求他的灵的指导。”

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JL Shuck 牧师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Yong Seen Sang 的出现激起了不小的热情；他已经皈依基督并陪同 Shuck 先生来了美国。Shuck 先生曾受聘于北方浸信会委员会，但现在接受了美南浸信会之外国宣教委员会的任命。最近从缅甸返回的传教士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Simmons）也出席了会议。另外还任命了两名传教士 SC Clopton 和 George Percy 以加强中国的福传使命。

考虑到所面对的重重困难，美南浸信会公约的成员们心怀感恩，因为他们过去的一年里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外国宣教会和国内宣教会的临时委员会都做得很好。外国宣教委员会报告的募集金额为 17735 美元，而国内宣教委员会在这一年结束时的募集捐款的款项为 13193 美元，其中一些金额包括认捐。为了促进其在众教会中的工作，外国宣教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沟通渠道，称为《南方传教士杂志》，后来成为《外国传教士杂志》。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国内宣教委员会提议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海岸和向南进入墨西哥的地区设立宣教站，从而展现了值得称赞的企业精神。然而，由于担心引起政治联合与政治动机的怀疑，报告的这一部分没有被采纳。

本届会议议事录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提议增加使南方奴隶基督教化的设施方

式。人们普遍认为白人无法忍受西非的气候，因此从美国南方派遣至少十名有色人种传教士并一直保持这样的传教力量被认为是明智的。1846年蓄奴州浸信会教徒对黑人的态度可以通过以下会议内容来判断，这些内容被认真采纳：

“兹此决议，下定决心，鉴于非洲种族的现状，并鉴于上帝对堕落人类大家庭中那部分人的指示，我们感到一项庄严的义务不仅落在美南浸信会公约身上，而且落在所有基督徒身上，即努力为他们提供福音和合适的基督教事工。”

大会在充满希望和热情的气氛中休会，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大部分美国本土的国内宣教、传福音事业的联盟已经在进行；新机构（美南浸信会国外宣教委员会）必须承担向国外领域的传道工作职责。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必须筹集、和明智地分配大量资金。但里士满美南浸信会公约的精神保证了最终的、为广泛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一个配备齐全的外国宣道委员会永久性地设立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一个国内布道部则固定在阿拉巴马州的马里恩。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并报告：组织圣经和出版业务经理委员会的权宜之计”。

立即采取措施，尽早让福音占领南方本土的贫瘠领域。当时，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是对于传教士最有吸引力的地区。早在19世纪的前25年，一些浸信会教徒就进入了这些州，成为在那里传教的先驱；早在1825年就在佛罗里达杰克逊县建立了该州的第一座浸信会教堂。这些新州获得了政府的自由和保护，大量人口分散在广阔地区的、广泛分离的定居点中。国内布道会委员会将其精力和资源投入到这些地区，让浸信会地区协会和州大会来照顾当地的贫困人口。甚至早在1846年，墨西哥作为传教目的地就开始引起美南浸信会的注意力。

美南浸信会新公约规定的福传工作是在南方边疆地区传福音，向奴隶传福音，

以及使南方领土上的印第安人基督教化，并扩展在国外传教的工作。南部浸信会大会并没有太早开始在南部新地区开展积极的活动；这些地区的人口随着边境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当国内宣教委员会试图吸引南方内陆教会的支持时，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在地区浸信会教会协会中也主张教会的独立性，并且在州大会方面更加强烈（即，众教会在州大会中更加强烈地主张维持各个教会独立性）；当受邀与总委员会保持一致时（这似乎是中心化机制的底线），许多人公开抗议。的确，直到今天，这种独立精神还没有完全离开南方浸信会内部的许多教堂。但是，美南浸信会理事会的力量不断扩大是由于南方众教会越来越默许它、支持它；可以说这种默许与支持，与美南浸信会事工效率的提高成正比。

这些年来，从美南浸信会成立到现在，南方一直在进步——现代政治用语称为“教育运动”。在介绍两个委员会（国外宣教委员会与国内宣教委员会）各自的主张时，优势一直在国内委员会一边；其在南方新定居点（例如得克萨斯与佛罗里达）的明显成就一直引人注目；因而，国外委员会被迫等待传教士情感的更充分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同胞姐妹——国内传教委员会。

在美南浸信会大会的早期历史中，对耐心、精力、智慧和精神奉献的需求很大。美南浸信会公约涵盖的领土广阔，包括十四个大州，总面积九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平方英里，人口八百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人的特征性格；他们完全没有被传福音。为了达到福传工作的规模化，在美南浸信会制宪会议成立期间，南方各州约有两千名各年龄段、各阶层的浸信会传教士。这个数字中只有少数人受过全面教育，而许多人几乎不识字。其他人已经年纪太大，其中数百人部分或完全世俗化，并受雇为教师、医生、商人、农民、机械师和律师。这些情况在整个南方分布不均。在较旧的州，它们更有效率；在较新的州，他们的事工不足，总不能满足当时条件的要求。

直到这个时期，浸信会几乎完全局限于乡村。直到南方历史的后期，当城镇开始兴起和发展时，农村人口中的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开始求职于这些繁荣的商业中心。浸信会教徒通常是农村地区的教会主体，该教派的许多代表被转移到城市中心以改善他们的经济命运。这些人当然组成了教会。在选择牧师时，他们寻找那些与其他教派的讲坛上的人同龄的人。这更加强调了传道教育的问题，并且有必要建立神学院。由于南方的浸信会几乎完全局限于乡村地区，幸运的是，他们的许多最有能力的牧师坚持留在那里，尽管他们经常受到城市教堂的呼唤，被邀担任他们的牧师。这些有教养的绅士中有一些是种植园和大量奴隶的所有者，他们更喜欢乡村生活的独立性，而不是最诱人的城市讲坛。一些人，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安德鲁·布罗德斯（Andrew Broaddus），坚持拒绝来自城市所发出的最紧迫和最诱人的呼召，而更喜欢农村生活和礼拜的简单传统。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这样一个人的影响范围是巨大的，在像我们正在考虑的那个时代，是最有益的。

巡游传道人开展传福音工作时，发现在南方一些地区，有的成年白人居民从未听过福音。这些巡回布道者常遇到一些从未听过布道、或从未见过基督传道人的白人成年男女。

巡回布道的、不连续的福传工作，尤其是在南方新州，常常缓慢而乏味。美南浸信会大会在为其委员会选择官员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内宣道董事会的相应秘书职位首先被授予 JL Reynolds，但他拒绝接受。DP 贝斯特接下来被邀请担任主管，但他也坦率地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这样的职位。随后，R. Holman 应邀接受了该职位。从董事会服务退休后，约瑟夫·沃克被选为接替他。沃克先生辞职后，霍尔曼先生被召回担任秘书职务，并成功地处理了董事会的事务，直至南北战争开始。MT Sumner 是下一任秘书。他辞职以后，WH McIntosh 被选为秘书；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82年；IT

Tichenor 随后接任。

美南浸信会从一开始就对福传事务的热情和能力从其机构的工作结果中可见一斑。例如，美南浸信会成立后，在其国内布道会委员会诞生后的短短 13 年里，募集捐款金额是其成立之前的 13 年里、对美国浸信会之国内布道协会的捐款数额的七倍。美南浸信会董事会通过给教会留下更大责任感的印象，并激发人们对早期向南方传福音的可能性的更大信心，从而推动了浸信会宗派工作的每个部门。

积极的机构事工使福传这件事在教会面前保持新鲜，并且随着福传（福音传播）兴趣的增加，反传教事业的障碍让位了。国内宣道委员会与众教会之间的和谐合作，为公平考虑外国宣道委员会的主张铺平了道路。

为了跟上人口“稳步西移”的潮流，国内宣道委员会得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和加尔维斯顿等中心建立教会，同时进入新奥尔良等老城市，并培养了福传兴趣。同样，在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成功的福传工作是由国内宣道委员会完成的。同时，浸信会董事会的注意力也被引导、向南进入佛罗里达州。浸信会福传工作在该州日益重要的基韦斯特和坦帕等商业点城市占据显要地位，并且因而更容易到达该州的内部。佛罗里达的福音传播工作主要是通过国内宣道委员会的代理机构达成的。在进入该州时，美南浸信会董事会幸运地找到了一些组织，例如 1841 年成立的佛罗里达协会；这些组织为采取一系列的、进取性的福音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那里的印第安人受到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的关怀照顾；至今，该委员会仍然为他们提供传道人。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从 1845 年到 1861 年完成的工作摘要（这是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夜），显示了：——共任命了七百五十名传教士；共增加了一万五千名教会成员；共设立了两百间新的教会聚会场地；共建立了两百个新教会；共募集、分配使用了三十万美元。

国内宣道委员会的活动当然在内战期间受到削弱，在此期间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南方军队的福音传播上。在这里，它的成功是一个信号，就像在和平领域一样。在委员会聘用的军队布道者中，有 IT Tichenor、EW Warren、JB Hawthorne、R. Holman、WC Buck、AD Sears、JJD Renfroe、AE Dickinson 和 JL Reynolds 等杰出人士。

国内宣道委员会经历了内战之后的普遍萧条，其逐渐复苏不得不主要依赖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等边境州。搬迁到亚特兰大后，它获得了新的活力。IT Tichenor 博士被迫离开阿拉巴马州农业和机械学院的院长职位，担任委员会秘书。1881年至1882年，也就是委员会被搬迁的前一年，有36名传教士被聘用；1883年有95名传道人，1884年有144名传道人，1884年有187名传道人，这表明委员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传道人的数量继续增长：1886年255人，1888年287人，1889年324人，1891年406人。在整个南方各州、创建州宣教委员会时，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可能没有提供比其州机构更多的服务，因为这些传道工作是地方宣道委员会工作的直接产物。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方组织一直如此有效，以至于不需要美南浸信会总会在许多州进一步运作的必要性。

国内宣道委员会在西部印第安人中的福传工作值得一提。原始部落的碎片仍然徘徊在国家的西部边界上，国内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该地区。向他们传福音的传教士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谈到印第安人，Tichenor 牧师在他的一份报告中说：——

“他们中的教会成员与人口的比例现在等于我们最强大的浸信会州。他们已经从野蛮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支持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府。他们开办了农场、盖了房子、开办了学校，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准备加入这个伟大的联邦，成为其组成成员。在印第安人领土内，现在有十六个浸信会教会协会

和三百零一个教会，拥有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四名教会会员。”

对委员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工作所说的内容，同样适用于德克萨斯州。当美南浸信会国内委员会进入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这个荒野地区时，得克萨斯州的人口稀疏分散。今天，该州有 111,38 名浸信会成员。

在其历史的后期，美南浸信会通过其古巴传教使团取得了丰厚成果。在那里，1868-73 年的叛乱期间，叛军的一名上尉被一群西班牙士兵包围在伸入海湾水域的一片土地上。该上尉宁愿死在深海也不愿面对西班牙士兵的残忍，于是他和他唯一的同伴抓住了一块漂流的木板，两人被带到了很远的海里。在漫长的黑夜里，他们是海浪的玩物。黎明时分，他们仍然紧紧抓住那块救命的木板。上尉的同伴病了，筋疲力尽，松开了手、滚进了水里、死了。上尉竭尽全力撑着木头，他自己陷入了昏迷；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艘渔船上，船上的船员把他救起了。他被从较小的船上转移到一艘大船上被运送到纽约，并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而被送往医院，在那里他的病情被宣布无望。这个年轻的古巴人强烈呼吁爱丽丝·塔克小姐的同情，她是一位年轻的基督教妇女，她通过西班牙新约圣经将他带到了基督面前。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威洛比大街教堂受洗后，这名古巴上尉、阿尔贝托·迪亚兹（Alberto J. Diaz）回到他的祖国传讲新发现的真理。

虽然起初遭到亲友的拒绝，但他在从事医学实践的同时、继续向古巴人传教；他在离开纽约之前学得了一些医术。尽管受到迫害，他还是向每一个可用的教会机构致敬，以促进岛上的福传。为难民古巴人的利益、而在基韦斯特的佛罗里达海岸建立的浸信会宣教团引起了迪亚兹的注意，这导致他与美南浸信会宣道委员会秘书蒂奇诺先生之间建立了通信关系。共同利益导致古巴被纳入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的福传领域。这一行动为美南浸信会带来了极大的热情；这与古巴人代表他们杰出的年轻同胞的热情不相上下。蒂奇诺

秘书利用整个南方对古巴宣道使命的普遍兴趣，在哈瓦那购买了一座大型剧院大楼，耗资七万五千元，将其改建为教堂。除了这种福传兴趣之外，浸信会宣道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和一所妇女医院。在 1895 年叛乱又爆发之前，在古巴的宣道使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1896 年 4 月，迪亚兹被捕；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导致在整个美国南方、乃至整个美国举行的示威游行，他无疑会被立即处决。

国内宣教委员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需要在南方城市设立宣教站。这在新奥尔良受到显著重视。在这里，它在普遍存在的困难中稳步促进工作，并在维持该市三个浸信会据点——Coliseum Place、First 和 Valence Street Churches 的永久礼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南浸信会总会的指导下，委员会多年来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内福音禾场》的机关报，该机关报于 1895 年与《外国宣教杂志》合并；但在 1896 年，美南浸信会大会再次分离了两个委员会（国内委员会与外国委员会）的新闻事业，并让他们自行决定其各自未来期刊机构的采用。结果是外国委员会重新建立了《外国传教杂志》，而国内委员会则提议采用美南浸信会总会教派报纸的专栏作为其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媒介。在 1845 年开始其特殊工作时，由于中国和非洲的某些传教士与南方浸信会保持的特殊关系，外国宣道委员会找到了一个已经开放的领域，从而减轻了很多尴尬。JL Shuck 先生和 IJ Roberts 先生，作为他们个人的选择，从北方浸信会委员会转调到南方浸信会大会的外国委员会。

本书前文已经提到，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在南方试图取得支持时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它（外国宣道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国内宣道委员会所作出的鼓动工作。在其历史的前 18 年中，外国宣道委员会派出了 22 名传教士，即：Messrs. Clopton, James, Gaillard, Holmes, Bond, Roberts, Tobey, Whilden, Johnson, Shuck, Percy, Cabaniss, Burton, Yates, Crawford, Schielding, Hartwell, and Graves,

with Mrs. Shuck, Mrs. Graves, 詹姆斯夫人、威尔登夫人、邦德夫人和贝
克小姐。在那段时间里，有五个人死在福音禾场上，分别是克洛普顿先生、
詹姆斯先生、盖拉德先生、福尔摩斯先生和邦德先生。Whilden 夫人、Shuck
夫人、James 夫人和 Bond 夫人也去世了；Roberts 先生也从委员会退休。
八人后来永久返回美国，即托比先生、威尔登先生、约翰逊先生、舒克先生、
皮尔西先生、卡巴尼斯先生、Burton 和 Baker 小姐。赴中国传道使团本应
在 1861 年由另外三个人增援，但南北战争的爆发干扰了他们的航行。在此
期间，有十二名传教士留在禾场上：耶茨先生、克劳福德先生、席林先生、
哈特威尔先生和格雷夫斯先生，以及他们的妻子，以及盖拉德夫人和霍姆斯
夫人。与此同时，这些传道人在禾场当地有几名本土基督徒助手在劳动、辅
助他们。

国外宣道委员会的初始福音站点是广州、上海，后增设天津、通州。除了传
福音之外，传教士还参与了学校的建立和管理、教堂的建造以及文学作品的
分发。传道人们经常进入帝国内部，在那里向成千上万的人传播福音。该委
员会在中国运作的头十八年里，已经接受了一百多名皈依者；传教士的忠心
工作虽然被认为是有前途的，但不是有立竿见影的结果。

从 1849 年到 1863 年，有 16 名传教士被任命差派到非洲的约鲁巴。1849 年，
传教士 JF Bowen 在非洲创立了这个最初的传道使命事工，并为未来的运作
开辟了道路。委员会在非洲地区最早任命的传道成员之一是传教士哈登（他
是拉各斯一位虔诚的有色人种传教士），古德尔先生和登莫尔先生，以及登
莫尔夫人、里德夫人和菲利普斯夫人；他们死于非洲的宣教工场。在刚刚提
到的十六名传道人中，有两人因故未能乘船前往。这减少了哈登和斯通先生
及其妻子、以及里德和菲利普斯先生的非洲传道团的力量。传教站已在拉各
斯、阿贝奥库塔、伊贾耶、奥格博米肖和奥约建立。到 1863 年，在非洲地
区传教的传教士使得大约 50 人归信。同时，在巴西也建立了一个传教站点；

BOWEN被差派到那个新领域传道，但后来健康状况不佳迫使他放弃了事工。六十年代初期，为在日本设立一个传道使团作出了安排，CH Toy、Johnson 和 Rhorer 先生被任命、差派到那个新领域，但是南北战争干扰了前两个人的航行，第三个人则死了在海上；然而该传道使命事工直到 1889 年才被放弃。

利比里亚传道团的成果最为丰硕。这是美南浸信会国外宣道委员会最早的冒险活动之一，几乎完全由有色人种传教士进行，尽管委员会已委托两位白人传教士鲍尔先生和金登先生作为该传教工作的特别助理。金登先生很快就为这项事业殉道，因为非洲的气候对他的体质来说过于严酷。

直至 1863 年，美南浸信会国外宣道委员会已在国外建立了 24 个传道站，并聘用了 20 名牧师和 26 名教师。在国外各地，一千二百名当地教会成员已加入到新建立起来的教会；七百名当地学生已进入新建立起来的学校。这标志着国外宣道委员会完成的第一项工作，代表了直到（因南北战争）南部港口关闭以及随之而来的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为止的时期。对美南浸信会国外宣道委员会来说，这是一段黑暗和困惑的时期；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两个遥远的大陆上（非洲和亚洲）工作，无法沟通。在中国，传教士们不仅因美国内部战争而与祖国的交通中断而感到困惑，而且还为一场当时盛行的中国战争所困扰。忠诚的传教士之一克劳福德先生怀着特有的勇气写道：“战争与否，使命必须继续。尽管中美发生战争，我们仍能生存。”马里兰州和肯塔基州的浸信会利用他们的职位，不时地向中国传道部的成员汇款。凭借这种帮助、以及在中国的浸信会传教士得以采取的权宜之计，他们度过了多年冲突所涵盖的时期。在此艰难时期，美南浸信会传教士遇到的最可怕的敌人是亚洲霍乱，这极大地加剧了传教士遭受的两次战争所带来的困难。那是中国传教士的惨淡时期——当地教会会众四散、学校倒塌、小教堂被烧毁，最忠诚的传教士之一 JL Holmes 在禾场附近被谋杀。

随着和平的恢复，外国宣道委员会的传教活动扩大了。经过深思熟虑，委员会决定于 1870 年在意大利设立一个传道部。WN Cote 博士是一名原罗马天主教神父的儿子，他是前往意大利的传教士的先驱。在那里传教的第一年，他成功地使十二名皈依者施洗，并在接近年底时准备在罗马组织一个有十八名教会成员的浸信会教堂。1871 年 1 月，约翰·A·布罗德斯（John A. Broadus）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巡回演讲，并参与了最初教会的组织工作，他在罗马写信说：“传道使命——我应该强烈反对任何放弃它的想法。” 1873 年，弗吉尼亚的 B. 泰勒（B. Taylor）博士被任命为意大利传道部的负责人。1878 年，他耗资 2.7 万美元在罗马成功地开设了一座漂亮的浸信会教堂，从那时起便在该市定期举行教会礼拜。1880 年 11 月，密西西比州的 JH Eager 牧师被派去增援泰勒博士。

1848 年之前，除了韦尔多山谷地区外，整个意大利没有人是公开的福音派基督徒。从 1848 年到 1859 年，福音只在皮埃蒙特传扬。直到 1870 年，没有一个罗马人敢宣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也没有外国新教徒可以在罗马城墙内进行礼拜。现在，到 1887 年，有八千七百八十一名浸信会教会成员，一千二百二十二名慕道者，四千七百五十八名主日学学生，一百九十二名牧师传道人、两百五十六个教堂和福音站、五个孤儿院，和九份宗教报纸，每月或每周出版发行一次。H. Eager 博士于 1889 年来到美国为在意大利建造浸信会教堂筹集资金，他写道：“哦，为了在复活节那天花在纽约市教堂的十万美元！（可以在意大利建造多少浸信会教堂！）”

1860 年，由于传教士 Bowen 的健康原因，巴西传教事工被放弃；直到 1879 年 EH Quillian 被任命为圣巴巴拉的传教士后，才再次在巴西进行传教。1881 年，WB Bagby 和妻子的来到加强了巴西传道使命，次年 ZC Taylor 和妻子也来到巴西、加入宣教队伍。这些传教士都是来自德克萨斯州。他们的传道事工相当成功。

外国宣道委员会下属最富有成效和进步的工作部门是墨西哥传道部。美南浸信会传教士进入并占领该共和国福音禾场的道路是由一群德克萨斯人迁移到墨西哥而开辟的。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组建了教堂，并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一些墨西哥人口的加入。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 Westrup 兄弟，他们之前都曾在科阿韦拉得到德克萨斯浸信会州大会的支持。其中之一，约翰·O·韦斯特鲁普（John O. Westrup）被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野蛮杀害后，他的兄弟接管了整个工作。他向美南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申请帮助，并在 1882 年得到了 WM Flourney 和妻子的加入与支持。同年，得克萨斯州的 WD Powell 和妻子以及 Annie J. Mayberry 小姐被任命差派从事同样的工作，并驻扎在萨尔蒂约。这是向墨西哥进军的开始。按照全面系统的计划，将拟议要传福音的地区划分为传教区，传教士驻扎在一定的福音站点。这样，就建立了从里奥格兰德到太平洋的福音传播线。在 1882 年至 1889 年间，以下传教士与 Señors Cárdenas、Rodriguez、Gomez 和其他当地人一起进入了墨西哥传道事业的领域——Misses Tupper 和 Barton、Wilson 夫妇、McCormick 夫妇、卡巴尼斯小姐、莫斯利夫妇、沃特金斯夫妇、查斯坦夫妇、杜根夫妇。鲍威尔（WD Powell）先生所具有的领导才能使他成为公认的墨西哥传道使团团团长。明智的构想、坚定的目标、勇敢的执行、不可抗拒的能量、温和的性格和虔诚的心——鲍威尔结合了墨西哥这样一个地区伟大传教士领袖的所有要素。从一开始，他在这个新传道使命领域的生涯就以最显著的成功而著称。他能够很容易地应对在这样一个地区和这样一个民族中必然出现的紧急情况。无论是在下层的墨西哥人的土坯房里，还是在偏远的牧场上，在拥挤的集市里，在疯狂的暴徒面前，在国家最高官员面前，或者在最有教养的人群中——他同样是局势的主人。他以虔诚的热情，以神奇的力量动摇了墨西哥人的思想。他在 1889 年写下他的书作时说：

“我们已将工作从得克萨斯州边界带到太平洋沿岸。反对声正在减弱。我几乎普遍受到热烈欢迎。政府给予我们充分的保护。墨西哥市和整个共和国的

主要日报揭露罗马天主教，并捍卫我们的事业。在过去的两年里，天主教神职人员迅速失去了阵地。我们所有的教会和宣教站都报告了进步和繁荣。我们的福音工人力量不足以占领已经向我们开放的领土。我们有 18 名美国福音工人和 15 名本地福音工人。有十八个有组织的教会和大约六百名成员。这确实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奇妙的。……我们所有的福音中心站都建立在战略要地。”

美南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的事业团体中最年轻的是日本传道使团。它于 1889 年由传教士 McCollum 和布伦森 (Brunson) 以及他们的妻子承担。布伦森先生退休后，沃尔恩先生和梅纳德先生以及他们的妻子所获的任命差派加强了传道使命。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还处于准备阶段，但进展非常令人鼓舞。

美南浸信会做出的其他努力包括在 1851 年成立了圣经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巡回传道服务。在此之前，一些州，特别是阿拉巴马州和弗吉尼亚州，已经做出努力来建立和维持当地的圣经委员会，但他们都失败了。1851 年的这项更大、更全面的事业也没有成功。一个宗派的出版工作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危险。经过十二年的挣扎，美南浸信会圣经委员会解散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交通设施的增加，（以北方为基地的）美国圣经公会在整个南方建立了它的辅助机构和书籍运输系统。

美南浸信会出版协会与美南浸信会大会从未有过有机联系，而是一家私营企业。它从来没有成功过。随着（以北方为基地的）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开始满足南方对宗派文学的需求，另一个（美南浸信会出版协会）逐渐退却并最终完全消失。1863 年，美南浸信会的主日学委员会诞生了。它同样灭亡了，它的寿命大约是十年。在 1891 年的美南浸信会会议上，这种悬而未决的（关于建立主日学委员会的）兴趣重新燃起。这是主日学文学问题所激起的结果；

该会议（美南浸信会会议）决定组织自己的委员会出版主日学教材。美南浸信会会议批准了这件事，但明确采用了保守的附带条件：“每个人都应享有最充分的选择自由，以选择他将使用或支持的主日学文学作品，并且任何兄弟都不得因其在行使他作为属基督的自由人的权利而受到歧视。”重振主日学委员会的决议的作者 JM Frost 博士成为该委员会第一任秘书，但在一年后退休；当时外国宣道委员会助理秘书 贝尔（TP Bell）博士被选为该委员会（主日学董事会）秘书和财务主管。贝尔博士于 1895 年下半年退休，负责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基督教索引》期刊；主日学委员会秘书由弗罗斯特博士继任；弗罗斯特博士于是再次受命负责管理委员会的事务。

主日学委员会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在它的主持下发行了《教师》、不同年级主日学的季刊、传单和卡片，以及《青年领袖》。截至 1896 年 5 月，主日学校董事会的收入为 62841 美元 12 美分。所募集到的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如下：给外国宣道委员会 2170 - 5 美元 93 美分；给国内宣道委员会 2139 美元 21 美分；给主日学宣教工作 3887 美元 50 美分。

第十章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

正如本书前文已经被表明的，南方宗派建设者主要关心的其中的一个事项是，为更开明和更合格的牧职事工铺平道路（即建立系统化的牧职培训机制）。这个主题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引起了南方各州浸信会牧职事工中最进步的人的注意。在本世纪初（十九世纪初），两个迫切的考虑因素强调了一个更智慧的牧职事工的重要性——（1）群众的属神智慧不断增长，以及（2）其他

教派的牧职事工在知识上的稳步进步。在这个早期阶段，事工计划是为满足现有需求而设计的，但它们必然是粗糙的，如前一章所示。出于这种拥有更有能力的牧职事工的愿望，我们所有的青年男子浸信会宗派神学院都发展起来了。

事实上，这个想法是我们浸信会教派进步的一个主要萌芽，因为它与我们在所有州的一般教派组织创始人心目中的使命并没有分离（即，在南方各州内部的浸信会创始人们的心中，也都期望建立浸信会牧职培训事工）。当浸信会教派正在为此做好准备时，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遥远地方的事件，对提高其（牧职培训事工）重要性做出了最实质性的贡献。此时，Adoniram Judson 和赖斯（Luther Rice）在印度决定，有必要让一个人（赖斯）返回美国，并组织资金支持另一个可能留在国外的人（JUDSON）。赖斯的回归，在他的脑海中蕴含着知识进步和教派扩张的相关思想，这对于促进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引起该教派最先进分子关注的珍视目标来说，这是最合适的时机。美国南方的每一所浸信会学院都扎根于这些早期的计划和努力。最初是建立在更好地准备牧职事工的想法之上，——但是，最早的浸信会学校很快被迫响应另一个普遍的群众需求，即为那些希望从事牧职以外其他职业的人提供教育渠道。这导致了下一阶段的发展，即提供与纯文学课程相关的神学系（即，神学院课程设置中，既包括神学课程、用于培训未来牧师传道人，也包括普通文学课程、用于培训未来想要从事其他职业的年轻人）。——这为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的神学课程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支持。虽然它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变得不尽如人意。浸信会牧职候选人为寻求更全面的奖学金而开始去北方院校申请入学，例如去牛顿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和普林斯顿学院，寻求那里所提供的高级教学。在前往北方去寻求这些更好教育设施的南方浸信会人士中，有 JP Boyce、JWM Williams、SC Clopton、HA Tupper, Sr.、ET Winkler 和 Basil Manly, Jr. 他们看到，一个专门的神学院，要比一个文学教育机构附属下的神学课系更有优势；这使他们期望也建立南方

的、专门的神学院，并成为这样神学院的热心拥护者。他们在 JB Jeter、WB Johnson 和 RBC Howell 等人中找到了现成的合作者。

长期以来对神学教育一般主题的关注，以及为弥补教派中这方面普遍存在的缺陷所做的努力，使人们深信，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神学院机构来培训南方浸信会教徒与牧职。因此，在美南浸信会组织之后，最早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南方神学院的可能性。1845 年，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为拟议教育机构的问题召开了一次由几个州的浸信会代表组成的会议。两年后，即 1847 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的印度宣教协会会议上，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供考虑。两年后，在南卡莱罗纳州召开的浸信会大会之前，约翰逊（WB JOHNSON）博士试图邀请浸信会代表专门开会讨论建立神学院的问题；并以弗曼神学院作为这个努力事业的核心；但努力失败了。其他机构后来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其中包括佐治亚州的美世大学，但没有成功。这个问题逐渐成为普遍讨论的主题之一，并最终导致 Drs RBC Howell 和莱兰（Robert Ryland）之间在浸信会教派论文中的讨论。莱兰博士反对建立这样一个神学教育机构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需要十万美元的捐赠，而这笔钱是筹集不到的。

1849 年美南浸信会大会在查尔斯顿召开时，该机构的主席 WB 约翰逊博士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博学而详尽的演讲，提出了神学院的主张。他得到了 Basil Manly, Jr. 的支持。但仍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1854 年，弗吉尼亚浸信会总协会提议，在那一年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举行的美南浸信会大会上，“神学教育之友”考虑建立神学院的主张。据了解，这是由 Dr. JB Jeter 发起的，他许多年来一直是建立神学院的热心倡导者。在蒙哥马利，AM Poindexter 博士提出了决议，并一致通过，大意是“这次会议的意见是要求：为了真理的利益，南部和西南部的浸信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高等级的神学教育机构。”为此，仅为拟议的建立神学院的事宜而实际

批准了，将召开另一次会议，该会议将于次年 4 月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举行。来自九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浸信会代表参加了次年的这个会议。一个由 Basil Manly, Sr. 博士担任主席的庞大而干练的专门委员会报告说，“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发现该主题（建立神学院）在每一点上都因困难而尴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可能克服那些困难。”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令许多打算建立神学院的人感到满意。

另一次会议仍被指定在一年后举行，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审议此事，同意在美南浸信会大会召开前两天举行会议。为了给实际行动铺平道路，一个由 B. Manly, Sr.、AM Poindexter 和 JB Jeter 组成的委员会受命向在路易斯维尔举行的上述美南浸信会大会会议报告：——

1. 在南部和西南部各州的每个浸信会机构中，受浸信会掌控的、可能用于神学教育的资金有哪些；这些资金的掌控者是否愿意把这些资金（多少资金数量、什么捐赠物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等等）捐献于美南浸信会共同的神学教育事业？如果 1857 年在路易斯维尔召开的浸信会大会裁定，在南方某个州建立神学院，那么，那些不在该州的南方、西南方其他各州浸信会是否愿意为之捐赠？

除此之外，该委员会被授权、并被要求，

2. 使用适当的方法来确定，大家愿为支持在何地点建立神学院（无论是否已被使用）而做出哪些努力，以及如果选择该地点作为神学院核心，大家将提供哪些金钱捐助或认捐这个共同神学教育机构。所有这些调查的目的都是以尽可能充分的方式确定，是否存在建立共同神学教育机构的需求，因为它可能成为未来联合行动的基础和鼓励。

如此提出的计划是詹姆斯·P·博伊斯（James P. Boyce）的头脑的产物。直到此时，人们一直希望与整个南方的浸信会机构相关的神学教学部门可以合并为现在所设想的这样一个机构。但现在这个想法被完全放弃了（即，本来，美南浸信会一直认为，在南方建立一个统一的、核心的神学院；但现在大家认识到，这个想法不可行；而是，将要可能在南方多个地点建立神学院）。

1856年7月，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在格林维尔召开；在该会上，弗曼大学神学系的詹姆斯·P·博伊斯教授促使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的教育大会上提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建立一个共同的神学机构，并提议将资金转交给拟议的教育机构，金额约为三万美元，然后由董事会持有用于神学教学。

有人提议在这一数额中应当再增加一笔款项，使南卡罗来纳州筹集的总额达到十万美元，这样就可以从南方其他州获得额外的十万美元（即，如果南卡罗来纳州本身能够募集十万美元资金，那么，南方所有其他州就能够再捐献十万美元，从而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共同神学院）。

这件事现在开始具有实际意义，然而，整个问题都取决于是否有可能在九个月内南卡罗来纳州筹集到额外七万美元。

1857年5月，美南浸信会大会之前的教育大会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来自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88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大会的提议引起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因为博伊斯教授和其他人向代表们保证，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提出的提议将得到完全遵守。随着希望创办神学院的兴趣加深，神学教育的前途变得更明亮了。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詹姆斯·P·博伊斯的执行能力和领导技巧第一次变得引人

注目。次年，他制定了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建立神学院的计划，条件是在 1858 年 5 月 1 日之前在该州筹集到十万美元，准备交由浸信会董事会处理。这笔款项产生的利息 7000 美元，将用于资助三位教授，购买书籍（每年不超过 500 美元），并支付给其他州的适当募款人、以筹集额外的十万美元；此外，还可以在格林维尔免费租用朗诵室和演讲室数年。

最后的安排还决定，如果三年内不能筹集到（来自南卡莱罗纳州以外的所有南方各州的）额外的十万美元，那么南卡罗来纳州提供的款项将归还给弗曼学院，用于神学目的，以及归还给其他地方收集的捐款、以他们各自的捐助者。

这样一个计划的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一点上都有制衡、大胆的灵感和谨慎的保护。1858 年 5 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举行了一次特别教育会议，以完善已经制订的计划，前提是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会议应接受这些条件。与此同时，任命了委员会来准备一项计划，组织、提名教员，从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获得特许状，为南方各州提供游说，并向美南浸信会发表演讲。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组织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南卡莱罗纳浸信会会议的可敬主席 Basil Manly, Sr. 博士（他后来被选为神学院的主席）任命，即 James P. Boyce , John A. Broadus, Basil Manly, Jr., ET Winkler 和 William Williams。

准备对整个美南浸信会大会的演讲的任务落在了杰特博士身上。以他一贯的活力风格，他生动地阐明为什么需要像神学院这样的机构，而美南浸信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建立这样的机构。他进一步表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建立神学院是恰当的，因为那里交通便利、环境健康且生活成本低廉。在介绍组织计划时，他坚持认为神学院应当摆脱旧制度和既定先例强加的束缚，并以所有的知识、经验和观察来指导我们；建议建立一个适合我们浸信会教

派的恩赐才能、需要和环境的神学院教育机构，在这个机构中，特别注意教导解释圣经的真正原则、讲道的艺术、基督的福音。

得到保证，浸信会宗派学院的现行制度不会受到干扰，但会受到拟议的神学院的鼓励。

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在路易斯维尔会议之后于 7 月举行，该会议催生了神学院。向南卡罗来纳浸信会提出的筹集七万美元的建议被接受，詹姆斯·P·博伊斯被指定为筹集这笔款项的代理人。他将乘坐两匹马驾着的车走遍南卡罗来纳州，以完成募款的任务。虽然任务艰巨，但他还是乐于接受。8 月，Messrs. Boyce、Broadus 和 Manly 在里士满的家中会面，安排每位神学教授签署的教义原则摘要，以设计有关校董会和教授的法律和实践安排，并为神学院准备教学计划大纲。

这一年过去了，浸信会为建立神学院而举行的最后一次教育大会于 1858 年 5 月 1 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举行。讨论了为神学院提出的计划，并花了五天时间研究如何保持始终一致的情绪和行动。在仔细审查了每一点之后，全体参会人员是如此和谐，以至于每一个提议都被一致投票通过。Boyce 博士现在建议任命四位神学教授，而不是原来的三位教授的计划。在轮廓计划和执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出自 James P. 博伊斯的积极指导。他筹集了几乎全部的七万美元。通过他的疏导工作，浸信会在格林维尔的一个教堂建筑（在他们进入另一个地方的漂亮大厦之前）被采购、用于神学院。这座建筑多年来提供了宝贵的教育服务，为演讲室和图书馆提供了空间。博伊斯博士的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反对在获得足够的教学资金之前，在建造建筑物上消耗资金的想法。虽然经常有偏离这个目的的诱惑，但博伊斯博士坚定地坚持了这一点；以后三十五年的事情的局面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智慧。时任 Limestone (SC) 女性学院院长 Thomas Curtis 博士对博伊斯

(Boyce) 博士的这种做法和观点明显表达认可，他用洪亮声音说：“教育学习机构的必要条件是三个——砖头、书籍、大脑。我们的弟兄们通常从错误的优先级开始；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砖头上，没有什么钱可以买书；他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动脑筋，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的另一端开始”（即优先注重头脑、其次是书籍、其次是房屋砖头）。

这种说法一时间很出名，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根据修改后的计划，神学院组委会选出了四位教授——JP Boyce、JA Broadus、B. Manly, Jr. 和 ET Winkler。但其中两个，Broadus 和 Winkler，拒绝了聘请。这连同其他原因导致神学院的开学时间又推迟了一年。1859 年 5 月，美南浸信会就神学院董事会事宜在里士满召开会议。Broadus 和 Winkler 两位博士再次被推选为神学院的主席，但 Winkler 博士再次拒绝；于是威廉姆斯博士被选中，并于 1859 年秋天开始了第一课。建立神学院运动的领导人，除了上述人之外，还有 JL Burrows、JB Taylor、GW Samson、R. Furman、JWM Williams、JOB Dargan、JH De Votie、DP Bestor、JM Pendleton、SL Helm、JL Dagg、和塞缪尔·亨德森。这些人代表了整个南方浸信会教派的有影响力的元素。从一开始，神学院的教学系统就建基于是选修课，并且足够灵活，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任何可能希望参加该课程计划的学生的能力进行调整。第一届学生有二十六名预科生；课程顺利开场。其中，10 人来自弗吉尼亚州，9 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3 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2 人来自阿拉巴马州，1 人来自佛罗里达州，1 人来自密苏里州。“这是一个比美国任何教派的神学院都大得多的开端。它在头两年就享有盛誉。”通过上述强大因素的综合影响，共有额外的十万美元捐款从南方其他州获得。这一点（捐款充足），连同神学院首届学生的成功，确保了它的永久性。在第二届年级学生课程结束前，内战（南北战争）开始，从 1862 年到 1865 年，神学院的工作不得不暂停。教授们被要求在南北敌对行动结束之前与该学院保持联系，以防止神学院解

散。与此同时，他们的工资继续发放，并以邦联的货币支付，然而，他们有特权从事他们认为明智的其他活动，同时他们应该与该教育机构保持官方联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联系。由于这一特权，教员们分散到不同的方向，博伊斯博士成为一个邦联团的牧师，后来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的成员。Manly 和 Williams 博士在格林维尔附近的地区找到了一份乡村牧师的部分工作，而 Broadus 博士将他的时间分配在乡村牧师、李将军军队（南方军队）的传教工作、以及当时位于格林维尔的主日学校董事会的相应秘书职位上。

在南方同盟军投降后的那个夏天，神学院的教员们在格林维尔开会，考虑在 1865 年秋天恢复开学工作的可行性。由于战争，校董会管理的捐赠基金几乎被完全摧毁，剩下的只有 5000 美元价值的投资于佐治亚铁路公司的债券；这些债券可以以接近面值的价格出售。为了在秋季开办神学院课程，博伊斯博士慷慨地捐出一千美元用于神学院的可用资源，尽管他自己的私人事务因战争而变得严重紊乱，国家的商业前景也相当黯淡。幸运的是，神学院没有欠债——博伊斯博士的睿智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1865 年，神学院方面开始了为生存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南北战争结束后，开学的第一学年，只有七名学生入学。

但是神学院的教授们坚守岗位。其中一位说：“神学院可能会死，但那一定是我们先死。”教员们充分意识到等待着他们的、艰巨和自我牺牲的工作，高兴地继续管理神学院的学生事务。他们没有因为学生人数减少而降低兴趣，也没有丝毫对教学漠不关心。

布罗德斯教授在战后的第一门课上给只有一个学生的课堂讲授了一整套讲道学课程；那个学生是一个盲人。虽然学生人数逐年缓慢增加，但国家的低迷状况导致了神学院面临着不断的失败。资金极其匮乏，进步的精神似乎已经

离开了南方。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格林维尔临时住所中这些勇敢而有天赋的人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将狼拒之门外。有一次，教师工资的支付延迟了整整一年，最糟糕的是无法保证它们是否会得到支付。一些教授会骑马穿越全州相当远的距离为乡村教堂服务，并且不得不经常从那些乡村地区为他们的家人带回食物（这是乡村教堂给他们的捐献和服务的薪资）。在战争年代学到的严格节约的教训在这个时候最有价值。而此时神学院里面在读的神学生们也显得极为宝贵。在这种情况下，神学院的朋友并不缺乏。偶尔，由于一些慷慨的人士的捐款贡献，神学院紧张的条件得到了缓解。对于博伊斯博士的频繁募捐呼吁，有时会得到回应，但更多时候不会。然而，从来不缺少一些捐款者，将他们辛苦赚来的金钱捐给神学院。大约在 1870 年，北方一些慷慨的浸信会教徒开始提供一些援助。这笔钱最初是用来支付一些神学生的个人开支，而后来被用于学校的日常开支。一旦国家经济的情况证明可行，博伊斯博士就在美南浸信会会议上开始组织一般认捐、每年支付一定数额、为期五年，以满足神学院经常性开支。

该募捐行动在美南浸信会大会的两届会议上进行，其结果是令人钦佩地帮助神学院度过了困难的困境。但很明显，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很快，两件事中的一件变得很有必要——要不完全放弃神学院、承认不可能在整整一代人中复兴它，要不加大捐助它的金额。如果是前者，神学院必须被移除。捐赠募款的想法表明，当前的基础工作与神学院刚成立时一样必要。很明显，为了获取捐赠，神学院必须转移到某个愿意捐助至少一半所需基金的州。在南卡罗来纳州当时所处的可悲经济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拟议目标所需的募款金额。在讨论神学院搬迁问题时，不同州的几个城市竞相提出愿意以本城市作为神学院的搬迁目的地。最终决定将其移至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南卡罗来纳州的神学院事业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被放弃。所有的神学院教员都将要与他们以前的环境断绝联系，因而心情悲痛。博伊斯博士尤其如此，他一直献身于自己的家乡州，而现在身体虚弱。

1887年，神学院在西部的新地址开门办学。入学人数从一开始就增加了。这种情况每年都在稳步持续。渐渐地，肯塔基浸信会的大部分人开始欣赏神学院在他们中间的位置，并且个人认捐的总数达到了总共30万美元；这占了神学院为了维持日常运作所需要的5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

但是，肯塔基州和其他地方的浸信会教派作出的许多认捐未能募集到位，而且由于搬迁到大城市而大大增加了开支，随之而来的是资金短缺。真的，在到达路易斯维尔之后的几年里，神学院似乎可能全部崩溃。就在这个时候，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E·布朗（Joseph E. Brown）捐助了五万美元。对于神学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激励的事件。乔治·W·诺顿（George W. Norton）先生是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主要商人之一，他是下一个采取捐款行动的人；他采取的方式是确保收到赠款：如果将这些礼物加到手头已有的赠款上，就会产生维持学校所需的的增长。诺顿（Norton）先生和他的兄弟 WF Norton 已经为神学院慷慨捐助了许多金额，但他现在的计划是通过捐赠以确保获得20万美元的投资资金。为了赢得商界人士的信任，同时确保为神学院提供任何赠款以防万一，诺顿先生提议对神学院章程进行修改，要求1880年2月1日以后作出的所有捐助款的本金都永远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该款项用于投资的收入才能支出（而本金必须保持不动，否则）——如果本金的任何部分用于支出，则应全部归还给原始捐赠者。为了给这项措施以最大可能的实际力量，进一步建议，每年选举一个由路易斯维尔的五名商人组成的神学院财务委员会，负责投资本金，持有证券，并把投资收入用于支付神学院财库。目的是保护所捐赠的投资本金免受任何入侵，——无论有多么紧急或多么严重的需要，神学院都不得动用该本金。肯塔基州立法机关批准了神学院章程修正版。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后，诺顿兄弟现在提议二人各自慷慨地捐出一笔钱，以确保获得神学院获得二十万美元捐赠本金。

从此，神学院焕发了新的活力。一场轰轰烈烈的拉票募款活动随即展开。Broadus 博士去了北方，获得了大约四万美元捐赠；两年之内，就募集了二十万美元进行投资，从而神学院得以保全。到目前为止，学校一直位于路易斯维尔的租用建筑物中，因为这里采用了与格林维尔神学院免遭衰亡的相同的政策，即，在获得永久性捐赠之前不得进行房屋建设。有一段时间，学生们住在中等规模的旅馆里，讲座在图书馆大厅的三楼和四楼进行，这些空间都是为神学院教学目的租用的。酒店和图书馆大厅的两层楼为神学院租用，为期数年。

1884 年，博伊斯博士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捐赠，开始制定学校房屋建设计划。校董事会任命了一个由 15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选择地点；董事会中包括路易斯维尔神学院的教职员工和一些商人。关于神学院的选址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争辩应在郊区的位置，在那里物业财产会逐渐增加，有更多的价值。其他人则希望位于市中心位置，这将使神学院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和受人尊敬的地位，并经常受到其朋友和支持者的关注；此外，它还能让学生们享受到城市社交生活中最好的一切，并使他们能够轻松到达路易斯维尔的教堂、主日学校和演讲厅。市中心位置还将使学生更容易到达他们可能希望在星期日讲道的周围地区，因为这同样有助于使他们能够在星期一迅速恢复学习工作。在博伊斯校长在该市找到可以以合理价格购买的房产之前，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他安静地征得了校委员会的同意，准备购买市里一处很划算的房产；这是一个很明智的投资；选址困难一下子解决了；神学院的位置问题现在已经清楚。这个选择的地点受到商界人士的赞誉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绅士自愿出资捐献，帮助神学院购买了该物业。

神学院选址只是博伊斯校长新斗争的开始，他现在不得不筹集五万美元来支付所要购买的土地。他应该在哪里寻找金额？路易斯维尔似乎已经耗尽了对神学院的慷慨。众教会已经厌倦了募捐的呼吁和诉求。目前的神学院日常开

支仍需支付。局面再次陷入停顿。在这种压力下，即使是伟大的博伊斯的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他至少需要两万美元来支付购买这笔财产，但看不到任何资金。博伊斯博士呼吁 WF Norton 先生以 2500 美元开始认捐；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

“获得如此赠款的目标，的确是一件很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但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得到它。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学院建筑的希望可能会得到合理的满足。没有它，我相信我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建筑建成的那一天。我真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看到神学院设备齐全并投入使用。我为此付出了我的一生；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我愿意以此度过余生。但我的心常常在需要克服的困难中沉沦。我对事业的信心破灭了。我开始觉得我必须让其他人来完成它的工作。哦，但愿我能以充足的禀赋让我的弟兄们看到它永远存在的可能性！我知道它可以完成目前工作量的十倍。”

此时此刻，博伊斯博士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已经到了为所欲购地块签发所有权的时候了，应付的两万美元首付款项是必不可少的。

捐款有时来自无法推测的来源。爱德华·贾德森 (Edward Judson) 博士大约在这段时间访问了路易斯维尔，这引起了他对该神学院的兴趣。回到纽约后，他成为唤醒约翰·D. 洛克菲勒先生兴趣的间接渠道。洛克菲勒先生后来进行了大额捐款。JA Bostwick 先生对于该神学院的同情也因访问路易斯维尔而更加强烈。随后 Broadus 博士也访问了纽约，并在那里获得了慷慨的捐赠——主要取决于路易斯维尔当地的慷慨程度（即，来自纽约的捐赠金额，将以路易斯维尔当地的捐赠金额为比例）。此时，尽管博伊斯博士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还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满足所指定的条件。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他的热情也没有受到抑制；他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工作。最终筹到款，六万美元在纽约变现；佐治亚州的布朗参议员再次出手相救，寄出他的支票，为计划中的建筑多支付五千美元，使得纽约赠款得到保证。

1885 年，共向神学院捐赠了两项遗产，大大增加了它的资源。肯塔基州麦迪逊县的 DA Chenault 先生遗赠一万五千美元，其利息将用于资助有需要的神学生就读。

路易斯维尔的 WF Norton 为同样的目的捐助了一万美元。1888 年 12 月 28 日，博伊斯医生在法国波城去世，他曾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治疗、从痛风中得到缓解（他曾是痛风的重病患者）。整个南方各州都为他的逝世深感悲痛。他的职业生涯非凡、充满活力、有用性和荣誉；具有最高品质的智力；具有勇气和崇高的精神，惊人的对细节的掌握，快速的理解和准确的判断，在最危险的紧急情况下从不屈服的、不屈不挠的坚定态度；迅速、准时和从不失败的毅力；无与伦比的精力、惊人的工作能力和沉着冷静的性格；——使他成为同胞中的王子；——詹姆斯·博伊斯（James P. Boyce）在南方浸信会领袖中名列前茅。

在博伊斯博士身上，那些他可能不如其他人的因素，因着他拥有的很多其他伟大品质而得到了许多倍的补偿；——而博伊斯博士身上的那些伟大品质是许多能力出众的人所梦寐以求的。他的思想和性格品质不仅很多，而且非常优秀。法学、金融、哲学、神学——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卓越的程度。他什么都不吝啬。他各方面都很杰出。

布罗德斯（John A. Broadus）博士接替博伊斯博士成为神学院院长。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顺利进行。从伟大的宗派事业开始，他就与博伊斯博士并肩工作。他的人生最后几年因神学院事业的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他亲眼目睹了它从挣扎的婴儿成长为巨人的身影；因为在 1894 年，已经有 270 名学生在读，由 11 名教师任教。

当时神学院的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估计为二十五万美元，捐赠基金已增长到四十七万五千美元，图书馆价值五万美元，藏书两万册。学院总估价值七十七万五千美元。

1895年3月16日，布罗德斯博士去世。1895年5月，在美南浸信会成立50周年之际，他的神学院院长的继任者，惠特西特博士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南浸信会大会上、所发表的历史性演讲中这样评价布罗德斯博士：

“今年我们的禧年，充满了光明和欢乐，却因他的离去而黯然失色。三月十七日，虔诚的人们将他抬到墓地，并为他哀悼。我们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伟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名声和作用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当坐在这里的你们成为年老体弱的男人和女人时，你们的孙辈孩子们会怀着崇敬和喜悦聚集在你们的膝前，尊敬地看着你——曾经与约翰·A·布罗德斯（John A. Broadus）同时代、并亲眼见过他、亲耳听过他、且和他说过话的人。”

1875年5月，惠特西特（WH Whitsitt）教授，DD, LL. D.，由浸信会董事会选举为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他执政的第一学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入学人数达318名学生，其中的学生来自美国二十八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印度领地，还有来自中国、英国、新斯科舍、和波斯的各一名神学生，另外还有四个学生来自加拿大。

第十一章

主日学工作

有关南方浸信会的最早的主日学信息很稀缺。它们存在于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年是很容易确定的，但是要找到它们的最早地区与历史痕迹则并不是那么容易。关于南方浸信会的主日学的历史与信息非常有价值和助益；——因为主日学对于基督福音在南方各地的传播、推广、深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在十九世纪初，南方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南方新开垦的各地领域中，他们当地的传教士和牧师争先恐后地争取成为每一个新定居点的第一个福音站；他们互相关注可能用于促进教派发展的任何手段。任何合法的推进福音手段都被双方尝试使用，如果有一种方法使福音事业因此得到促进，那么另一方就也会同样使用该方法。根据弗吉尼亚州汉诺威县卫理公会阿斯伯里主教的建议，1786年组织了一所主日学，这是有记载的。这是我们在南方有记载的第一所具有这种性质的学校。同样，在1790年，一项有利于主日学的决议使得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卫理公会教会会议采用了日间主日学学校。浸信会并没有像其他宗派那样小心翼翼地保存他们的历史记录，只是因为这些记录体现在当地教会的程序册中，因此一般编年史者无法访问；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而不是通过书面证据偶尔瞥见数据。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是主日学兴趣开始兴起的准备时期，它在1840年左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由于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长期斗争，这种兴趣的发展受到教派中消极分子的极大阻碍。然而，不能推断在这漫长的时期内，年轻人没有接受神圣事物的教导。虽然当年只有少数的主日学学校在效率上能与今天的主日学相媲美，但仍有一些组织提供神圣的教导。在人口中心城市，如萨凡纳和查尔斯顿，霍尔科姆牧师和弗曼牧师等浸信会教派代表人物在那里主持神学教育，年轻人定期接受教理问答训练。在担任查尔斯顿牧师期间，理查德弗曼博士每个季度都会召集他负责牧养的年轻人，目的是让他们背诵浸信会要理问答。

尊贵的牧师身着教士长袍，戴着饰带，让年轻人站在一起，轮流向他们提问。

这种学习活动在教会全体听众面前庄严肃穆地进行，朗诵的内容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朗诵者中最关心的部分。如此重视教会青年的教导，使查尔斯顿的浸信会家庭对神圣教导保持了广泛的兴趣。这样的教训从未被遗忘。这是一个彻底灌输教义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教会的青少年成长为坚强的浸信会教徒。今日的主日学文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优越，但在宗派文化方面并不如早期的文学。当时，很少有人愿意简化要理问答的术语或思想以适应青年人的能力。基本教义同样呈现在儿童和成熟神学家的脑海中。与其说这是培养理解力的问题——（可以留给更成熟的人）——不如说这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与基本教义相关的问题，在古老的查尔斯顿第一浸信会教堂中的青少年，就像在书房里深思熟虑的传教士一样，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虽然关于浸信会要理问答的这些考试每季度在浸信会教会中举行一次，——但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会在每周一次的联合主日学中联合起来，进行活动。然而，逐渐地，为了更加方便地开展学习，每个教派都退出了联合学习活动、并建立了自己的主日学学校。

南方第一个定期组织的浸信会主日学是在巴尔的摩浸信会第二教堂。这个组织成立于 1804 年，是在 1795 年从英国移民的牧师希利长老的建议下成立的，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在英国盛行的主日学活动的影响。

我们有任何记录的下一个浸信会主日学是查尔斯顿第一教堂的主日学。似乎在 1816 年之前，几个教派在主日学教学中联合起来，正如上文已经表明的那样。正是在 1816 年，一所与众不同的浸信会主日学在查尔斯顿成立。1819 年，舍伍德（Adiel Sherwood）博士在佐治亚州雅典附近的 Trail Creek 教堂组织了另一个主日学学校。舍伍德博士刚刚离开北方、新英格兰，他无疑在那里享有他现在正在寻求传授给其他人的神学教育优势。

1820年之后，南部不同地区的主日学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南部州中的靠北方的那几个州。通常他们的主日学会持续到冬季，然后他们会暂停直到春天重新开放。同样，它们将成功运行数月，然后逐渐灭绝。在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主日学学校通常以联合组织的方式进行。这些主日学活动所用的教材通常可能从任何来源获得，并且通常包括一些古老的教义问答。

然而，宗派的扩张迫使不同的主日学机构建立不同的组织。主日学学校首先在城市开始，随后逐渐在城镇和郊区教会盛行，最后在乡村地区。在1825年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乡村教堂的主日学。这标志着南方反传教的浸信会教徒开始反对主日学（作为反对传教活动的一部分）的日期，这种反对情绪愈演愈烈，持续到1838年。

在某些情况下，传道人会因为提倡此类主日学机构而被噤声，而在其他情况下，教会成员会因为让他们的孩子去参加这些主日学活动而被赶出教会。当时反对主日学的气氛可以从阿拉巴马州一个反传教的教会的会议记录摘录来判断，记录日期是1825年：——

“Breastwork 教会在信中向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协会请愿，希望后者考虑是否应当拒绝与州浸信会公约、神学院、主日学校、圣经社团、传单社团共融；并且拒绝与所有与这些机构联合的教会共融。”

1824年美国主日学联合会的组织推动了南方较早各州的主日学活动。代理人被任命去游说人口最多的地区，不仅要组织主日学学校，还要募集资金以促进主日学联盟培养的目标，并滋养在其主持下组织的学校。在南方的农村地区，这些代理人起初并没有受到热情接待。主日学被视为一种创新，它们被缓慢而谨慎地采用。主日学联合会的管理者表现出极大的智慧；他们在南方各个较早的州任命了一些宗派领袖来代表其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

在城市教堂之外维持任何程度的永久性主日学机构。

早在 1830 年，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就通过向众教会提交的报告提倡主日学。

早在 1838 年，密西西比州浸信会州大会就发出了这样响亮的声明：

“虽然主日学制度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的优点已被无数的实践所检验。它现在在它的朋友、政治家、慈善家和每个虔诚者那里都受到重视。而且，教会伟大的元首（耶稣基督）特别看重它，这从他给它加冕的巨大成功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浸信会教会委员会以最热烈的同情和最衷心的合作推荐它，因为它对新生的一代有极大的好处，并普遍推进了基督的圣工。我们知道它的朋友们在这个州工作的挫折感。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对其操作有经验；很难获得教材书籍，而且在许多地方，学员数量稀少、似乎无法成功引入教学。但在每一个好的事业中，障碍都会屈服于坚定的毅力。

如果我们环顾一下我们的州，我们无疑会发现，不到六分之一的儿童会在主日定期聆听讲道、参加敬拜；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七天中最无所事事的一天。这里不必说懒惰是恶习之父。但是如果孩子们能被带进主日学校，他们就会受到约束，不至于亵渎主日，而会从事最有价值的思想和道德培养过程。作为对主日学校之友的帮助，我们建议浸信会大会在本州范围内建立一个主日学校材料库的权宜之计，相信它会在今年内帮助产生大量的主日学校；这是确保我们教派普遍认可的书籍更加统一的手段。”

这份令人钦佩的报告实际上是对该主日学系统后来发展的预测，它以对主日学教学系统的高度认可的决议结束，并敦促立即关注全州的浸信会牧师。

这份报告是在密西西比州浸信会州大会第二届年会上提交的。几年后，我们在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州大会上第一次看到了关于主日学的说法。他们于 1844 年首次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表明该州的主日学学校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报告作者感到遗憾的是“缺乏有助于学校的实用性和兴趣的

统计信息。”在结束决议中，该报告指出，“大会对主日学制度的价值印象深刻，恳切建议它引起牧师的立即关注，并敦促他们在可行的情况下尽早在每个教堂建立一所主日学学校。”

1831年，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n）博士被任命为美国主日学联合会在肯塔基州的代理人；尽管学校的成立速度很慢，但这项事业开始引起公众的兴趣。然而，一方面是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造成的干扰，另一方面是一些反传教士的浸信会教会引起的那段时期的骚动，使得肯塔基州的浸信会众教会不愿接受任何新措施。

他们对任何创新、或背离传统做法的新方式的引入都持怀疑态度，无论其取得良好结果的希望有多大。这种极端的谨慎使浸信会宗派对主日学的认可推迟了20年。直到1854年，我们才发现肯塔基总协会对之给予了最轻微的关注。

即使在那时，关注的程度也很小。一份关于这个主题的报告说：“根据我们所能获得的最佳信息，我们认为主日学在我们的教会中不受重视；一小部分教会——可能不到四分之一——有主日学，他们中的许多事工都很弱，几乎无法维持生存。”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兴趣。然而，在1856年，我们发现肯塔基州总会的报告采用了以下内容：

“下定决心，我们建议我们的教会认识到在可行的情况下组织主日学的重要性。

兹此决议，教会的牧师通过向各自的会众介绍主日学的主题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并帮助组织一个健康有效的系统。”

这种兴趣终于被激起，于是对美国主日学联合会的代理人分发的书刊进行了考查。其中教材的非教派性质立即引起了肯塔基浸信会的反对，他们在这个

特殊的关头自然地敏感察觉到那些教材中的、对于浸信会所持有的圣经原则的最轻微的回避。这项调查导致了对主日学联合会教材的淡化浸信会特征的强烈谴责。主日学既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浸信会就决定成立一个名为南方主日学联合会的新组织，该联合会于 1858 年 11 月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成立。虽然其办公室位于孟菲斯，但理事会是在纳什维尔任命。随后的决议来自肯塔基州总会，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控制该州浸信会的情绪：——

“下定决心，虽然我们承认主日学联盟图书库的优点，但总的来说，我们感到它（主日学联合会）在神圣真理的许多方面完全沉默的缺陷，这些真理对基督徒的责任和上帝子民的联合至关重要。

兹此决议，我们赞成向我们所有的图书馆提供完全合乎圣经、并表达所有正确职责的文献的原则，包括教义和教会政体。

兹此决议，我们推荐对于美南浸信会主日学联合会的赞助。”

事态发展的这一新转折在一段时间内加速了美南浸信会教派对主日学这个主题的兴趣。LB Fish 于 1860 年成为孟菲斯组织的总代理，成功地激发了比以前更多的工作热情。这将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领域内事工的不同阶段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直到南北内战爆发。到目前为止，在南方不同地区的主日学工作，还没有统一特征。无论主日学学校在哪里建立，它都会采用自己的方法和课程。独立于统一的系统或合作行动，这些主日学学校每年逐渐成倍增加，直到在南方主日学委员会的主持下建立一个系统。公众偶尔会普遍表达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例如 1853 年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当时南部各州的主日学大会在该市举行。

那次会议最大的成就是为该主日学机构注入了更多活力。然而，这个主题直到 1859 年才引起美南浸信会大会的注意。从一开始，在美南浸信会大会的议事程序中就反复、但偶然地提到了主日学；但直到上述 1859 年度会议之前，它们还没有变得足够突出、以引起教派官方关注。这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

—美南浸信会在此期间一直专注于制定其在国内和国外传教工作的计划，而主日学的事业在构成浸信会公会的各州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1859年的年度报告中，作为国内宣教委员会的秘书，R. 霍尔曼表明，浸信会委员会已经开始组织主日学的工作。他报告，截至那时，共有 14 所主日学学校，有 601 名教师和 5570 名学生。同一份报告提到了以前在南方所做的类似工作，并声称由于这些工作，已有 743 名学生皈依并进入了教会。从那时起，对主日学的兴趣引起了美南浸信会的更多关注。

从美南浸信会大会的最初几年开始，小巴兹尔·曼利就对主日学的事业非常感兴趣。他曾多次努力提请全体教会注意此事，但都没有奏效。最后，在 1863 年，他促成任命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小巴兹尔·曼利、西尔瓦努斯·兰德鲁姆、IT Tichenor、TE Skinner、JL Burrows、CJ Elford、ET Winkler 和 WT Brantley 组成，负责报告为主日学做出更大努力的权宜之计。结果是一份干练而详尽的报告，强调了主日学作为教会生活辅助手段的重要性。该报告提出了三个问题：(1) 美南浸信会大会在促进对主日学的兴趣方面进行任何尝试是否有利；(2) 现在是否适时；(3) 应该以何种方式做出努力。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南方所有州的兴趣的集中和巩固将导致效率、统一性和有益成果的扩大。这一行动报告的结果是，为了工作的利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由 Basil Manly, Jr. 担任主席。在美南浸信会大会成立主日学委员会的同一届会议上，圣经委员会被废除（因为以北方为主要基地的全美圣经联合会的工作在南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开展）。随后达成一项安排，将与浸信会公约没有任何联系的、美南浸信会出版协会合并到主日学委员会中。因此，这个新组织被称为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和出版委员会。

于是立即向南方浸信会发出了一份致辞，确定了新委员会的目标，解释了其计划，并呼吁大家的帮助。委员会虽然开始于最不利的时期（由于南北内战），

却充满信心地开始了工作，它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尊重，并很快向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机构致敬。为支持委员会工作筹集资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牧师会花很多时间关注它；南方的浸信会宗派报刊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帮助。委员会很幸运能够获得 John A. Broadus 博士的部分时间作为其相应的秘书。另外，委员会仍然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它缺乏印刷设施，也没有办法获得印刷设施。（由于南北内战）南部港口现已关闭，被敌对舰队包围封锁，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几乎不可能促进委员会的利益。除了书商书架上留下的存货残余，以及在私人住宅中偶尔找到的几本有用的书，没有任何书籍教材。但是，由于手头的材料很少，而且大部分都是粗糙的，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些书籍。

一万本主日学初级读本很快就用完了，又发行了第二版；一万四千本“主日学赞美诗小册子”很快也用完了，还需要七万本。《联合主日学赞美诗集》发行三千本，后来又发行一万本，迅速被抢购一空。南方最优秀的人才被这个辛苦经营的委员会所调用，并及时出版了一些书籍产品。其中包括 LH Shuck 的《少儿班问题书》；小 B. 曼利 (B. Manly, Jr.) 的《给小人物的小教训》和《关于四福音的儿童问题书》，以及詹姆斯·博伊斯 (James P. Boyce) 的《圣经教义的简要问答》。

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就向巴尔的摩的弟兄们提出申请，要求安排购买两万五千份新约圣经，用于其在南方的工作。对此，纽约美国圣经公会捐赠了这些数量的圣经。这些是在休战旗帜下发送的（尽管当时正在进行南北内战），“供美南浸信会的主日学使用”。事前，南方没有想到会收到北方这样的贡献；但美国圣经公会得知南方的贫困状况后，立即做出了慷慨的回应和捐赠。美国圣经协会被告知，“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认为，接受它们作为捐赠是不合适的，但请通知捐赠者，承认他们的基督教礼貌，他们（美南浸信会）将接收和分发新约圣经，并会在南北方之间商业交往可

行以后尽快支付费用。”即使在委员会获得这些《圣经新约》书籍之后，也发现很难分发它们。邮政设施较差；作为货运，装运很危险。但委员会取得了最出色的成绩。通过在每个州派出一位称职的主日学传教士，整个南方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世俗媒体也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且千方百计地为主日学委员会服务。委员会的活跃传教士包括：弗吉尼亚州的 WE Hatcher；南卡罗来纳州的 JA Chambliss；佐治亚州的 WT Brantley；和阿拉巴马州的 AW Chambliss。

时事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主日学委员会事业的成功，因为当时，儿童的父母们都渴望把孩子们送到主日学学校来；当时的世俗学校已经因为战争而关闭，所以，孩子们在教会主日学中至少能够得到文化教育。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期，浸信会宗派独自在南部进行主日学工作，而由主日学委员会代理人组织的学校无论名称或教派如何，都受到所有的教会的会众们的热切支持。

随着南方军队的投降，主日学委员会的工作也似乎停止了。但在 1866 年 1 月，它开始以有限的方式再次发行名为《恩慈话语》的期刊。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委员会感受到了群众们对于主日学书刊的很大的需求。委员会向众教会发出呼吁；但由于南方的衰败状况，只能得到微薄的回应。不愿失去对人民的服务，它（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立即从主日学校联合会、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美国传道书籍协会、以及个别出版商那里购买了它能买到的书籍。委员会在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勇敢努力赢得了同情；它努力恢复其影响力和服务的作用。1866年5月，当美南浸信会大会在肯塔基州拉塞尔维尔召开时，此时南方是一片废墟；这时在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和出版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出现了以下文字：“为有色人种所设立的主日学，已经在过去实行了多年；这在南方各个不同的地区进行，尤其是在城市和市镇里。他们最近的

自由解放为建立此类主日学学校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并且不再有任何倾向限制对他们进行口头教学。”同样的原因表明，由于黑人所担负的责任增加了，所以现在更完美地教导黑人救赎之道是及时的。委员会还坚持认为，南方人民有义务尽可能为获得解放的黑人做这项主日学教学工作。最后有人敦促大会有义务为黑人组织学校。

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现在开始为其自身生存而战。它在战争中与南方人民遭受了共同的灾难；现在除了诉求于人民的感情，它别无选择。它发出了求助呼吁，然而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回应。由于 1863 年拒绝接受巴尔的摩富勒博士帮助下、从美国圣经公会免费获得的 25000 本圣经，委员会（因为坚持为那25000本圣经付费，而）负担了 2000 美元的债务。Broadus博士从委员会的服务中退休，CC Bitting牧师被选为接替他。后者以特有的热情开始为一项广泛的工作制定计划。必须首先清偿委员会的债务。调查表明，主日学校委员会在收到25000本《圣经》时，得到的信息不完善，并受基督教荣誉最高指令的影响，自己承担了为这批书籍付款的义务。但另一方面，（发送那25000本圣经的、位于纽约的、）美国圣经公会却坚称这是一笔捐赠，并恳求美南浸信会如此考虑。这导致，现在委员会正式承认这些书籍是捐赠；美国圣经协会在 1867 年又增加了一批捐赠。

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现在采取措施重新开始出版工作和传教工作。1868 年，委员会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转移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通过委员会与“美南浸信会主日学联盟”的合并，SH Ford 博士成为新机构的总裁，TC Teasdale 博士被任命为秘书。（以北方为基地的）美国主日学联合会、美国圣经协会和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此时进入和占领南方；这严重加剧了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因其当前的残缺状况而陷入的尴尬境地。提斯代尔博士四处求助，于是向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的格里菲斯博士求救。格里菲斯博士立即回应：“如果您收到的申请数量超出了委员会会所能提供的数量，请

鼓励申请人向我们提出诉求。”

内部摩擦、工作复杂性和无力应对拥有广阔资源的机构，导致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于 1873 年解散，并被并入美南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这导致在南方的一些州自己组织了主日学委员会。与此同时，美南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继续出版一系列廉价的主日学文章，其中《恩慈话语》是主要期刊，所有这些文章均由 Rev. Samuel Boykin 编辑。

随着南方繁荣经济的回归浪潮，传福音的新机构应运而生。其中之一是遍布南方各州的美南浸信会州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基于最初完成的主日学工作。这些新机构无一例外地依赖浸信会出版协会为其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资。如果没有前者的及时援助，南方的主日学和书籍邮寄工作即使没有完全停滞，也会受到最严重程度的阻碍。美南浸信会注定要辛苦维持将近二十年的南方白人和黑人苦苦挣扎的主日学事工。

第十二章

附属机构

引致南方浸信会宗派的极大增长的力量，还得到了其他力量的补充辅助。这最后一类，虽然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但仍然非常有效。它们已经开始运作，正如福音禾场所要求的那样；虽然它们是浸信会宗派增长的产物，但他们反过来又产生出有助于实现同一目标（即进一步扩张基督福音教会的运动）的其他手段。在南方，这些辅助手段中最有效的机构之一是美南浸信会出版社。浸信会出版社被认为是南方各州的宗教媒体的先驱。佐治亚州的亨利·霍尔

科姆 (Henry Holcombe) 最早将新闻出版事业作为宗教机构的动力引擎；他于 1801 年建立了《分析资料》。这是美国浸信会新闻出版业的第一次事工努力，第二次是《马萨诸塞州浸信会传教士杂志》，出现于 1803 年。尽管很有价值，但《分析资料》并没有长寿。对于佐治亚浸信会教派中更先进和进步的分子来说，它虽然很好，但太超前于时代条件，无法对教派群众产生影响。它因不成熟而注定失败。

《后期杰出人物》是路德·赖斯 (Luther Rice) 的期刊项目之一，旨在唤起人们对国外宣教的兴趣。它于 1816 年在华盛顿特区创刊，最初以季刊的形式出版，后来改为月刊。它运作了一段有用、但简短的时间，然而最终由于缺乏支持而失败了。紧随其后的是《哥伦比亚之星》，它最终被分解为《基督教索引》，并先移至费城，然后移至佐治亚州。在新的领域中，它成为杰西默瑟 (Mercer) 手中的一个强大工具；他的地位和能力使他成为早期进步的拥护者。当需要用直白的语言和不妥协的原则来扭转无知和偏见的浪潮时，杰西·默瑟 (Jesse Mercer) 凭借《基督教索引》(The Christian Index) 最有效地提供了所需的服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激发并保持佐治亚浸信会对宣教和神学教育的兴趣。1840 年，他向佐治亚州浸信会州大会提交了《基督教索引》期刊，在随后的多事之秋，它成为了进步的巨大引擎，不仅在佐治亚州，而且在邻近的州也是如此。

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宗教先驱报》为东部的教派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1828 年，实用印刷商威廉·桑兹 (William Sands) 创立了它；从那个时期到现在，浸信会最优秀的作者们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凭借其推动浸信会教派达到最高发展的能力，它同样有助于通过其保守主义来起到良好制约作用。作为进步的倡导者，《宗教先驱报》在促进福音传播兴趣方面激发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在代表神学教育和传道使命方面。南北敌对行动结束后，其保守主义基调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地区间的敌意，

并恢复了南北之间的兄弟情谊。

在 1834 年的进步时期，《圣经纪事》应运而生。它是《基督教索引》和《宗教先驱报》之间的折中性的联系纽带；当时它们是南方大西洋沿岸州唯一的浸信会教派刊物。在美南浸信会成立后的形成时期，这些刊物机构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在很大程度把他们一致的稳定和进步状态归功于《圣经纪事》的强烈和不妥协的教派观点。

在南方各州的西部地区，最有价值的教派刊物机构之一是《西部记录员》。它起源于 1825 年创刊的《浸信会旗帜报》，因此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浸信会期刊的先驱。直到 1851 年，该报才成为《西部记录员》；在那之前，随着它从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它以不同的名字为人所知。在南部那个地区的浸信会教派被迫度过的动荡时期，《西部记录员》一直是维护浸信会原则的宝贵盟友，也是浸信会教派进步的明显推动者。

后来出现在西南的《田纳西浸信会》刊物，是南方浸信会的（那些反对拓展传教工作、以及反对建立神学教育机构的）极端观点的主要代表。它是所谓“旧地标主义”的机关报，在 JR Graves 博士的编辑指导下，在密西西比盆地和东西方与大河浇灌的州接壤的州产生了惊人的影响。Graves 是好辩家，他具有挑战性的语气，加上他华丽的话语和有利的措辞，很容易为他赢得了大众的眼球和耳朵。当时的混乱情况最有利于他的好辩精神。他的文章触及了大多数人的不连贯性格，其响亮的争论音符与华丽，和正在形成的混乱社会状态如此相得益彰，以至于其激烈的声明反对一切形式的教义错误；当时南方和西方都正被一场争论（关于是否拓展传教事工、是否建立神学教育）的风暴席卷，《田纳西浸信会》刊物的立场正是许多这些对立影响因素相遇、

冲突、论战的地方——这些都使其编辑工作和他的文章获得了在平静时期它们不会享有的显着地位。事实上，当混乱局面结束、平静局面开始盛行时，他的编辑工作和他的期刊文章的光彩开始变得暗淡；他的极端观点也不再那么受到注意。

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出版了很长时间的《美南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 刊物是浸信会教派同时代人们的宝贵盟友。它于 1838 年起源于阿拉巴马州的 Wetumpka，由 Rev. John D. Williams 创立。搬到阿拉巴马州的马里恩以后，在那里被称为《阿拉巴马浸信会》刊物，然后被称为《阿拉巴马浸信会倡导者》；随后又从那里搬迁到蒙哥马利，改名为《西南浸信会》刊物；并再次转移到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该杂志在抵消《田纳西浸信会》刊物极端观点的方面做得很好；同时它还是浸信会教派事业与机构的有力倡导者。它对南部和西南部、这个较新地区的浸信会发展利益的贡献价值无法估量；而另一方面，在卫理公会教徒最进步和最具进取性的地区，它坚定捍卫浸信会原则的价值丝毫没有降低。由于南北内战，《西南浸信会》刊物被并入《基督教索引》刊物。密西西比河下游流域宗派精神增长的标志之一是 WC 邓肯牧师于 1847 年创立的《西南浸信会纪事》刊物。该刊物干练地运作了三年，但后来因邓肯博士健康状况不佳而停刊。

1852 年，邓肯博士的兄弟 LA Duncan 先生感到南方那个地区需要一个地方机关报，因而着手创办了《新奥尔良浸信会纪事》刊物。该刊物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获得了相当大的发行量；但它于 1852 年停刊。1855 年再次努力为鹈鹕州（即路易斯安那州）的浸信会会众提供相互交流的刊物，因此汉森李牧师开始在黎巴嫩山出版《路易斯安那浸信会》刊物。这个刊物被证明比其他刊物更成功，因为它获得了美南浸信会期刊排名中“最有能力的刊物”的第一名。这份刊物在南北战争的黑暗岁月中一直在继续出版发行；在其天才编辑于 1863 年去世之后，随后分别由 AF Worrell 牧师、

WF Wells、Courtney 博士和 WE Paxton 主持；但在 1869 年它被合并到 JR Graves 博士强大的刊物机构《孟菲斯浸信会》中。

JL Furman 先生于 1876 年开始出版半月刊《南方信使》，但由于缺乏赞助，这项事业并不成功，很快就停刊了。

上文所提到的这些刊物是南方各州浸信会的主要刊物，直到南北敌对行动停止后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南方发生社会革命后，资源的集中和组织的紧密性变得必要，这需要教育手段的增加。没有什么能像浸信会报纸刊物那样有效地满足普遍的需求。因此，随着南方悬而未决的宗教利益的复兴，宗派精神得到了重申，每个州都通过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期刊表达了这种精神。一个接一个的州开始出版浸信会官方机关刊物，直到每个南方州都有一个或多个刊物。

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刊物以外，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信使》；田纳西州的《浸信会和反思者》；肯塔基州的《肯塔基浸信会》；阿拉巴马州的《阿拉巴马州浸信会》；密西西比州的《浸信会记录》；路易斯安那州的《浸信会记录》；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佛罗里达浸信会见证者》。

在过去的 25 年里，所有这些期刊报纸杂志都对南部各州的宗派发展起到了宝贵的辅助作用。这些期刊出版机构与州浸信会委员会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彼此之间的行动和反应最有助益，并普遍地促进了上帝的圣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质更鲜明的期刊与州级期刊合作、共同服事于上帝的国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外国宣道委员会发行的《外国传教杂志》。自创刊以来，它在整个南方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它占据了一个独特的领域。由于其重要地接触到远在海外的传教士，它就向众教会提供

那些引起人们对国外传教工作的同情和兴趣的信息。

多年来，浸信会国内宣教委员会发行了一份整洁的刊物，称为《我们的家园》；它与该委员会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就像《外国传教杂志》与它作为机关杂志的外国宣道委员会所保持的关系一样。1895年曾尝试统一这两个委员会（国内宣道委员会与外国宣道委员会）之间的兴趣与利益，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两个委员会于1896年开始分别自行设计其与众教会的沟通方式。

在南方没有“评论杂志”的情况下，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神学院杂志》（Seminary Magazine）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它由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学生发行，以其高雅的语气极大地促进了南方各州神学思想的进步。

除了新闻事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强有力的出版机构与浸信会宗派刊物密切合作，以促进浸信会的利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该出版协会起源于南方。随着浸信会教派在南方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建立一家综合出版机构的迫切必要性的建议；通过它可以介绍和延续浸信会的原则。这些原则正在扩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抱它们，但它们从前几乎完全是由传教士的嘴唇提出的（而没有书面的文字形式可以阅读、加深理解）。

直到1824年，创办出版机构的事情才初具规模。四年前，费城就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1823年，马里兰州的诺亚·戴维斯（Noah Davis）给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同学JD诺尔斯（JD Knowles）写了一封信，敦促在浸信会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小册子出版协会。这封信还建议召开会议，考虑建立出版事业的可行性；该呼吁发表在《哥伦比亚之星》刊物上。作为回应，24人于1824年2月25日在乔治·伍德先生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

会面。在场的有威廉·斯托顿 (William Staughton) 和男爵斯托 (Baron Stow)，后者当时是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

于是成立了一个协会，乔治·伍德成为协会的代理人；协会立即开始运作。

设立这样一个协会机构的必要性从它在各州得到响应的热烈程度就显而易见了。协会成立两年后，它被转移到费城，此后一直留在那里。

本书这里不是提供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历史的地方；简略地说，随着浸信会教派的增长和国家的繁荣，它也相应地蓬勃发展。

在南北内战结束后的混乱日子里，当浸信会教派寻求召集其代理人，并在其工作重组中开辟新的起点时，浸信会出版协会出手相助。美南浸信会主日学委员会在战争期间的工作表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版手段实现最大的利益。南方委员会无法全部满足这些要求；这样的需求使南方最需要为扩展这个重要的基督教工作部门提供物资支持。自 1863 年以来，支持主日学的情绪一直在迅速增长。在那个时期之后的十年里，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出现了最显著的发展。但就在兴趣最浓厚的时候，其供应来源因主日学委员会的必要解散而被切断。就在此时，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南方主日学的培养。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朋友。它用慷慨的手无偿地提供了数百所主日学学校，针对的对象既有白人教会也有黑人教会。数以百计的主日学图书馆也以同样的精神布置。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只有该协会在南方各州开展这项工作。与此相伴的是在出版协会的支持下进行的书籍运输和传教系统。

南方对主日学和书籍运输用品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于 1887 年决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建立浸信会出版协会分部。这是由像亨利麦克唐纳和 HH 塔克

博士这样的人所热切提倡的。该事业开始时有点像商业风险，但当第一个财政年度的销售收入超过三万两千美元时，试验阶段就过去了；亚特兰大正式成为主日学影响巨大的中心。几年后，为了满足对浸信会出版协会分发的文学作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成立了浸信会出版协会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分部，以及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分部；它们与亚特兰大分部一起构成了浸信会出版协会在美国南方的三个分部。1894 年，JB Hawthorne 博士在佛罗里达州奥卡拉的《浸信会见证者》新大楼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表达了美南浸信会对该出版协会的公正评价：——

“世界上坏书的腐败影响，与数以百万册的良善书籍的净化和高尚影响相抵触。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在为世界提供有益健康的文学的出版机构中，没有一个机构比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更值得尊敬和重视。它是世界上每一位浸信会教徒都可以引以为豪的浸信会机构。它的书刊走进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去启蒙、去提升、去拯救人民。凭借其宏伟的视野，由该国许多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指导，以及近四百万浸信会会众的道义和物质支持，它注定要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实现奇妙的转变影响。与同类机构和谐合作，它将大大有助于将这片土地从不洁和堕落的文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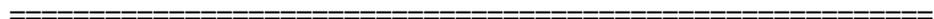
南方的另一个慈善机构是美国浸信会国内布道会。它的工作主要局限于有色人种，他们是最需要福音事工的人。它通过在南方黑人中建立学校培养了一种自尊精神。在南方有色人种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该协会提供了一种不可能以其他方式提供的帮助。仅在 1893 年，它就在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中花费了 12562 美元用于传教工作。它为南方各州的人们保留了二十九所学习教育机构，其中十四所是高中，十五所是中学。南方幸运地从该协会接收这项工作成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赠与和贷款协助建造礼拜堂。

美国浸信会教育协会成立于 1888 年，可能是为了管理约翰·D·洛克菲勒先生所捐赠的教育专项赠款，以促进浸信会学校的发展。它已经向南方陷入困

境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大量和及时的援助，以偿还债务和增加捐赠基金。该协会作为一个募捐机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以从其他和感兴趣的来源筹集数倍的捐款为条件，作为其捐款的条件（即，它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捐款的条件往往是：该教育机构能够首先从其他募捐来源筹集到一定比例数量的捐款；之后，它就会在该教育机构已获捐款的基础之上捐献，从而使其所获捐赠金额倍增）。

美南浸信会青年联盟作为一个组织才刚刚起步。它承诺将在南方的浸信会教会中完成许多出色的工作。通过其基督教文化课程，它为该教派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神圣文学、教派历史和传教历史的更崇高和更广泛的视野。

南方教育会议是一个每年与南方浸信会会议相关的会议的组织。它于 1891 年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成立。在其年度会议上，来自南方学校的浸信会教育工作者代表宣读和讨论了具有教育意义的论文。



第十三章

妇女工作

近期以来，开始成立南方各州的浸信会妇女协会组织，并与美南浸信会传道协会相合作。早在这场运动之前，南方不同地区的妇女就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宣教事业中。时不时地会成立朴实无华的地方社团，时不时会有一些虔诚的妇女自愿捐款。甚至早在 1823 年，妇女传教士协会就存在于当时年轻的阿拉巴马州的不同地区。当该州的浸信会大会成立时，二十名州代表中有七名是这些妇女社团的代表。这些小规模社团完全独立于任何一般组织。那一年，

在虔诚的妇女们所提供的捐赠物品中，包含了一个手表和链子，还有妇女们所织的袜子。早在 1823 年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就有一个妇女传教士协会，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类似协会散布在南方的各个地方。

然而，在南方对妇女事工产生了新的兴趣之后，在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反对它的倾向。普遍表达的担心是，那些妇女协会组织可能会——分散教会的精力、将教会分成不同的部分、并会导致教会解体。另一个担心是，在教会中存在过分突出女性的危险。即使在南方开始了妇女组织工作之后，在某些地区，她们仍然在敲协会和州大会的大门，请求允许和鼓励她们参与该宗派的一般工作，但却是徒劳。这些反对情况在某些州变得如此顽固，以至于，那些地方教会中的妇女协会可能往往是形同虚设。

1867 年，在加德纳科尔比夫人担任主席、阿尔瓦霍维夫人担任秘书的、马萨诸塞州牛顿中心妇女传教士协会传来的新运动的启发下，巴尔的摩的安·J·格雷夫斯夫人组织了巴尔的摩妇女传教士祈祷会，——支持属于中国广州浸信会的当地本土圣经妇女。格雷夫斯夫人是在华传教士格雷夫斯博士的母亲。这次巴尔的摩妇女祈祷会议，后来一直稳步维持；1869 年，印度加尔各答的布里坦小姐访问美国，并应格雷夫斯夫人的邀请参加其中一次祷告会。布里坦小姐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于人们对于异教徒土地上的妇女传教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导致了巴尔的摩妇女联合会传教士协会的成立，其中包括该市各个基督教会的许多热心妇女。这个协会成立于 1870 年，JWM Williams 夫人担任主席，Ann J. Graves 夫人担任秘书。几年之内，这个地方妇女社团的筹款从每年六百美元增加到一千美元。

1871 年 10 月，组织了妇女传道会，富兰克林·威尔逊夫人担任主席，F. Crane 夫人担任财务主管，诺里斯（Jane W. Norris）小姐担任记录秘书，格雷夫斯（Ann J. Graves）夫人担任通讯秘书。人们对这项工作的捐款兴趣继续增

长；诺里斯小姐和到中国传教士格雷夫斯（RH Graves）博士的婚姻也使这种兴趣增长很多。

同一天，即 1871 年 10 月 23 日，南卡罗来纳州纽伯里浸信会的牧师约翰·斯托特牧师也组织了一个妇女传教士协会。斯托特先生是南方第一个承担并鼓励这种妇女组织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在他的州从事这些社团的组织工作。

1872 年，弗吉尼亚州的埃德蒙尼亚·穆恩小姐被浸信会外国传道部接纳为中国传教士，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浸信会妇女立即组织了该市的妇女传教士协会，以支持穆恩小姐。第一年的捐款达一千二百美元。

1872 年，在向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举行的美南浸信会大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作为浸信会外国宣教委员会的通讯秘书，图珀博士提到了在当地的福音传教站组织圣经妇女的重要性，并建议我们教会中的妇女可能会意识到“将她们的姊妹从异教徒的堕落和毁灭性奴役中解救出来”的重要性。

JWM Williams 博士在 1872 年的美南浸信会大会会议上宣读了一份关于妇女事工工作的报告，呼吁与会代表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妇女传教士协会。约翰·斯托特牧师出席了本届大会，他对妇女运动非常感兴趣，正如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社团组织中的高效工作所表明的那样。之后几年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局限于南卡罗来纳州和南方妇女运动的发起人约翰·斯托特（John Stout）牧师。这件事在 1875 年再次引起美南浸信会的注意，当时组织妇女传教士协会的工作受到正式表彰。1876 年，在斯托特先生的建议下，成立了南卡罗来纳中央宣教委员会。这是在南方组织的第一个州中央委员会。它在那一年获得了南卡罗来纳州浸信会州大会的批准。

1878 年，此事再次提交南方浸信会大会，该大会于当年在纳什维尔举行；此时，美南浸信会在尊重这项重要工作方面迈出了积极的第一步。在 JWM Williams 博士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斯托特（Stout）先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无疑影响了该建议，其中敦促每个州组织中央委员会与两个总委员会（即美南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合作，作为对于美南浸信会大会的辅助。次年，即 1879 年，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是 TT Eaton 博士。该委员会强调了前一年的行动，重申了妇女组织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这项工作承担了更大的职责。在约翰·斯托特牧师的领导下，南卡罗来纳州大大领先于南方其他州，其中一些州的浸信会协会拒绝鼓励该运动（即妇女事工运动）。在整个南方形成的协会的隔离状况表明，建立一个普遍的合作组织是合宜的，但它在几年内没有受到实施。

1881 年，Tupper 牧师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呼吁美南浸信会注意在南方进行的妇女事工运动，并指出，据了解，已经组织了 350 个这样的妇女传教事工社团，她们已为国外传教事业捐款六千二百四十四美元零三十美分。

美南浸信会大会仍然迟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而基本上仅仅是给予口头认可。一些南方州继续抵抗该运动（妇女传教事工）；只有在几乎所有这些州安静地组织妇女事工协会时，才能克服困难。1883 年，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在举行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美南浸信会大会面前。这一次它（妇女传教事工）引起了比以往更多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在整个南方各州的浸信会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得到了体现。该组织为不断发展的妇女传教事工事业提供了额外的力量。工作迅速发展，直到 1885 年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举行的美南浸信会大会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那届会议上，参加美南浸信会大会的阿肯色州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员由女性组成。根据美南浸信会大会会议的章程，没有任何内容可以阻止承认她们为代表。这一事件引起的骚动被提交给一个由所有州

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所平息，其中 J. William Jones 博士来自弗吉尼亚，担任该专门委员会主席。经过适当的审议，该专门委员会报告如下：

“本委员会被提交了关于妇女在美南浸信会大会中担任代表的资格的整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一致同意以下内容：由于对大会章程的适当构建产生了一些疑问，我们建议修正案如下：在章程第三条中，删除第一行中的‘成员’一词，并插入‘弟兄们’一词代替。”

报告获得通过，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来自南方的许多浸信会妇女出席了这届大会，并不是为了被承认为大会代表，而是为了共同讨论整个南方的传教事工等工作。举行了一次会议，阿肯色州的女士们热情地参加了会议，当时在场的所有这些高贵的妇女都向大会发出了一封信，否认有任何建立一个单独和独立组织的目的，并宣布她们的目的是直接通过教会工作、并通过美南浸信会大会公约指定的所有渠道。

奥古斯塔大会会议中的妇女的这一行动消除了先前可能存在的任何误解，并为南方各地的福传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1890 年之前，南方的一般相关组织被称为妇女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后来，它承担了妇女使命的更尊严的名称：——“妇女传教士联盟”。

1885 年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举行的美南浸信会大会会议之后，妇女传教事工的工作得到了适当的认可。从那以后，每个州的妇女协会代表在美南浸信会大会会议的同一天和地点聚集一堂，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作为美南浸信会大会公约的辅助人员，妇女们在举办大会之城市内的另一位置地点单独举行会议。部分是出于谦虚，部分是因为她们希望以令自己满意的方式处理事务，她们禁止男性出席她们的妇女传教士联盟的会议，除非是因为他被邀请这样做。妇女传教士联盟的总部位于巴尔的摩市。AM Gwathmey 夫人是该机构的主席，Annie W. Armstrong 小姐是联络秘书。除了直接捐给两个总

委员会（美南浸信会国内宣道委员会、美南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财库的募集资金外，她们在分发宗教书籍和传教书籍、以及为在西部边境各地工作的国内宣道委员会的传教士提供物资储备方面，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服务。一些州的妇女传教士联盟组织承担对于海外传教士的支持，而另一些则负责他们（海外传教士）的子女在美国国内的教育。

1888年是南方妇女运动独特组织的日期。那个日期之前的所有事工努力都是为一个总体组织做准备。在少数几个州内，这项工作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彻底有效地组织起来了，但直到1888年，该运动才开始变得普遍。随着组织人数的增加，它的知名度和工作代理机构也会成倍增加。在较大的城市中，进行了大量的传教工作，在较贫穷的人口阶层中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活动。

妇女传教士联盟执行委员会于1895年在华盛顿特区通过的以下建议，清楚地阐明了妇女传教士联盟的精神和宗旨：——

“1. 相信借着圣灵的影响力和大能，可以为主成就大事，我们建议妇女传教团体庆祝和纪念189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世界祈祷周，特别提到圣灵的引导扩展了对宣教的兴趣；为了让我们的祷告更具体，传教（祷告）卡可以更广泛地使用。

3. 衷心赞扬美南浸信会外国宣道委员会和国内宣道委员会分别向妇女宣教协会提出的、募集总额三万美元（为了外国宣道事工）和两万五千美元（为了国内宣道事工）的筹款目标的要求建议；为了明确起见，我们进一步建议，这些捐款目标数字应在各州之间按比例分配。

4. 相信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力量，我们诚挚地建议，大力地兴起在青年妇女、女孩和男孩中组织宣教社团的工作。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们中的一员，或选出他们中的一员，负责每个州的这项工作。

5. 受到祈祷周开始的热情和随之而来的果效的鼓舞，再次建议各协会社团庆祝、纪念、祈祷、克己一周。

6. 在外国人和有色人种妇女儿童中组织母亲会议和勤勉学校；并在中国任何可能的地方为华人开设主日学，无论是需要一所还是更多的主日学学校。”

因此，南方的妇女传教事工运动从一种粗糙而复杂的形式，从 1888 年的令人怀疑，到1895年已成为神圣工作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Ann J. Graves 女士、ME McIntosh 女士（Bell 夫人）、Annie W. Armstrong 女士、AM Hillman 女士、Fannie E. Heck 女士、MD Early 女士、乔太太、B. Eager、John Stout 夫人和 JP Eagle 夫人，是促成美南浸信会妇女传教士联盟之成功的最重要人物；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为大家所熟知。该联盟的值得称赞的目标被理解为“使每一位浸信会妇女成为传教士的聪明而积极的朋友，并在她们的祈祷和捐赠中养成这样一种规律、系统的习惯来支持这项工作。”

自从美南浸信会妇女传教士联盟组织成立以来，她们各年对于国内外宣教使团的捐款总数：

1888 年 21, 039. 16 美元。
1889 年 30, 773. 69 美元。
1890 年 31, 237. 76 美元。
1891 年 38, 990. 34 美元。
1892 年 44, 282. 80 美元。
1893 年（百年纪念）62, 336. 75 美元。
1894 年 45, 128. 59 美元。
1895 年 48, 449. 25 美元。
累计 322, 238. 34 美元。

第十四章

有色人种浸信会及其工作

美南浸信会最有益的功能之一就是关于黑人浸信会。他们属灵历史的开端比他们的政治解放早了一个多世纪。

诚然，奴役黑人对奴隶和主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坏事，但即使是奴隶制也会带来对黑人来说无法估量的附带好处。美国奴隶制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复兴，即使存在这种倾向，也不会从为它辩护的论据中得到满足；然而，该制度也附带带来了一些好处，没有这些好处，有色人种一定仍然是野蛮人。虽然数以千计的人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而且常常受到残酷的待遇，但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劳动很轻松，免于残忍的奴役，并且因每天与南方的文化中最高贵的人接触而受到优待。以女佣、管家、女裁缝、保姆、护士、侍从等等的身份，这样的人在最有文化的南方家庭中有数万人。这些人温顺、温良、令人印象深刻，不知不觉地拥有了无数的优势，当奴隶解放时期到来时，这些优势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好处。

与白人青年一样，成千上万的黑人青年不仅获得了初级教育，而且许多人成为了音乐家、演说家、朗诵家和作家，许多人还能够吸收社会生活的习俗与礼节。许多聪明的奴隶男孩容易接受知识和充满深情，从白人青年的无数次演讲排练中捕捉到雄辩的精神，当奴隶制的束缚解除时，他们闪现出才华，成为传教士和公众演说家。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从奴隶制的附带好处到他们成为自由人时所应当承担的职责，这种转变是轻而易举的。黑人取得显著进步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被奴役期间享有的无数小优势的累积结果，这些优势加起来是相当可观的：这样，当解放来临时，黑人就不是没有教养的、野蛮的。的确，有许多奴隶被残酷的主人强迫；有许多人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受苦；许多人因最恶毒的强加而堕落；但是，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奴隶

人群，他们所得到的照顾和收获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当他们在接受解放的恩惠时，将处于可悲的无助状态。

在记录这些事实时，并不想剥夺有色人种本应属于他的任何优点。他值得很多赞誉是真的；他因迅速而适当地使用他力所能及的手段而值得称赞，这是公正的人不会否认的；他能够在逆境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着实令人惊奇，也值得称赞。

为了正确评价关于南方有色人种传福音的历史，为了充分了解关于他们的事工工作性质，我们必须把零散的历史线索收集起来，汇集起来。

就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前，一位名叫乔治·利勒 (Liele) 的有色人种、奴隶，在浸信会先驱传教士马修·摩尔的布道下，在佐治亚州伯克县皈依了基督教。受洗后，利勒获准传道，他的努力得到了最令人愉快的结果。大约在独立革命爆发时，他的主人亨利·夏普 (Henry Sharpe) 解放了他，利勒 (Liele) 去了萨凡纳 (Savannah)，并开始在城市附近的布拉姆顿 (Bramton) 和亚马克劳 (Yamacraw) 以及外围种植园广受欢迎地传播基督福音。他继续在该地区进行福传工作，直至美国独立革命结束；随后，利勒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贴身仆人陪同这个英国人前往牙买加。利勒被牙买加岛上非基督徒群众的堕落状态深深震动，于是开始向他们传教。只要他能聚集人群，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赛马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他自己租来的房子里，他都会热切地宣扬福音的主张。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因为他有能力召集建立一个由四名成员组成的教会，他们和他一样，都是来自美国的难民。

现在，他以强烈的热情投身于福音工作，并且在他养活自己的同时，能够在七年内为五百名皈依者施洗。1793年，他在牙买加建造了第一座教堂。与此同时，他经受了許多严酷的迫害，曾不止一次被囚禁、并被用铁器装上重物、

戴上镣铐，还曾为他的生命而受审。利勒从牙买加与英国的赖兰德和里彭博士保持通信，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始将福音引入非洲。

在离开美国前往牙买加之前，利勒在萨凡纳附近为奴隶安德鲁·布赖恩（Andrew Bryan）施洗，后者在皈依基督教九个月后，开始在亚马克拉布道。

许多皈依者都是他努力的结果。获得允许在布拉姆顿（Bramton）的一个谷仓传教以后，布赖恩的良善工作继续进行，直到他受到一些声名狼藉的白人的干扰，这些白人以镇压叛乱为借口袭击人群。社区的奴隶主立即检查了这种干扰的缘由，并鼓励布赖恩的传教聚会继续进行。在此期间，布赖恩从未曾获得正式牧师传道许可。年迈的白人牧师托马斯·伯顿（Thomas Burton）听说了这项在奴隶人群中施恩的工作，便拜访了他们，并为 18 个人施洗。后来，在 1788 年，基奥基教堂的亚伯拉罕·马歇尔牧师在奥古斯塔年轻的有色人种传教士杰西·彼得的陪同下，访问了布拉姆顿社区并为另外 45 人施洗，组织建立了一座教堂，并任命布赖恩全面负责传道工作。这成为萨凡纳另外两个有色人种教会的母体。布赖恩（Bryan）享年 90 岁，在他作为奴隶传教士度过一生的城市中，白人基督徒以极大的敬意安葬了他。虽然他是奴隶，但布赖恩死时留下了三千美元的遗产。

为表彰这位奴隶传教士的宝贵服事，萨凡纳浸信会教会协会（白人）于 1812 年在他去世之际通过了以下决议：——

“萨凡纳第一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有色人种牧师安德鲁·布莱恩（Andrew Bryan）的去世明显影响了我们协会。这位非洲之子在为他神圣之主的事业遭受了无法形容的迫害之后，终于获准在他的有色人种朋友中平静安宁地履行传教职责，数百人在他的帮助下了解了知识真理是‘在耶稣里’。他以活泼的信心操练和对幸福永生的快乐盼望结束了他广泛有用和令人惊讶的光明的一生旅程。”

安德鲁·布赖恩 (Andrew Bryan) 的事业落在了他的侄子安德鲁·马歇尔 (Andrew Marshall) 身上，他在佐治亚州南部的奴隶人口中积极开展福音工作，直到 1856 年去世。

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洛特·卡里 (Lot Cary)，他是第一位从美洲前往非洲的有色人种传教士。卡里出生于 18 世纪末，早年是出了名的腐败和恶毒。1804 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烟草仓库里做普通奴隶。他于 1807 年皈依，成为里士满第一浸信会教堂 (白人) 的成员，当时南方没有有组织的有色人种教堂。

在里士满古老的第一教堂的回廊里，卡里听到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道，讲道基于我们的主与尼哥底母的谈话。他心中萌生了传道的愿望，希望他能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告诉别人。在一位年轻的白人男子身上找到友善的教导后，卡里很快就能阅读新约圣经，并获得了传道许可。他热衷于在里士满的黑人中工作，并很快成果丰厚。当皈依者在奴隶中开始增多时，走廊和与教堂会众主要敬拜室相邻的隔间被提供给有色人种的住宿；他们与白人一样参加同样的服事和敬拜。他对阅读的渴望使他购买了书籍，这些书籍通常是他从廉价供应商的书架上挑选的。他把这些数量稀少、各种种类的图书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提高智力的机会。他把仓库里时的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他的书上。有一次，仓库里的路人偶然捡到卡里的一本书，发现卡里一直在绞尽脑汁地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毫无疑问，他是在某个便宜的书摊上或在杂项拍卖会上偶然发现它的，他正试图解开其中的内容。同样，他将《库克船长的航海记》列为自己的财产之一。谁能否认，在这个了不起的人的生命的展开中，上帝的手在看顾着他的方向？

通过仔细保存散落在仓库地板上的烟草碎片，并且通过经济地囤积他以各种

方式服务的商人的慷慨小费；卡里终于积攒了八百五十美元，他用这些钱换回了自己和孩子们的自由，他的妻子之前已经去世。他找工作没有困难，因为他的名声与诚实在里士满的商界是众所周知的。他是里士满非洲传教士协会成立的主要促成者之一，该协会于 1815 年成立，是美国最早成立的此类协会之一。五年之内，这个协会筹集了七百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基督徒奴隶的捐款。

卡里买了一所舒适的房子，事业兴隆，但他还是很想去非洲当传教士。他的雇主得知他的这种愿望后，设法劝阻他放弃这样的目的，并通过诱使他重新考虑的方式增加了他的工资；但是这位深具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不能被打动。他放弃了自己的受聘工作职位，卖掉了他漂亮的房子，在三年一度的浸信会大会上自愿报名，前往非洲参加传教工作。1821 年 1 月，卡里与另一位有色人种传教士科林·蒂奇 (Colin Teage) 一起航行前往非洲。这些人于 1822 年在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 (Monrovia) 开始在巴萨 (Bassas) 人中工作。工作一年后，他们为六人施洗，接下来的一年为九人施洗，以后有更多人受洗。

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人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黑人在南方历史早期阶段表现出的强烈福音兴趣。地区浸信会教会协会聘请白人传教士访问人口稠密的种植园并向黑人传教。我们许多最忠诚的浸信会国内传教士都是面向种植园奴隶的传教士。有时，许多奴隶的主人会以规定的薪水雇用这些人的服务，而教会和教会协会也会多次指派他们从事此类工作。在皈依的奴隶中有的人有牧师的天赋，他们有时会得到自由、并被任命为传教士。从南方历史的最早时期开始，基督徒奴隶就受到尊重。早在 1793 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市的一个完全由有色人种组成的教堂就被多佛教会协会接纳、成为那里的教会协会会员。

1828 年，阿拉巴马教会协会以六百二十五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名叫凯撒的

奴隶，并派他进入到福音事工中，在他的人民中做传播福音的工作。这位属神的人虽然是像厄瑞波斯一样的黑人，但却是阿拉巴马州当地著名的白人传教士詹姆斯·麦克勒莫（James McLemore）多年的同工伙伴。凯撒因其虔诚信仰和作为传教士的传道能力，而受到普遍尊重，并且经常向完全由白人组成的教会听众发表讲话。塔斯基吉教会协会承诺购买另一名奴隶多克·菲利普斯（Dock Phillips）（他很有讲道的大能，在他的人民中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以便使他自由、并能够任命他为传教士；但他拒绝与他的主人断绝关系，而且他的主人允许他在任何他所愿意的时间出去布道。

在此期间，南方只有少数独立的黑人教会组织。在人口中心，偶尔会遇到有色人种的教堂。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有三座这样的教堂，这些教堂的牧师由该市三分之一的黑人人口奉献支持，年薪从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等。在其他地方，有色人种的教堂由白人牧师主持，例如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安东尼街教堂，Keidor Hawthorne 牧师就是那里的牧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一非洲教会，时任里士满学院院长的罗伯特赖兰博士担任该教会的牧师。他维持这种关系长达 25 年，这一事实表明了双方对于彼此的忠诚和感情。

直到 1825 年，授予有色人种牧师执照和任命有色人种牧师的习俗在南方盛行；此后这种做法被放弃，在南方的一些州，颁布了禁止教奴隶读书的法律。这是因为担心如果这样教导他们，他们会在被奴役的束缚下感到恼怒，并可能引发叛乱。如本书前文所述，这些法规无论温和或严厉，在数以千计的情况下都被完全忽视，女仆和管家被教导读书和写字。黑人容易受影响的性格本性使他们很容易受到福音布道的影响，而且他们通常是布道会中最热心的听众。

在南部的奴隶制期间，黑人常常参加在种植园举行的、福音布道会中、大量

人群的敬拜服事。他们洪亮的赞美诗歌旋律，不拘泥于俗套，经常能在很远的地方听到，因为他们会发自内心地投入灵魂进行敬拜。当奴隶和白人去同一个教堂时，前者的人数通常超过后者；当举行圣餐时，奴隶与他们的主人相交、共融。在有色人种浸信会忠于他们的原则的显着例子中，可以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完全处于法国天主教徒的统治之下，那里只有罗马天主教教徒的公开宗教盛行；法国天主教徒规定，那里的黑人奴隶，除罗马天主教外，不得从事其他形式的基督教礼拜。然而在南北战争、奴隶解放后，人们发现这些被奴役的人中很多人长期以来秘密地保持着浸信会崇拜。他们在种植园里有他们的固定组织——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执事——所有这些。在黑夜的掩护下，这些浸信会奴隶常会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尽可能安静地举行敬拜仪式，并以适当的形式施行教仪条例。罗马天主教崇拜的一个特征给这些无知的奴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影响，那就是对婴儿的洗礼。对于无知的奴隶来说，他们对这个婴儿洗礼仪式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以至于在解放时期很久之后，路易斯安那州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浸信会传教士仍然将给婴儿洒水的仪式作为将孩子奉献给主的行为。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浸信会组织的记录中大量提及为黑人基督教化所做的规定。由于认为他们（黑人基督徒传教士）在非洲的种族同胞中的传教工作，可能会比白人传教士可以取得更多成就，因此，两个有色人种传教士：J. Day 和 AL Jones 于 1846 年被美南浸信会宣道委员会派往非洲大陆。在后来的时期，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根据 1890 年第十一次人口普查，作为一个整体，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构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正规浸信会宗派。尽管这些数字显示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人数众多，但并不包括所有美国黑人浸信会教徒。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北方，通常是白人教会的成员，在人口普查中被一视同仁地计算为白人教会会众成员（而没有被计算为有色人种浸信会会众成员）。

还有许多其他人没有被包括在伟大的国家统计中，因为人口普查官员没有接触到不知名的乡村教堂和许多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协会。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未能回应国家人口普查官员多次向教会文员或主持人提出的统计请求。据推测，南方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有色人种浸信会协会未能提供其足够的人数统计和财产统计数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下面给出的数字：——

佐治亚州以 200,516 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领先；

弗吉尼亚州，199,871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阿拉巴马州，142,437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密西西比州，136,647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北卡罗来纳州，134,445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南卡罗来纳州，125,572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田纳西州，52,183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肯塔基州，50,245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佛罗里达州，20,828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哥伦比亚特区，12,717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马里兰州，7,750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西弗吉尼亚州，4,233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路易斯安那州，68,008名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

上述各州连同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总数为 1,087,445 人。

【本书译者注：1890年时美国黑人总人口75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12%，其中大约90%黑人（即大约600多万人）生活在南方。】

由于本书前文已经提到的原因，当奴隶解放时期到来时，南方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教徒并非完全没有准备好退出白人教会、并自己成立独立教会组织。这显然被认为是黑人基督徒们可能采取的最明智的步骤，但白人并非不关心他们。无论黑人在哪里寻求援助，或寻求扩大援助范围，白人基督徒们都会热

情地把各样帮助与支持提供给挣扎中的、在建立教会过程中的、黑人基督徒弟兄。在教会和教会协会的组织工作中，在牧师和执事的任命中，以及在校舍和教堂建筑的建造中，人们欣然提供了大量援助。

在有色人种浸信会方面，教会生活的发展取得了最值得称道的进步。一旦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组织自己的众教会成为地区教会协会，然后组织成更普遍的州教会协会和全国教会协会代表大会机构。北卡罗来纳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协会是第一个组织成州大会协会的；该大会于 1866 年成立、举行；阿拉巴马州和弗吉尼亚州紧随其后于 1867 年成立、举行。后来，适时出现了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州大会；美国南部其他州也紧随其后。

当这种教会协会组织精神一开始在南方各州盛行，北方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有色人种基督徒就从北方赶来协助和指导他们与更大团体的联系。

1866 年 8 月，有色人种传教士大会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了二十六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它决定将有色人种浸信会的所有普遍利益——传教士、西北大会和南方大会——合并为一个整体，它被称为联合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大会。十一年后，这个联合机构再次在里士满开会，当时在管理和管辖范围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意见分歧。争议一度威胁到联合机构本身的生存，但它被保存了下来。然而，解体最终还是来了，直到现在，南方各州所接受的领域都包含在美国浸信会外国传教士大会中，该机构成立于 1880 年。1883 年，该大会派遣了六名传教士前往非洲。

美国全国浸信会大会于 1886 年在圣路易斯召开。这是一个由来自 17 个州的 600 名代表组成的大型代表机构。在这些代表中，有色人种的进步表现在：——现在有黑人“法律、医学和神学的毕业生；哲学教授，德语教授、法语

教授、拉丁语教授、希腊语教授和希伯来语教授；一些州前代表和前参议员；两名副州长；许多期刊编辑和老师，不在少数；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浸信会教徒；和来自英国伦敦的浸信会传教士。”

南方各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拥有近三十所高级学校，主要用于培养传教士和教师。其中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是 1864 年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罗杰威廉姆斯大学。它拥有价值 25 万美元的大学财产。接下来的两所学校分别于 1865 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和华盛顿特区成立；第一个是逸夫大学，拥有价值二十一万五千五百美元的财产，第二个是韦兰神学院，其财产被估价为十万三千美元。1867年，亚特兰大神学院成立，现拥有房产总估价为八万五千五百美元。哥伦比亚大学本尼迪克特学院成立于 1870 年，其资产估计为 11.2 万美元。1873年，佛罗里达学院在Live Oak成立，其财产估价为一万五十美元。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杰克逊学院成立于 1877 年，其财产估计价值 2.5 万美元。塞尔玛大学于 1878 年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成立，拥有价值两万二百五十美元的房产。肯塔基州有色人种浸信会学院位于路易斯维尔，被称为州立大学。它成立于1879年，并拥有价值三万五百美元的财产。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斯佩尔曼神学院成立于 1881 年，拥有价值 15.3 万美元的财产。利兰大学于 1870 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成立，拥有的财产估计价值为 16 万美元。这些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各州由有色人种浸信会管理的主要学校。这些学校中的大多数都是北方捐助的结果；而且这些大多数学校由美国浸信会国内布道协会支持和维护。

在南方各州的有色人种浸信会教会协会拥有和经营的期刊中，可以提到的有：——《非洲探索》，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经营；《美国浸信会》，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经营；《浸信会信使》，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经营；《佐治亚浸信会》和《每周哨兵》，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经营；《浸信会信号》，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经营；《生命之道》和《孟菲斯守望者》，在田纳西

州孟菲斯经营；《里士满星球》和《非洲宣教》，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经营；《西弗吉尼亚事业》，在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敦经营；《浸信会论坛报》，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经营；《浸信会领袖》，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经营；《浸信会评论》，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经营。其中大部分期刊都具有严格的浸信会教派特征。另外还有南方有色人种浸信会发行的大量报纸，它们往往是政治性兼具宗教性的，而其他还有一些黑人报纸则完全是政治性的。

上文已经提到有色人种对具有宗教性质的会议集会的喜爱。与此平行的，是他们同样喜欢“跺脚拍手”和“嬉闹”所提供的消遣。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们的、在星期六晚上的消遣是许多主人关心的结果。为了这个，劳动通常在一天结束前就停止了。结果，在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宿舍，在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回荡着小提琴和弓弦的音乐，以及“拍手声、骨头嘎嘎作响声和爆笑声”。这是对敏捷舞者的跺脚和拍手的回应。这种欢闹常常一直持续到凌晨。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变了。人们现在很少听到南方黑人区舞者的骚动。昔日粗鲁的嬉闹几乎完全被宗教聚会所取代。现在，人们听到的不是班卓琴和小提琴嘈杂的旋律，而是赞美之歌和劝诫之声。这个民族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进步，使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种族之一。

就他们的宗教倾向而言，黑人是浸信会教徒。即使在成为其他教派的成员时，他们也强烈地坚持，将浸没式洗礼作为唯一的洗礼形式。

第十五章

结论

在追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南部各州浸信会教派在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从目前的优势出发，回顾我们走过的多事之秋，并且带着动力，也许还有收获，去研究促成我们成长的原因。在人类和社区、教会和教会协会公约的行动背后，隐藏着行为的哲学和事件的教导意义；它们是在上帝永恒大能的指引与看顾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浸信会先驱所倡导的自由原则，虽然起初步步遭到坚决抵制，但已成为这片土地的基本法则。持续而有功效的进取精神，克服了最令人生畏的障碍，并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现在在这片广阔的国家土地上享有的自由。与这些原则的灌输与培育（它们是我们国家框架基础的原则体系背后的支架）相互辉映的，一直是：——人民的发展（人民是它们的主要支持者）。不，这个教派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在美国，人口增长了 16 倍（主要包括外来移民，但也包含人口自然增长），而该国的浸信会人数增长了 56 倍，几乎是该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四倍。

这种惊人的增长也不能归因于移民，因为大量统计数据表明，虽然其他教派从移民中获得了巨大的人口数字增长，但浸信会从中获得的增长收益很少、或没有。在本书所考查的南方部分州中，仅正规浸信会的人数就达到了 188.307 万的庞大数字。

在与外围异教世界的关系中，浸信会持续地保持传教设施与机制；这些设施与机制的成立，当初大多都是由于浸信会教派教父的智慧和辛勤事工努力。已建立并成功运作的系统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庞大的组织建立在最先进的成功方法之上，以吸引、联合和指导慈善机构，在浸信会的指导下；并以有条不紊的工作不断前行。传教士们的足迹出现在天涯海角，出现在拥挤的人口中心、被忽视的地区和美国偏远的边境地区，以及——墨西哥、古巴、巴西、中国、意大利、非洲和日本。

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定居开垦时代和直到独立革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浸信会会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是文化很低的人群（因为他们主要是穷人）。他们的无知与缺乏文化教育的状态，使他们受到了浸信会教会反对者的蔑视。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些伟大的领袖，如曼宁和麦克西，后来是北方的韦兰，以及南方的弗曼、霍尔科姆和默瑟；他们将学术教育与坚定的判断力结合起来；并且是在教育方面的、辛勤的宗派建设者。这些热心的属上帝之人巧妙地使用所掌握的稀缺资源，并巧妙地组织和促成每一次行动与进步，为美国浸信会的未来提升提供了杠杆。

虽然伟大的人民在每个州都获得了广泛的福音立足点，但肯定有失误，——尤其是在教育工作中进行了如此多的工作。然而，在浸信会历史的第二个世纪末，我们看到，浸信会的许多福音机构与教育机构，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成功繁荣，在全国分布最广、广受欢迎。

虽然在南方，许多这些机构都因南北战争而衰落，但其中大部分已经复兴，并且在今天成为我们文明中最强大、最有益的力量之一。奴隶的自由带来了学校的建立，以提升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卓越水平。

浸信会是南方第一个将新闻媒体和出版事业作为力量和进步引擎的教派。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繁荣，该机构得到改善，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直到它成为南方各州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浸信会信徒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财富。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许多浸信会教徒都非常富有。但随着南方机构的崩溃，这部分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摧毁了。然而随着产业复苏、许多新经济来源的财富的产生，数以千计的庄园逐渐得到修复。在这一点上，占人口比例如此之大的浸信会当然也有同感。

由于他们在一些州的人数众多，与其他教派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产。结合其他有利因素，这赋予了浸信会社会地位。

但对浸信会来说，可见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坚强的中产阶级的坚定支持。在美国，他们所广泛触及和影响的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口数量，可能比任何其他基督教教派所触及和影响的中产阶级人数都多。从一开始，这就是浸信会宗派力量的基本要素；这一事实可能是美国浸信会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就是美国浸信会享有的一些主要优势。如果教派的成功继续以同样的比例增长到二十世纪末，那么浸信会的影响力将无可匹敌。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优势，而且它们相当可观，难道浸信会的发展和影响就没有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吗？未来没有陷阱吗？在一片无比繁荣的土地上，世俗的精神会带来严重的危险。浸信会经受了斗争和苦难的磨难，茁壮成长；他们能否随着国家社会的日益繁荣而仍然保持繁荣昌盛？

教会生活的稳固性因在地方组织中实行健全的纪律而得以保持。世俗的入侵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教会的这一显着特征（即严格的纪律特征），并招致腐朽。世俗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仁德的衰落。如果这种仁德精神，随着教会蒙福的物质繁荣而衰退、而不是增强，那么灾难性的结果就会随之而来。应对这种压力的责任落在浸信会教会成员们身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如果在迫害和反对的情况下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那么在完全消除这些障碍、并拥有随时可用的巨大经济资源繁荣的情况下，教派的成功应该会更大。

时代精神带来的另一个危险是结果的肤浅（即，随着浸信会教会人数的增长，随着教会的扩增，信仰的深度反而会变得肤浅）。随着我们人数的增加，存

在相应的属灵损失的危险，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教会登记册上的登记人数已经过高地估计了教会的进步（即，教会的真实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教会成员人数的增加来反映）。人们普遍希望增加数量而不是提高效率、加深效果。人们寻求“画饼”的牧师，而不是那些从事真实建造工作的牧师。在大量人数加入教会的热潮中，忽视了组织工作；在接纳会员方面不加区别和没有谨慎分辨，那么皈依文化（即真实的悔改、归依、生命翻转、真正的重生）就化为泡影。

克鲁马赫（Krummacher）有一句著名的话：“浸信会（Baptists）有未来”。这位德国神学家的声明暗示了一个事实，即浸信会被赋予一项尚未完成的特殊使命。他们作为一个民，通过忠于所托付给他们的神圣委托，成功地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影响是通过大量的儿童洗礼教会实际采纳他们的观点而显明的（即，许多基督教会放弃了历代以来的、婴儿洗礼的传统习俗，而采用浸信会的、真正符合圣经的主张与教导，即，只有一个人真正地成为信徒、真诚地悔改认罪、归信基督，才应当接受洗礼，而且洗礼应当是沉浸式的，而不是点水式的）。浸信会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守此原则，逐渐使婴儿洗礼声名狼藉；与这种做法的衰落相对应的，是浸入式洗礼教仪的发展和恢复（即回到圣经新约本身的教导、教义和范例）。考虑到他们（浸信会会众）的人数、影响力、资源和机会，未来成就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

南方浸信会 200 年的故事是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比拟的。他们从大西洋沿岸的几个苦苦挣扎的前哨站开始，在早期，随时面对着迫害风暴的危险（即，他们因浸礼的教仪和教义，而受到在美国建国之前时的、统治南方的、英国国教教会、即圣公会的压迫与迫害）；然而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力广泛的会众。曾经多少年前，——他们曾被那些傲慢自大的人所蔑视和轻视；他们的先驱者曾被看作是地上的渣滓，被一种不宽容的态度所抵制；这种不宽容的态度使那些傲慢者对最崇高的品格元素视而不见；然而，

浸信会教徒在这美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并扩展为耶和华的花园。反对使
他们伟大。祝福已经临到被辱骂和迫害的人。

今天，我们面临着过度地自觉伟大的危险；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赖以达到高处的法则。人们担心我们的谦逊会转化为不宽容。阴险的骄傲感紧随人类的成功，并与成就成正比地增加陷阱。迦勒底人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满怀虚荣心地在他的首都城墙上踱步并为他的宏伟而自豪时，他离放牧的牛群只有一步之遥（即，正如圣经旧约所记，尼布甲尼撒因受到上帝的惩罚而被流放）

【请见《但以理书4：32》】。而相反，希伯来先知在关押他的地牢中时最为伟大，他的耳边回响着神的旨意：“买亚拿突的那块田，因为买它的赎回权是你的”【请见《耶利米书32：7》】。

